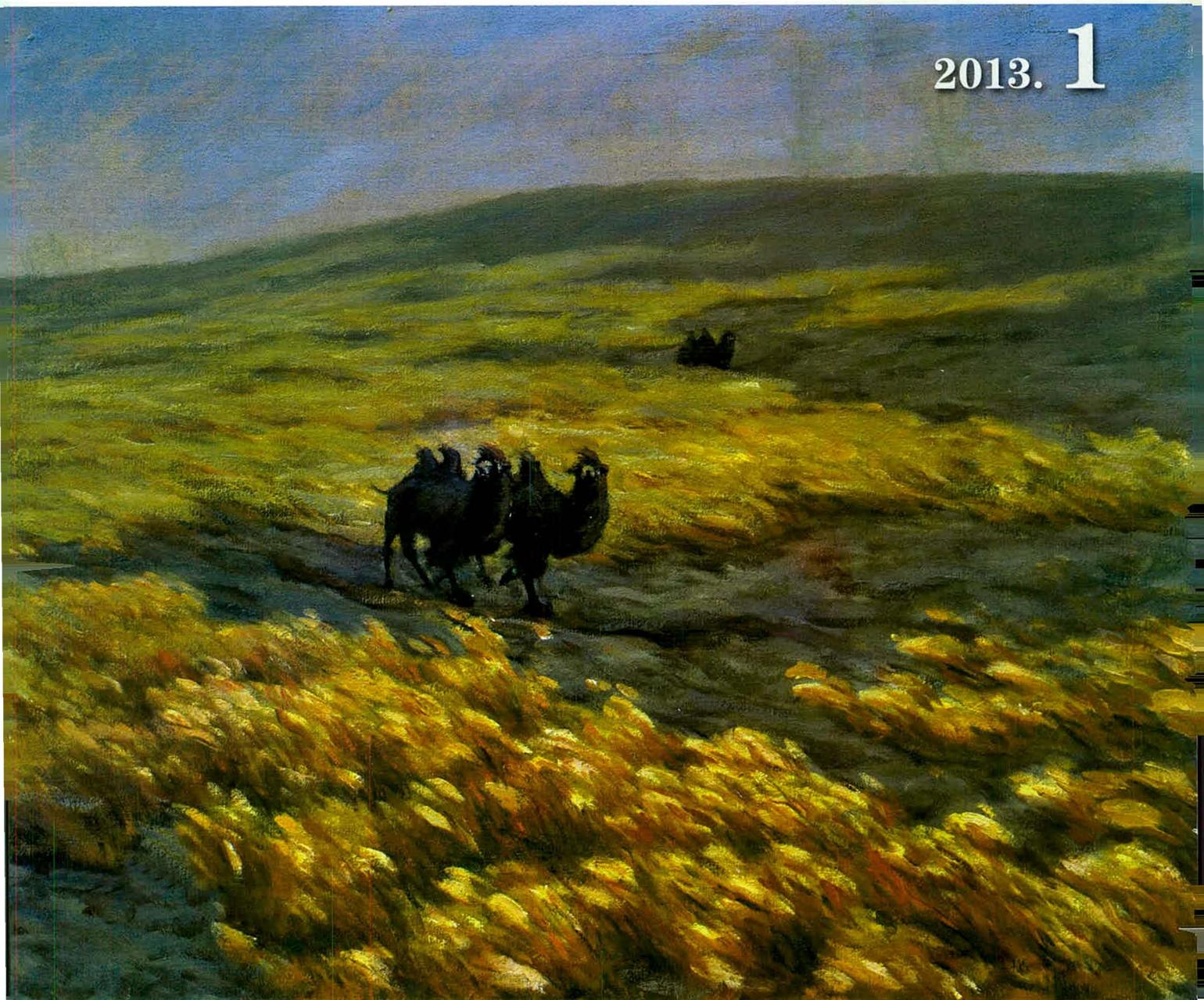




甘肃史志

2013. 1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



3月28日，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副省长、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张广智到会讲话，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李虎作工作报告，省政府与全省14个市州政府签订了《2013—2015年度地方史志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



地方史志工作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

——论地方史志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九 日

党的十八大科学把握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和我国文化发展定位,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度和宽广视野,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的总任务,吹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号角。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作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重大战略决策。

地方志是一种具有独特历史文化和学术价值的资料性文献,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两千多年来,代代相传,历久不衰。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志书约占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煌煌巨帙,令人叹为观止。国有史,方有志,形成了我国历史文化的两大支柱,也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两大载体。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国家实力的象征”,都在其中得到体现。

甘肃省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东西方古代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古丝绸之路在全球影响巨大。现存文化古迹 7000 多处,居全国第五位,传说中的中华文明始祖伏羲诞生在天水,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道教名山崆峒山、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等,堪称民族和世界文化的瑰宝。这一切,既得益于祖先们的勤劳和创造,也得益于地方志书的记载和传承。省委、省政府根据我省文化资源丰富这一实际,提出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已经得到国务院的批复。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每一项工作,都

离不开地方史志工作的参与,做好地方史志工作,必将为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地方志书所记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鼓舞新时代人民不断奋进的精神力量。我国地方志书素来推崇“春秋笔法”,在客观记述的同时,隐恶扬善,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时,志书所记载的自然风情、发展成就、灿烂文化、淳朴民风、杰出人物等,能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自豪感,进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党、为国、为民立言,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等方面都有着其它文化载体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总之,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地方史志工作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全省广大史志工作者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把握新形势,抓住新机遇,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努力开创地方史志工作新局面,为推出更多的成果,提供更好的服务,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作出更大的贡献!



甘 肃 史 志

季 刊

2013 年第 1 期
(总第 13 期)

(史志资料 免费交流)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 G01—0098 号

卷首语

地方史志工作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

——一论地方史志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九 日(1)

领导讲话

在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张广智(4)

抓住机遇 开拓进取 努力推动全省地方史志工作实现新突破

——在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 李 虎(7)

在《平凉地区志》首发式上的讲话 钱 旭(12)

政策法规

《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 (13)

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地方综合年鉴编纂

出版规定(试行)》 (15)

史地考证

高台战略地位考述 常登成 赵永全(17)

伏羲生于成纪新考(上) 马志荣(19)

经验交流

对编辑《中国方志百科全书》的几点认识

..... 车安宁(29)

二轮省志编纂记述问题三议 李拾良(32)

志书中的数学 乔孝堂(39)

年鉴编研

年鉴增补三认识 朱 玺(41)

录

篇目选登

《甘肃省志·烟草志》目录 (46)

乡土民情

民乐县婚俗研究 周 斌(48)

转 载

中国各民族的形成 刘志勇(56)

陇原人物

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榆中籍红军将士 沈明江(62)

历史回眸

民国大事记(1948) (66)

今昔肃王府(上) 安文迟(69)

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和县的主要商号

及其彰显的商业文化信息 魏泽民(74)

历史趣闻 (78)

读者来信

一篇值得细读并实践的好文章 安文迟(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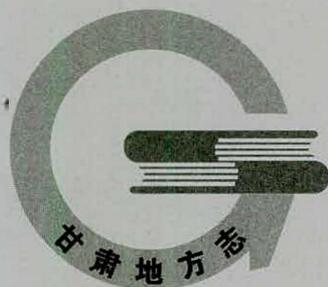
简 讯

《白银区史话》获白银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 (6)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举办《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灾

和灾后重建志》编纂人员业务培训班 (68)



《甘肃史志》编委会

主 任:李 虎
副 主 任:车安宁 钱 旭
李振宇 孙奇明
编委委员:杨东海 李拾良
贺红梅 张正龙
石为怀

主 办 单 位: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甘肃史志》编辑部

主 编:李 虎
副 主 编:钱 旭
编辑部主任:贺红梅
责 任 编 辑:梁兴明 陈 谦
孔令奇 石战涛
司德芳 高天成
王 旭

本 期 责 编:司德芳

联 系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
南路 51 号统办一号楼九楼

邮 编:730000

电 话:0931-8960622

电 子 邮 箱:gsdfz911@163.com

印 刷:甘肃省政协办公厅印刷厂

电 话:0931-8960384

在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副省长、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张广智

(2013年3月28日)

今天,我们召开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进一步理清思路、部署工作、强化责任,推动全省地方史志工作顺利发展。刚才,李虎同志做了工作报告,总结了前两年的工作,对下一步的工作进行了部署。省政府与各市州签订了《2013-2015年度地方史志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责任书》就是军令状,各市州、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紧盯目标任务,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下面,我再强调几点意见。

一、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地方史志工作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地方史志是具有独特历史文化和学术价值的资料性文献,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两千多年来,编修地方史志代代相传,历久不衰。国有史,方有志,国史和方志形成了我国历史文化的两大支柱,也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两大载体,在全面系统记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与现状的同时,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弘扬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做好新时期的地方史志工作,对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省情教育等都有着其它文化载体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对于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文化软实力,推进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和文化大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地方史志还是政府工作的重要信息来源,是海内外各界了解甘肃、认识甘肃、考察甘

肃的重要窗口,也是我省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桥梁。

近年来,全省地方史志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体史志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一些部门和地方重视不够,支持不到位。二是二轮修志进展缓慢。三是实现全省县级以上综合年鉴的全覆盖任务还相当艰巨。今年,是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如何加快推进地方史志工作,为文化大省建设提供服务,特别是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中发挥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把握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增强做好地方史志工作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二、突出重点,努力开创地方史志工作新局面

要全面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以修志编鉴为重点,以资政服务为动力,在地方史志资源开发利用上寻求突破,在信息化和方志馆建设上加快步伐,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上提升能力,努力开创地方史志工作新局面。

(一)坚持质量第一,完成好修志编鉴的任务。质量是志书的生命,是关乎史志事业发展的根本。广大史志工作者要以对社会、对历史、对后人高度负责的精神,以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全面、系统、客观、准确地记载历史,真实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

历程,确保志书内容真实可信。要不断加强修志理论研究,以理论创新促进工作创新。二轮志书所记载的历史时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和完善的重要时期,是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民主法制进程不断加快的关键时期,社会组织结构、管理方式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修志的组织形式、体裁体式、记述方式都要进行改革创新,更好地体现志书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上的相关规定,建立健全志书质量监控体系和质量责任体系,坚持“一评三审”制度,强化全过程质量控制,努力把志书打造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化精品。同时,要统筹兼顾,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快推进年鉴工作正常化,争取用三年时间实现县级以上地方综合年鉴全覆盖。

(二)坚持资政服务,开发利用好地方史志资源。地方史志工作只有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各级地方史志部门既要有历史责任感,编修名志佳志,也要有时代责任感,关注现实,在服务社会上多作文章。要总结和发扬好的经验和做法,牢固树立修以致用、修用并举的理念,不断加大史志资源的开发利用力度。要自觉贴近中心工作,积极寻找史志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主动为社会发展服务。要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借助网络、刊物等平台 and 载体,努力开发一批可听、可视、可读、可体验的史志产品,满足社会各界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实现史志资源的共用共享。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为地方史志工作服务社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地方史志部门要发挥生力军作用,主动参与,积极作为,紧紧围绕“3341”项目工程和“1313”工程建设,开展课题研究,深入挖掘整理我省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多出有价值、高水平的地情研究报告和地情丛书,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赋予其更加丰厚的历史内涵。

(三)坚持与时俱进,建设好地方史志网站和方志馆。史志事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一方面,加强信息化建设,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收集、整理、加工、储存史志资料,可以

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把史志资料数字化,建成数据库,实现网络化,使之易传、快捷、共享,能够更好地为领导决策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其资政和教育的作用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来。目前,我省仅有3市4县开通了地方史志网站。这种状况,远远落后于时代要求,落后于其它省份,也与我省的历史文化地位和建设文化大省的要求极不相称。各地及其地方史志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力争到“十二五”末,建成覆盖全省各级地方史志部门的网络系统。

方志馆是对一个地方历史与现状全方位展示的重要平台,是地情馆。建设方志馆既是国家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我省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乡面貌巨大改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当前又正处于转型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展示的东西很多。各市州要将方志馆建设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提早谋划,充分论证,结合各自实际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有条件的市州、县市区要尽快立项建设,近期内不建方志馆的市县,也要建方志资料库,把各类资料保存好,避免史志资料的遗失。

三、加强领导,营造地方史志事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刚才,省政府与各市州政府签订的《目标管理责任书》,进一步明确了下一阶段的目标任务,关键是狠抓落实。如果现在不盯紧抓实,抢时间,促进度,完成任务就比较困难,这也是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原因。在中央要求精简会议的情况下,省政府决定召开这次会议,充分说明省政府对抓好地方史志工作的高度重视。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按照省政府分解下达的目标任务,不等不拖,抓紧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继续完善和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部门合作、社会参与、地方史志机构组织实施”的工作体制。各地要切实加强对地方史志工作的组织领导,及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根据《地方志工作

条例》规定要求，及时准确地为修志编鉴提供资料。人事、编制、发改、财政等部门，要从政策、编制、资金、项目等各个方面对地方史志工作给予支持，解决好地方史志信息化建设等工作必需的人员、资金和硬件设施。特别是市志编修没有启动的市州和省志分卷编修没有启动的部门，要认真分析原因，落实工作责任，确保在今年上半年启动工作。

(二)坚持依法修志。要树立和增强依法修志意识，认真抓好各项规定的落实，切实做到“一纳入、五到位”，依法推进地方史志工作健康有序发展。各级地方史志工作部门要加强与各级人大、政府法制部门和出版行政部门的协同与配合，通过开展法律宣传教育、组织执法检查等活动，依法调节和规范社会修志、用志行为。

(三)强化队伍建设。各级各有关部门一定要把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好，切实解决好新老交替、人员不足等问题，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修志专业队伍。一要通过充实、培训、提高，建立一支

稳定的适应工作需要的专职队伍。各市县要招录和选调德、才、学、识并举的人员充实到地方史志机构中来，并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培训，不断提高修志队伍素质。二要树立“开门修志”的理念，创新用人机制，聘请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文字水平高、身体好、熟悉情况的离退休老同志参加修志，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兼职修志队伍。三要关爱修志人员。修志工作是一项“艰苦、辛苦、清苦”的工作，各级各部门领导要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和爱护修志人员，不断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解决好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广大修志工作者要发扬淡薄名利、乐于奉献的精神，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确保高质量地完成修志任务。

同志们，我省地方史志工作正处在一个创新发展的历史新阶段，任务光荣而艰巨。希望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扎实工作，推出更多的成果，提供更好的服务，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作出更大的贡献！

《白银区史话》获白银市 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

由白银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编纂的《白银区史话》获白银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著作类优秀奖(市委发[2012]94号)。全书27万字、90余幅珍贵照片。内容设“沧海桑田、红色记忆、亲切关怀、人物荟萃、文物古迹、风景名胜、风味特产、民间艺术、传说故事”等栏目，“史”与“话”相结合，融史料性、故事性、趣味性、知识性于一体。该书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供稿：白银区 王树吉)



抓住机遇 开拓进取 努力推动全省地方史志工作实现新突破

——在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 李虎

(2013年3月28日)

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的重要时期,经省政府同意,今天我们召开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回顾总结两年来全省地方史志工作,安排部署2013年工作任务。省政府对召开这次会议十分重视,张广智副省长亲临会议并将作重要讲话,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下面,我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和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的委托,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一、两年来的工作回顾

过去两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具体指导下,全省地方史志工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省政府《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按照“以三级志书为主体,以地方综合年鉴为主导,以信息化建设为依托,以服务社会为支撑”的总体思路,全面抓好地方志工作业务建设、制度建设、基础条件建设、队伍建设和理论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

(一)狠抓修志主体业务,志书编纂取得新成果

一轮修志完成最后收尾。针对一轮省志最后几卷长期迁延,致使一轮修志迟迟不能结束,一、二轮修志步调不齐的问题,省史志办把尽快完成首轮修志收尾作为重中之重,主要领导带队,反复上门督查,会同编纂单位全力攻关,终于在去年年底完成最后收尾,《甘肃省志·档案志》通过终审,

《甘肃省志·文化志》完成初审。

二轮修志稳步推进。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加大志书编纂力度,加强业务指导和督查,志书编纂步伐明显加快。两年间,出版省志分志1卷:《监察志》,终审4卷:《大事记》《水利志》《体育志》《税务志(地方税务)》;出版市(州)志1部:《平凉地区志》,终审2部:《武威地区志》《定西地区志》;出版县(市、区)志11部:《瓜州县志》《金塔县志》《永登县志》《正宁县志》《和政县志》《永靖县志》《白银区志》《合作市志》《古浪县志》《舟曲县志》《临夏市志》,评议终审3部:《民勤县志》《平川区志》《城关区志》。截至2012年底,列入二轮修志计划的72卷省志,出版4卷,终审4卷,初审3卷,约有30卷进入收集资料或编写初稿阶段;列入二轮计划的14部市(州)志和85部县(市、区)志,市(州)志出版3部,终审2部;县(市、区)志出版29部,评议终审3部。

志书质量有了新的提高。在加快志书编纂进度的同时,各级修志机构不断强化质量意识,认真执行志书编纂出版质量标准和“一评三审”制度,始终做到坚持质量标准不降低,坚持评审程序不变通,高标准、严要求,把好志书政治关、史实关、保密关以及民族宗教、涉外事务的政策关,确保志书政治上不出问题,事实上不出差错。各地各部门坚持党政领导、修志人员和相关方面专家学者相结合的志稿评议审定制度,使评审更加有效,审定更加严密。为提高审稿工作的权威性,天水市志办

成立了志书评议专家委员会。定西市志办扩大审稿范围,邀请周边地区修志机构负责人参加评议,更好地保障了志书质量。在去年举行的全省第十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张掖地区志》《平凉地区志》分别获得三等奖。

(二)加大年鉴工作力度,综合年鉴工作有了新进展

《甘肃年鉴》实现编辑出版常态化。2011、2012两年间,省史志办编辑出版了3本《甘肃年鉴》。经过努力,《甘肃年鉴》理顺了年份关系,2012卷在当年12月出版发行,实现了“一年一鉴、当年出版”,编辑工作进入常态化。编辑工作中,实行分块包干、限时定量、责任到人的工作机制,确保了年鉴质量,提高了时效性。年鉴内容上,在正文、大事记、特载、专辑有关篇章中增加了反映民生和非公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内容。经过不断完善体例框架、充实记述内容、改进装帧设计、严格审核校对,《甘肃年鉴》的品位有了新的提高。

年鉴工作覆盖面不断扩大。各地以国务院《条例》和省政府《规定》为依据,积极协调理顺综合年鉴工作关系,更多的市县开展了年鉴工作。天水、白银两市在市、县政府的支持协调下,全面理顺了市、县两级综合年鉴工作关系,做到了市、县年鉴工作全覆盖。白银市还统一了市县两级年鉴的版本。《民乐年鉴》《高台年鉴》《瓜州年鉴》《成县年鉴》等一批新编年鉴先后面世。到2012年底,全省已有11个市(州)、37个县(市、区)编辑出版综合年鉴。

年鉴工作进一步规范。去年,省史志办在对全省地方史志工作的调研中,对市(州)、县(市、区)执行《甘肃省地方综合年鉴管理办法(试行)》的情况进行了检查督导,掌握了年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下一步年鉴工作提出了要求。同时,省史志办先后对《武威年鉴》《嘉峪关年鉴》《白银年鉴》《天水年鉴》进行了指导审查。

(三)不断拓展工作领域,地方志工作服务社会有了新作为

旧志整理和地情资料开发利用成果丰硕。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充分利用自身资料优势和人力优势,深入挖掘整理当地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节

庆文化、宗教文化、生态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两年来共点校整理出版历代旧志文献9部,出版各种专著和编写专题地情资料50多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酒泉通史》《庆阳通史》《人文定西》、[乾隆]《庆阳府志》点校本、《明清秦安志集注》等。

史志信息化建设迈出新步伐。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是地方志工作实现科学发展和为社会提供便捷服务的必由之路和迫切要求。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在加快志书纸质版向电子版转化的同时,积极推进地情信息库和地方志网站建设。省史志办建设的甘肃地方史志网已完成网页设计和域名注册等工作,正在上传资料。白银、天水、兰州、古浪、正宁等市县也已建成地方志网站。这些地情网站的开通运行,拓宽了地方志工作服务社会的渠道,提升了地方史志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地方志工作服务中心工作更加主动有效。兰州市志办配合有关方面做好兰州历史文化研究开发工作,为推进“文化兰州”建设提供咨信服务。张掖市志办通过参与张掖市城市道路命名、张掖形象定位研讨、甘州古城规划仿建、张掖湿地公园及滨河新区诗书楹联评审等工作,为推进本市文化建设和旅游业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嘉峪关市志办对照旧志记载实地勘察周边长城、墩台、古堡、隘口和古道,编纂《嘉峪关志》,为关城历史文化开发和古遗址保护提供了基础资料,提出的建议对策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和采纳。武威市志办配合有关部门完成了电视专题片《石羊河流域治理》的文本撰写工作。陇南市志办协助甘肃电视台拍摄了6集电视纪录片《古道寻踪》。华池县志办制作配有徽章的《南梁印迹》纪念章册,宣传了老区革命英烈的事迹。不少地方和单位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以不同形式提供大量有价值的历史地情信息,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高度重视人才培养,修志队伍素质有了新提高

队伍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一些市县修志机构通过招录、选调等形式,吸收了一批文化层次较高、热爱修志事业的年轻同志充实到修志队伍,增添了修志队伍的活力。酒泉市抓住2011年政府机

构改革的机遇,多方协调,市志办增加5名编制。天水市在市志办单独设置后,积极督促所属各县区单列了机构,增加了人员。临夏州重视解决修志人员待遇,调整配备了州志办领导班子,设立了州志办党组,较好地解决了一些老同志的级别待遇问题,提拔一批业务能力强的干部充实中层岗位,人员结构进一步优化。

业务培训力度进一步加大。省史志办先后举办两期修志人员培训班,培训人数近300人。培训班邀请省内外方志专家和有经验的志书主编授课,讲解修志基本知识和二轮志书编纂需要注意的问题,有效提高了修志人员的业务素质。各市(州)也分别举办培训班、研讨班,对专业修志人员进行了培训。

修志部门自身建设进一步加强。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全省地方志系统认真开展效能风暴行动,查找突出问题,积极组织整改,机关效能明显提高。同时,认真组织开展“双联”工作,在帮助联系村、联系户脱贫致富的同时,修志干部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和锻炼,转变了工作作风,密切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五)大力推进工作创新,修志工作焕发出新活力

根据二轮修志记述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如第三产业特别是新兴产业的迅速兴起,环境保护工作的提出和重视,民生问题的关注和政策倾斜,非公经济的迅速发展等等,各级修志机构认识到继续沿用一轮修志的框架结构和篇章节目,已不能准确反映社会变革。广大修志工作者创新修志理念,采用增设专志、专章、专节的办法,引入“特载”、“专记”等体裁,加大图片、图示、表格等形式的比重,既有效地解决了志书内容扩展的问题,又使志书突出了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一些地方针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卷目或篇章,采用课题制、承包制等办法,组织专业机构、学术团体或个人参与编纂,既保证了质量又提高了时效。通过多方面的创新探索,拓宽了地方志工作者的视野,提升了地方志书的科学性,为地方志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

的工作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一些地方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条例》《规定》的贯彻落实不到位,少数地方的史志机构还不健全,人员不足、经费短缺的矛盾比较突出。二是二轮修志总体进展缓慢,从2004年启动二轮修志以来,市县完成任务的仅占约三分之一,省直部门尚有一半以上的单位没有启动。三是市县综合年鉴工作覆盖面较小,目前还有一半以上的市县没有开展年鉴工作。四是部分修志机构工作主动性和开拓性不够,自我发展的意识和能力不强,工作“边缘化”倾向突出。五是修志队伍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与承担的任务不相适应,缺少有建树的学科带头人和有影响的学术成果。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二、2013年的主要工作

2013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进我省地方史志工作实现新突破的关键之年。全省地方史志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密围绕党的十八大关于加快文化强国建设战略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关于加快文化大省建设部署,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志为主体、史志年鉴和库网建设多元一体、协调发展的工作格局,着力加快二轮志书编纂进程,着力扩大地方综合年鉴覆盖面,着力提高志书年鉴质量,着力加强队伍建设,奋力推进全省地方志工作创新发展,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地方志事业新突破。

(一)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坚定做好新时期地方志工作的信心

党的十八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度和宽广视野,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把文化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着眼于文化大省建设,倾力打造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把文化大省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地方志工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等方面有着其他文化形态不可

替代的作用。地方志也为整个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取之不竭的素材和营养。

加快文化大省建设,地方志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为更好地发挥地方志工作的价值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及广大修志工作者要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深刻理解中央关于文化改革发展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深刻理解省委关于文化大省建设的新决策、新举措、新要求,充分认识做好新时期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性,切实认清自身所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紧紧抓住重大历史机遇,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有为的姿态,扎实苦干,攻坚克难,把党的十八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贯穿于修志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编修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佳志,为我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采取有效措施,着力加快二轮修志步伐

编修志书是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主要职能和首要任务。按照调整后的全省二轮修志规划,我省要力争在2015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截至目前,纳入规划的72卷省志,仅出版了4卷,占5%;14部市州志出版了3部,占21%。85部县市区志出版了29部,占34%。总的来看,全省二轮修志进展不容乐观。实现2015年全面完成二轮修志任务的目标,时间紧迫,任务艰巨。保证目标任务的完成,今明两年是关键。尚未完成二轮修志特别是尚未启动的市(州)、县(市、区)和省直单位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增强志书“官修官责”意识,思想上要高度重视,组织上要健全机构,选调选聘熟悉情况、热爱修志工作、文字功底好的人员,提出进度要求,实行责任到人,尽快开展工作,确保按照全省统一划定的时限高质量完成任务,不拖全省的后腿。目前正在收集资料、编纂初稿的,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快进度。已经通过初审、复审、终审和评议的,要按照评审意见抓紧修改完善,争取早日进入下一环节,直至出版。

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在抓好编纂进度的同时,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志书质量标准,严格执行中指

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坚持志书审查验收程序和出版标准,强化分级指导督查,切实把好各个质量关口和环节。为进一步提高志书质量,省史志办将从今年开始每年组织一次全省新编志书评奖,推动开展争创名志佳志活动。

(三)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扩大综合年鉴覆盖面

编辑综合年鉴是国务院《条例》赋予县级以上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又一项重要工作职责。经过近几年的不懈努力,我省的年鉴工作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但也要看到,国务院《条例》颁布实施已经6年多时间,《条例》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组织编纂地方综合年鉴,但全省目前仍有3个市(州)、49个县(市、区)未开展综合年鉴编辑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条例》是国家层面的法规,国家法规具有严肃性、权威性和强制性。依法办事是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该牢牢秉持的从政理念和行为准则。尚未开展综合年鉴工作的市县地方志工作机构,要进一步增强法制观念,高度重视履行法规赋予的职能,切实做到依法推进地方史志工作。无论什么原因和困难,都要以《条例》为依据,通过积极协调汇报,创造条件加以解决,尽快启动综合年鉴编辑工作。全省要力争在2015年实现县级以上综合年鉴工作全覆盖。

已经编辑综合年鉴的地方,要全面落实《甘肃省综合年鉴管理办法(试行)》,在完善体例框架、充实丰富内容、体现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搞好核实校对等方面多下功夫,不断提高年鉴质量。要规范年鉴编辑行为,做到一年一鉴,当年出版,努力提高时效性。

(四)强化服务理念,不断拓宽地方志工作领域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地方志工作提升其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根本途径和必然要求。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方向,在促进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文化生活需求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要主动参与到我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之中,按照省委、省政府“一带、三区、十三板块”

的战略布局,发挥地方志历史文化的载体作用和文化建设的资信作用,为项目建设服务。二要加大地情资料的开发力度,增强开发利用的针对性,提高服务的有效性。三要加快建设各级地方史志网站,实现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方便社会读志用志。四要继续做好史志资源的普查、整理和保护工作,不断丰富史志文献馆藏,加快库馆建设步伐,扩展历史文化资源。五要切实抓好《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志》的编纂工作,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确定的工作规划,在2013年完成全部资料收集和初稿撰写工作。各牵头单位和承编单位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加强领导,靠实责任,抓好各阶段工作的落实,确保年度目标任务的完成。

(五)狠抓队伍建设,切实提高修志人员政治业务素质

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编史修志作为一种文化创造活动,修志工作者的政治业务素质尤为重要。全省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从全局和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人才队伍建设在地方志事业发展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把队伍建设摆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地位抓紧抓好。

一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正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了解历史,切实做到所编志书全面、系统、客观、准确地记述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确保志书在政治上合格。二要突出抓好业务素质 and 能力的培训,提倡各级修志机构积极举办各种业务培训班、研讨班,下功夫提高培训和研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大力开展学习型机关建设,加强政治理论和修志业务的学习,重视在修志编鉴实践中锤炼干部,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全面提高广大修志人员的政治素养、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三要通过“开门修志”,将社会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熟悉省情地情的老同志吸收到志书编纂工作中来,把专家学者的学术所长、老同志的经验所长与修志人员的业务所长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进一步壮大修志力量。

(六)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开展修志理论研究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充分发挥方志学理论对修志实践的指导作用,根据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完善方志学理论体系,是地方志工作又一重要任务。二轮修志记述的时段,正是我国全面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社会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革,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无疑给续志编修工作带来了新的课题。如何把这一伟大历史时期的改革和发展全面、系统、客观、准确地载入史册,需要我们在总结续志编修实践的基础上作出理论上的回答。广大修志工作者要善于在工作实践中进行理论总结和概括,努力形成具有甘肃地域特色的理论成果,对续修工作予以正确的指导。要鼓励和调动修志人员开展理论研究的热情,充分利用《中国地方志》《甘肃史志》等刊物的平台作用,同省内外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更好地发挥理论研究成果的作用。

同志们,这次会上,省政府将同各市州政府签订2013-2015年度地方史志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这是省政府对全省地方志工作的极大重视和支持,是推动全省地方史志工作加快发展的重大举措。各市州地方史志工作机构是本级政府主管史志工作的职能部门,要切实担负起履行各项工作职能、全面完成工作任务的主体责任,努力完成或超额完成目标管理责任书确定的年度和阶段工作任务。省史志办将在每年年底组织开展对各市州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的评比考核,对任务完成好的予以表彰奖励,完成差的予以通报批评。

同志们,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以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为战略平台、推动文化大省建设的宏伟目标,这为我们全省广大修志工作者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盛世修志,机遇难得。让我们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解放思想,开拓进取,顽强拼搏,扎实工作,以实现地方史志事业新突破的优异成绩,为我省文化大省建设增光添彩,为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富民兴陇作出新贡献。

在《平凉地区志》首发式上的讲话

钱 旭

(2013年1月6日)

同志们:

在举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热潮中,平凉人民迎来了全市思想文化建设上的一件盛大喜事、重要成果——《平凉地区志》出版发行。在此,我代表省地方志办公室表示热烈地祝贺!

平凉历史悠久,渊源流长。这里,是农耕文明的形成之地,是道教文化的繁盛之地,是针灸医学的兴起之地,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是文人墨客诗咏之地;这里是王母故里、皇甫家乡,这里有佛教圣地、道教名山;这里是历史名城、西北重镇;这里是战略要塞、交通咽喉。这一切,为编修地方志书提供了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平凉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创业、励精图治,使平凉这块热土呈现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的崭新景象,创造出了庄浪精神、静宁经验、灵台路子、崇信特色、华亭模式、泾川典型,享誉全国,举世瞩目。这一切,给编修地方志书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

作为继明代赵时春《平凉府志》之后的又一部通志,《平凉地区志》贯通古今、纵览百科,较为翔实地记述了平凉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变迁。从总体上看,全志政治观点正确,体例结构完备,资料丰富翔实,语言文风朴实,印刷装帧精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达到了思想性、资料性和可读性的有机结合,是一部弥足珍贵的平凉“百科全书”。它的出版发行,不仅对平凉文化大市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我省深入推进“华夏文明传承保护区建设”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近年来,平凉市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地方志工作,将地方志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作为思想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来抓,取得了显著成绩。一是二轮修志工作进展快。到目前,已出版市(地区)志1部、县区志1部(《静宁县志》),完成总纂2部(《庄浪县志》《灵台县志》)。同时,编纂出版了《平凉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崆峒区军事志》《崆峒区公安志》《崆峒区教育志》《崇信工业志》《崇信军事志》《崇信县抗震救灾志》《静宁县畜牧志》等一大批专业志和厂矿企业志,拓展了工作领域,丰富了修志成果。二是旧志整理任务完成好。校点出版了明嘉靖《平凉府志》、清康熙及乾隆《静宁州志》、清顺治《灵台县志》、清康熙《庄浪县志》、清乾隆《泾州志》、清嘉庆《柳湖书院志》及同治《崆峒山志》等10余部旧志书,是全省史存旧志数量最多、整理出版旧志数量最多的市州之一。三是地情资料开发成果多。市、县两级地方志办公室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料优势和人才优势,组织编写了大量地情资料丛书,其中《平凉历史文化丛书》《名人墨珍咏平凉》等书籍深受社会各界的好评。这一切,为研究平凉、宣传平凉,为使外界了解平凉、游览平凉、投资平凉、开发建设平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同志们,党的十八大吹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号角,提出了“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的任务。全省地方史志系统要深入学习宣传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下转第14页)

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使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等出版物使用汉字规范化,消除用字不规范现象,根据国家有关新闻出版的法律法规和关于汉字使用的有关规定,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经国家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关批准出版发行的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等出版物。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规范汉字,主要是指1986年10月根据国务院批示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所收录的简化字;1988年3月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收录的汉字。

本规定所称不规范汉字,是指在《简化字总表》中被简化的繁体字;1986年国家宣布废止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简化字;在1955年淘汰的异体字(其中1986年收入《简化字总表》中的11个类推简化字和1988年收入《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15个字不作为淘汰的异体字);1977年淘汰的计量单位旧译名用字;社会上出现的自造简体字及1965年淘汰的旧字形。

第四条 新闻出版署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管全国出版物汉字使用的规范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和语言文字工作机关,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出版物汉字使用的规范工作。

第五条 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等出版物的报头(名)、刊名、封皮(包括封面、封底、书脊等)、包装装饰物、广告宣传品等用字,必须使用规范汉字,禁止使用不规范汉字。

出版物的内文(包括正文、内容提要、目录以及版权记录项目等辅文),必须使用规范汉字,禁止使用不规范汉字。

第六条 向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及海外发行的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等出版物,可以用简化字的一律用简化字,如需发行繁体字版本的,须报新闻出版署批准。

第七条 下列情形可以不适用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

- (一)整理、出版古代典籍;
- (二)书法艺术作品;

(三)古代历史文化学术研究著述和语文工具书中必须使用繁体字、异体字的部分;

(四)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依法影印、拷贝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及海外其他地区出版的中文报刊、图书、音像制品等出版物。

第八条 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出版单位在申请创办时,必须向批准机关提交出版

社社名、报名、刊名字样,经审定符合规范获得批准后方可使用。

第九条 印刷通用汉字字模的设计、计算机编排系统和文字信息处理系统使用汉字,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需要使用繁体字的,须经新闻出版署批准。

第十条 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和语言文字工作机关负责对出版物汉字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被检查单位不得拒绝提供检查需用的出版物的样本。

第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级以上(包括省级)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关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处以责令改正、警告、5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

(一)违反第五条第一款，报纸报头(名)使用不规范汉字1个字以上(含1个字)，日报连续6期以上，周报连续3期以上，半月报连续2期以上的；

(二)违反第五条第一款，期刊刊名及封皮、包装装饰物、千字以内的广告宣传品使用不规范汉字1个字以上(含1个字)，半月刊连续2期以上，月刊、双月刊、季刊1期以上的；

(三)违反第五条第二款，在1期(1册、1盒)内，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等出版物内文使用不规范汉字占总字数千分之一以上的；

(四)违反第六条规定的。

第十二条 出版单位和印刷单位，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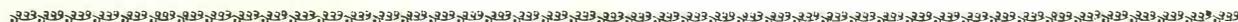
第十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

政管理机关和语言文字工作机关，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办法。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新闻出版署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1992年8月1日起施行。

本规定生效前，报头(名)、刊名、封皮中已经使用不规范汉字的，要加以纠正。



(上接第12页)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不断丰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专业化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出精品，出人才”的根本任务，自觉深入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把史志工作的“根”深深扎在人民群众历史创造的沃土中，用手中的笔，反映伟大时代的变革，书写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和创新成果。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就是要抢抓其中蕴含的新政策、新机遇，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明确发展定位，完善发展举措，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更广视野，推动甘肃史志工作迈上新台阶。当前，全省地方志系统必须做好以下七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必须在地位作用上深化认识，为事

业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第二，必须在“一纳入，五到位”上狠抓落实，为事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第三，必须在队伍建设上加大力度，为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第四，必须在理论创新上提升活力，为事业发展提供科学的学术支撑。第五，必须在信息化建设上加快步伐，为事业发展提供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第六，必须在提高质量上狠下功夫，用高质量的志书年鉴提升地方志工作的社会影响力。第七，必须在资源开发上多出成果，依靠自身优势提升甘肃文化的社会影响力。

最后，我向重视和关心《平凉地区志》编修工作的各级领导，向给予积极支持和大力配合的各界朋友，向辛勤耕耘付出心血的全体编修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提高质量,发挥地方综合年鉴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以县级以上(含县级)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综合年鉴(以下简称“年鉴”)。

第四条 年鉴编纂出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第五条 年鉴编纂出版应遵守国家关于保密、著作权、出版、广告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或规章,遵守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宗教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法规或政策,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第六条 年鉴编纂出版应做到:观点正确,框架科学,资料翔实,记述准确,编写规范,编辑出版符合国家标准。

第二章 框架

第七条 年鉴框架应涵盖年度内本行政区域的基本情况。

第八条 年鉴框架应做到:分类科学,层次清晰,隶属得当,编排有序。

第九条 年鉴框架应突出年度特点和地方特色。

第十条 年鉴框架应相对稳定,同时依据年

度特点和事物变化情况作适当调整,以体现稳定和创新的有机统一。

第十一条 年鉴分类可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并结合社会实际分工和本行政区域特点进行。

第十二条 年鉴框架各层次标题应简洁、准确、规范。

第三章 资料

第十三条 年鉴主要辑录反映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以及与本行政区域密切相关的资料。

第十四条 年鉴主要辑录年度性资料,一般不上溯下延。

第十五条 年鉴资料应突出时代性、年度性和地方性,具有为现实服务的价值和存史的价值。

第十六条 年鉴资料应具有连续性和可比性,能正确反映事物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第十七条 年鉴资料应真实,人名、地名、时间、事实、数据、图片、引文等应准确。

第十八条 年鉴采用的数据应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未列入统计范围的,以业务主管部门的为准。数据不一致时,应加以说明。

第十九条 年鉴编纂单位应拓宽资料搜集渠道,资料除依靠各供稿单位提供外,还要通过查阅档案、报刊和提炼网络信息,以及调查访问等方式进行搜集。

第四章 内容

第二十条 年鉴内容应存真求实,客观反映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第二十一条 年鉴内容记述应综合运用多种形式,其主要形式是条目,条目分为综合性条目和单一性条目等类型。

第二十二条 条目。条目编写应做到:

(一)选题选材注重有效性、完整性和新颖、准确、系统。

(二)综合性条目反映年度内各个领域发展变化的总体情况和主要特点,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单一性条目一事一条,基本要素齐全。

(三)信息含量大,避免空洞无物和简单重复。

(四)坚持述而不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五)标题中心词突出,题文相符。

(六)条目排列有序。

第二十三条 大事记。选录大事要得当,做到重要事项不漏,记述要素齐备。可将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

第二十四条 图片。图片选用注重典型性、资料性,突出反映重大事件、重要成果和热点问题。图片要清晰、美观;文字说明应简洁、准确、要素齐全。地图选用和绘制应遵守国家关于地图管理的法规和有关规定、办法。

第二十五条 表。表格包括表题、表体以及必要的表注等。表格内容要准确,设计要规范。

第二十六条 附录。附录内容应具有参考性、实用性和便览性。

第二十七条 其他形式。年度内具有特殊意义的资料可采用特载、特辑、专文、专记或其他形式集中汇编。

第二十八条 人物记述可采用简介、名录、表等形式,入鉴人物应严格掌握标准,人物记述应做到客观、准确、公允。

第二十九条 年鉴应设编辑说明,主要介绍年鉴编纂的指导思想、记述的时空范围、栏目的设置情况、资料的来源等事项。

第三十条 年鉴具有工具书性质,应有完备的检索系统。年鉴应编制中文、英文目录;中文目录详至条目。索引应提供丰富的检索信息,名称概念清晰,标目符合主题原意,标引准确。

第三十一条 年鉴内容记述应减少交叉重

复,多处记述同一事物的应各有侧重。

第三十二条 年鉴使用记叙文、说明文等文体,文风要朴实,记述要流畅。

第三十三条 年鉴使用规范、统一的简称和缩略语,名称、时间、地点、事实、数据、计量单位、术语等的表述前后要一致。

第五章 出版

第三十四条 年鉴编纂应建立健全审读、审核和校对制度,以确保质量。

第三十五条 语言文字、标点符号、汉语拼音、数字、计量单位使用和索引编制、图片选用等,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

第三十六条 编辑校对应符合国家出版物质量管理的规定,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一。

第三十七条 封面设计应庄重大方,年鉴名称、卷号要醒目。

第三十八条 版式设计应疏密得当,留白页少,字体、字号选择要既能区别结构层次,又有较好的视觉效果。

第三十九条 版权页刊载版本记录应完整。

第四十条 采用16开本(889×1194mm),文字横排。

第四十一条 印刷、装帧应符合国家出版物质量标准。

第四十二条 制作出版电子版年鉴,应遵守国家关于电子出版物管理的规定。

第四十三条 年鉴应逐年编纂,做到在出版年度的上半年内出版。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志工作机构可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五条 专业年鉴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六条 本规定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高台战略地位考述

常登成 赵永全



高台位于祁连山脉以北,巴丹吉林沙漠之南,在河西走廊天然通道中段“蜂腰”部位,是东西往来的必经之地。清朝乾隆二年肃州分巡道黄文炜编纂的《重修肃州新志·高台县》中记载“祁连远拱,合黎近峙,白城山顾于前,黑河水绕于后,可谓屯田、用武、控扼戎番之要地”,县域内“山岭崔嵬,石峡险隘”、“泉水环绕,山河襟带”,两山夹一河的地形,造就了高台乃甘肃河西走廊的交通要道,境内存在大量汉明两代修筑的军事防御体系——长城遗迹,可以证明,在明朝以前的冷兵器时代,高台一向是中原封建王朝经略西北的军事重镇,故有“三秦锁钥,五郡咽喉”之称。

高台境内地势平坦,黑河自东南向西北纵贯,河流沿岸水草丰美,是古代游牧民族迁徙驻牧的天然场地。西周以前古代羌人盘踞活动在此,春秋战国时期先后有乌孙、月氏、匈奴在此为争夺这块游牧的最佳地方而不断征战。约在公元前 240 年,月氏击败乌孙,占据河西,迅速发展强大起来。秦汉之际,匈奴人在冒顿单于的领导下击败月氏,掌控河西,时时觊觎秦朝边境,骚扰边民,秦始皇倾全国之力,派蒙恬率几十万大军斩杀北方和西北的匈奴,将匈奴赶出河套和河西地区,又修造万里长城,以拒匈奴。秦末楚汉战争之际,匈奴再度南下,占据河西,以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为游牧基

地,日渐强大,握“三十万控弦之士”,并有以河西走廊为前方阵地“东越关陇,南下牧马”的野心,成为西汉王朝的劲敌,汉高祖以武力战匈奴失利,其后几十年间被迫采取和亲政策,以换得边境安宁。汉武帝时汉朝国力日渐强大,开始调整对匈奴的政策,先派张骞出使西域,了解西域各族情况,进而派卫青、霍去病征战河西,霍去病在合黎山一带,与匈奴主力开战,歼敌 3 万多人,擒获 2500 余人,击溃了匈奴在河西的力量,开辟了丝绸之路,高台成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沿黑河北上的镇夷峡,可直通往古居延海,是去匈奴龙庭的必经之道,古称龙城古道,这条道路是历史上匈奴和其他民族南下的重要通道之一,汉武帝收复河西后派大将赵通留守镇夷峡,再从内地大量移民以实之,并在周围大规模修筑长城、关塞、烽燧,以扼守咽喉要塞。从匈奴失去河西以后流传下来的民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夺我金神人,使我不得祭于天。”可以了解到,失去了祁连山下的河西地带,匈奴这个北方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开拓者,赖以生存的畜牧业遭到巨大损失,经济也崩溃了。由此可见,在秦汉以前,无论是汉族还是游牧少数民族都非常重视这块地方,占据它以后,都把它当做驻军屯田的绝佳地段,以防御它族掠夺。

东晋时期,高台先后有前凉、后凉、西凉、北凉割据,相对于政权更迭、血腥十足的中原地带,河西走廊还算基本安定,但在此相继也发生过段业反对后凉和北凉、西凉之间的战争。公元695年,唐朝肃边道行军大总管王孝杰在高台(今许三湾)置建康军城,驻兵5300名,发展屯田养兵,以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和朝廷在当地的统治,西北面可以控制居延泽一带安置南来归附的突厥部落,同时巩固黑河沿岸唐蕃古道要冲的战略枢纽地位。“安史之乱”后河西空虚,吐蕃乘虚而入,公元848年张议潮收复河西四郡归唐,后又为回鹘所有。宋时高台属西夏,元代属甘州路总管府,历史记载不尽详细。

明太祖洪武五年征西将军冯胜进军黑河流域,攻下了元军亦集乃路(今额济纳旗)残余的最后一个据点黑城,使黑河一带成为明代西北边防的前沿,对中原的稳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冯胜在此置高台站,公元1392年,明代政府裁革甘肃卫,在黑河上游置山丹卫,中游设甘州卫辖高台站。公元1396年,在今天城村附近设哨马营,公元1397年将哨马营扩建,置镇夷守御千户所,屯驻兵额设1223名(据万历《肃州志》载),公元1456年改高台站为高台守御千户所,驻兵额设1465名。明代把驻军屯田移民戍边作为保障王朝长治久安的一项重大决策,高台、镇夷守御千户所的设置,对外防御侵略,巩固边防,对内维护其统治,同时进行屯田生产供应军队。明朝时期,统治者也在高台沿合黎山一带采取了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举措,这些都有利的保护了常年受北元蒙古贵族鞑靼、瓦剌掳掠的边境百姓生活的安宁。《高台县军事志》记载,公元1524年,也就是明嘉靖三年吐蕃入侵,致高台所属沿山红崖子等堡居民逃窜;公元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2月瓦剌攻红崖堡、青湖等地,为明军所阻。从此处可以认识到,高台百姓常年受鞑靼瓦剌的骚扰,明王朝统治者在高台设两个守御千户所的军事举措和其他一些防御措施是护国安民的明智之举。

清朝由于疆域广阔,高台的军事地位不是很突出,自清顺治至乾隆年间在高台的驻兵总额才

376名,在公元1725年(雍正三年),高台、镇夷二所合并为高台县。

民国时期,高台长期被马步芳、马步青兄弟占据。1936年红四方面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组建西路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西路军继续执行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在1937年元旦红五军在军长董振堂的指挥下,一举攻克高台县城。中共中央打算从全民抗日的战略出发,提出将河西走廊划为红军的驻地。马步芳、马步青兄弟不甘心失败,集结青海、甘肃7万余马家军,采取分层包围、四面发动攻势的人海战术,攻陷高台。“二马”之所以结集重兵誓死夺取高台,也是因为高台在甘青宁新四省战略上的重要军事地位。

查阅《高台县志》人物传记,三国时的庞涓、南北朝时的史宁、明末的白兆庆、清代的阎相师及其子阎御璋,大多均为行伍出生的战将。正是因为古代高台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地位,频繁战争的发生,使得历朝历代都很重视驻防重兵,这也可能造就了古代高台民间尚武的风气,使得高台“时势造英雄”,特别是镇夷一带,白兆庆(官居九门提督)、阎相师(官居甘肃提督)、阎御璋均为镇夷人。高台在军事上的重要战略地位,由此也可窥豹一斑。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七师进驻高台,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交通日渐发达,高台也失去了它往昔军事重地的战略地位,但它依然还是发挥着甘肃河西走廊经济贸易文化往来交通要道的作用。

(作者单位:高台县志办)



伏羲生于成纪新考(上)

马志荣

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文化是中国史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伏羲作为“人文始祖”在历史上被尊为三皇之首,对人类文明做出过重大贡献。伏羲创立和倡导的古文明,由当时的成纪沿略阳川水、瓦亭水、渭水、黄河,向东经关中,途中原,影响华北、东南,人类逐步形成了以炎黄部落为核心,以伏羲文化为本体的华夏民族;因伏羲“人首蛇身”而崇奉的蛇图腾,也由西北黄土高原蔓延神州大地,进而演变为龙图腾,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特别是经伏羲首创,商周以后逐步完备的八卦易经学说,在历史上成为东方哲学的重要载体、治国修身的行为准则、审时度势的分析依据、发明创造的激活因子。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至今仍吸引着学者、教授、专家的不断探索研究。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伏羲及伏羲文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尤其是有些专家试图从追溯“神话的源头”来接近历史的真实。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路,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是,对于伏羲的研究仍然局限于对文献记载、传说和神话的研究。为了挖掘和研究伏羲及其文化的历史原形,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文献资料 and 大地湾遗址为依据,把文献研究与历史考古结合起来,把材料的全面性和实在性相结合,把经验归纳法同理论的概括性相结合,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和研究分析与实地考察的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研究伏羲生于成纪的问题,这对挖掘研究伏羲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继承和弘扬伏羲文化的优秀成果,促进甘肃东部地区乃至全省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旅游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伏羲其人

几千年来,人们对于伏羲的研究由于缺乏史实的支持,一般把伏羲当作传说中人。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一大遗憾。对此,许多人从中华民族感情方面难以接受。人们在苦苦探索着。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探索尽管有很大成就,为我们研究伏羲提供了十分可贵的基础,但在其内容方面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许多差异和误传或者打上神秘的印记,这就对研究伏羲及其伏羲文化增添了困难。包括司马迁在内,他认为:伏羲的“纪”难作,于是放弃了对其作“纪”,直接从“五帝”开篇,后来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但仍然是依据民间传说和神话而作。我们知道,对远古文化、远古人物的研究,离不开传说甚至神话,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文字,也没有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的传世信史,难免在口头传承中会产生差异,甚至神化英雄人物。当然,我们相信这些传说和神话不是凭空而来,是有历史原型的。特别是大地湾遗址的发掘,对解开这个“谜”提供了“金钥匙”。使《山海经》《易经》《尚书》《淮南子》《史记》《水经注》《纲鉴易知录》等诸多经典中对伏羲的记载找到了“根”,伏羲从“神变成人”。当然,至今在所有的研究中,仍未找到“伏羲真人”的历史证据,但伏羲文化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大地湾遗址又为其从事实上提供了不可置疑的存在依据。有伏羲文化,就有创造伏羲文化的人,无论他叫什么,创造伏羲文化的人是真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伏羲是存在的。他诞生在古成纪所在地——秦安略阳川。

有关伏羲的记述在先秦典籍及以后的历代古籍中屡见不鲜。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记载:“太皞庖羲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羲于成纪。蛇身人

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俚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羲氏。养牺牲以充庖厨,故曰庖羲。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太昊庖羲氏,风姓也。母曰华胥,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长于成纪。”伏羲是中华民族心智的先启者和远古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他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始作八卦。《周易·系辞下》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孔安国《尚书·序》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史记·太史公自序》曰:“余闻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上述记载都说伏羲始作八卦。八卦是分别代表天、地、水、火、风、雷、山、泽的八种“物”、“象”,尤其是“阴阳”规律的发现及运用,使“易”成“经”,成了人们的活动规范。

(二)教渔猎。《周易·系辞下》曰:“伏羲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尸子·君治》曰:“伏羲之世,天下多兽,教人以猎。”伏羲教人们用绳索织成网,捕捉禽兽与鱼类,获取大量的肉食品,以改善先民们的生活。伏羲教民织网,在他们烧制的陶器上也常见到鱼纹或变形几何鱼纹图案。由于工具的改变,不但使渔猎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也使原始农业和畜牧驯养业同样得到了发展。也就是说伏羲不仅教民“养牲畜以充庖厨”,而且也教民对捕获的有些野兽进行驯养,这样就渐渐地使畜牧业得到了发展,伏羲也就成了畜牧文化的先祖。

(三)造书契。《周易·系辞下》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造书契,就是指镌刻的符号,用镌刻的符号来代替了上古时的结绳记事和结绳记数。“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指的就是伏羲造书契。就是说有什么事情必须要记下来,就首先用一些有固定含义,能在较大范围内通用的符号或画在某种特定的记事记数的东西上,约定俗成,大家公认。大地湾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刻画的几

十种符号和一些陶罐、壶、瓶上面的彩色陶纹告诉我们,早在6000多年前,我们的后世圣人伏羲就由结绳记事进化到了象形符号阶段。我们可以说刻画符号,也就是象形文字的雏萌。

(四)制嫁娶。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人类过着原始群居生活,生活上一个氏族聚居在一起,“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有男女之别,但无家庭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群婚制的弊病越来越明显的表现出来。三国谯周《古史考》曰:“伏羲制嫁娶,以俚皮为礼。”到了伏羲时代,禁止那种不媒不聘,就是说用鹿皮可以作为婚姻的聘礼,既表示成双成对,又说明了明媒正娶的族外婚取代了人类落后的群婚制,这是人类婚姻制度上的一大变革,是人类社会的很大进步。

(五)作历法。《周髀·算经》曰:“伏羲作历法度。”所谓历法就是指历法的四时八节。伏羲时代历法与原始农业关系甚密,先民们为了农耕,就要计算时间,预测节气,安排农事。为了掌握日月岁时,伏羲“象天法地,始有历度”,就是说伏羲始作历法,教人们熟悉一定的气象知识,引导人们按四时八节有秩序地适时耕获。同时命昊英为潜龙氏,造甲历,在生产实践中不断认识修订和完善历法。

(六)兴瑟乐。《说文》释曰:“瑟,庖羲氏所作弦乐也。”西晋王嘉《拾遗记》载:“庖羲氏灼土为埴。”唐司马贞《三皇本记》载:“伏羲作三十五弦之瑟。”相传原始先民在长期弓镞使用中,发现了弓声悦耳,伏羲受到启发,曾析木为琴,发明了三十五弦的琴瑟,始有和民之乐。这是被马家窑等许多古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罐所证实了的。

这些文献记载在大地湾均能得到实证。伏羲诞生在大地湾所在地略阳川,大地湾遗址就在略阳川的长虫梁;伏羲代遂人氏王天下,有用“火”的高超技术,大地湾就有先进的制陶技术与“火”的运用;伏羲文化中有龙图腾、八卦太极图,大地湾有“龙虎兽”图、类似太极图的阴阳消长示意图式;伏羲“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大地湾早期的陶器上都有“绳纹交叉”(网)饰纹;伏羲造书契,结绳以代之政,在大地湾出土的陶器上刻有几十种记事符号;伏羲“制嫁娶”,在大地湾早期遗存中发

现了体现“家”的“蜗形半地穴式窝棚”的庐屋；伏羲“养牺牲以庖厨”，大地湾遗存中发现了谷物、植物以及犀牛骨、猪、狗、鹿、羊骨。

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文英先生在他的《伏羲文化》一书中也论述伏羲的原始背景和文化内涵，颇见功底。他说：“《遁甲开山图》以‘大庭氏’为伏羲名号的开始。‘大庭氏’之名亦见于《庄子·胠篋》和帛书《经法·十六经》，这个称谓说明这个氏族以建筑大房子为特征，但不知其活动地区。然在大地湾遗址中，我们则可以生动地看到一个以大房子为特征的氏族。在属于仰韶文化早期和中期的地层中，目前已发现一百多个半地穴式的房址。从布列和外形来看，都是一座一座大房子，后来周围又出现若干小房子。早期大房子的面积，一般为16—20平方米，门道紧连灶坑，其他三面供人休息，显然是氏族大家庭生活的地方。中期大房子的面积进一步扩大，有的竟达60平方米。到了晚期，则从半地穴式发展为平地夯土立柱起建，并且出现一些超大型建筑。F405房址面积为270平方米，F901房址面积竟高达420平方米。其结构有主室、东西侧室、后室和门前建筑，室外还有壕沟。在中国仰韶文化房址中，上述大房子在西安半坡和姜寨也有所见，很可能是大地湾文化的传播，而这种超大房子则绝无仅有，因此传说中的大庭氏非此莫属。这样说来，伏羲氏族系统大约在6000多年以前，从大地湾开始他们的活动。从大庭氏开始，伏羲的名号到底是否世袭十五代，或者说伏羲氏族系统是否十五代，我们认为这个数字大可不必认真和计较。然世袭十几代充分说明，伏羲名号所反映的肯定不是一个短暂时期，而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代。大地湾仰韶文化前后延续2000多年，完全同这个历史时代相一致。既然伏羲代表了一个历史很长的氏族系统，从生存的需要来说，一代一代很多有血缘的氏族，不能固定生活在一个地方，必然要四处迁移。荣氏《开山图注》曰：‘伏羲生成纪，徙治陈仓。’古成纪在今天水市秦安县北，其地望正和大地湾的位置相合，陈仓在今宝鸡市东。有趣的是，大地湾一期文化正相当于宝鸡北首岭史前文化，而北首岭恰在陈仓的地域之内。大地

湾二期文化相当于西安半坡文化，三期文化相当于陕县庙底沟文化。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特别是仰韶文化时期，确有一个氏族系统沿渭水与黄河不断向东迁移与活动。”刘文英先生的这段论述入情入理。《遁甲开山图》记载：“女娲氏没，大庭氏王。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偃连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阴康氏、朱襄氏、无怀氏，凡十五代，袭庖羲之号。”《纲鉴易知录》记载：“大庭氏是一个以建造大房子为特征的部落。自大庭以后代立的十五代，均沿用伏羲这个名号。”从大地湾建造的大房子和这些记载中明确可以看出，秦安大地湾就是伏羲、女娲及其后代生活和活动的地方，说明伏羲和伏羲氏族都是从这里开始活动，沿渭水与黄河不断向东向四处迁移和发展的。

二、伏羲生于成纪之成纪考

伏羲生于成纪，这一点是公认的，无疑义的。但是作为伏羲出生地的成纪的地理位置是在什么地方，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一)成纪地名早于汉成纪县见于史册

据考，伏羲生于成纪，也就是伏羲出生的地方，并不是始见于汉代的，伏羲也不是出生于汉代成纪县治旧地。据史料记载，汉成纪县是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3年）所置。而成纪地名早就见于史册。《史记·封禅书》曰，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78年）“黄龙见成纪”，比元鼎三年早65年，比此说更早的是《史记·李将军传》说李广祖李信从槐里移居成纪。李信为秦时大将，曾与王翦共灭燕。这是战国之时的成纪。《晋书·地理志》说：“镐京五尺孩童皆能口诵，史官弗之书也，庖羲氏生于成纪而为天子都于陈。”镐京为西周京都，此为西周时成纪。新编《甘肃省志·大事记》记载：“商小乙二十六年，戎人侵成纪”，将成纪见于史载的历史推至商朝（为叙述方便，我们将此时成纪称作古成纪）。

(二)古成纪的地理位置在略阳川

《后汉书·隗嚣传》注曰：“成纪故城（注意“故城”二字）在今秦州陇城西北。”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后人在读解“陇城西北”时，往往将古成纪地名与成纪县名混为一谈。《后汉书》的注者唐章怀太

子李贤生活在公元657年—684年，而成纪县从小坑川移治敬亲川是唐开元22年，即公元706年，比章怀太子生活的年代晚18年，章怀太子所称的“成纪故城”就不可能是始建于元鼎三年的成纪县，也不是敬亲川之前的小坑川，而是小坑川之前还有一个故城，这个故城就是汉置成纪县之前的原始成纪所在地，也就是在“秦州陇城西北”。这里的“秦州陇城”当然是《后汉书》注者生活的唐代之秦州陇城了。《旧唐书·地理志》曰：“陇城，汉陇县，隋加城字为陇城”。《汉书》曰“陇（县），师古曰，今呼陇城县者也”（师古亦为唐人）。尽管这里将“陇城”与“陇县”有等同起来的嫌疑，但很明显是指秦安陇城和大地湾遗址所在地略阳川是无疑的。许多史书称“陇城旧曰略阳”。在西汉，略阳川设有“略阳道”，未曾建县。晋置略阳郡，同时在略阳川置略阳县，但略阳郡治在临渭，后迁治陇城。这就有可能把略阳郡的旧治临渭与陇城混为一谈。临渭在陇城的东南，随略阳郡移治陇城而并入陇城。如果说唐章怀太子李贤所指“秦州陇城”就是今“秦安陇城”，在此城的北偏西就有略阳道、大地湾，它们共属略阳川，均与伏羲文化有关。这样无论是“临渭陇城”还是“秦安陇城”，它们的北均为略阳道或大地湾，因为略阳川原建过九座城。

根据以上历史文献的记载，我们到秦安略阳川进行了反复深入的实地考察，发现略阳川的确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远古文明的发源地大地湾遗址在略阳川，伏羲出生地古成纪在略阳川，女娲出生地陇城在略阳川，这里的历史文化与伏羲生于成纪的记载完全吻合。

（三）戎人侵成纪与略阳川

新编《甘肃省志·大事记》记载：“商小乙二十六年，戎人侵成纪。”成纪是个战略要地。“商小乙二十六年，戎人侵成纪”到秦戎攻战，戎人入侵成纪的战事就没有停止过。据王文杰先生《略阳川八千年历史人文概览》记载，从非子至庄公这段时期内，秦与戎互为仇敌，攻伐不休。周厉王时，也就是秦仲三年（前842年），西戎攻灭犬丘秦嬴部落的大骆族。初，王以秦仲（非子曾孙）为大夫，秦仲奋起伐戎，为此献身。周宣王即召秦仲五子，与兵七

千，复伐西戎，大获全胜。宣王乃立秦仲长子，予以大骆（非子父）旧地，为西垂大夫，是为庄公，居西犬丘。其后，秦襄公、秦文公都长期定居于此。相传，当时的犬丘是一块地势开阔，丰地沃野，绿草如茵的富饶之地，极适宜于畜牧业的发展。西周末年，“不与西戎战之于西，御追于略”，就是追西戎至今略阳川一带。为了争夺富饶之域，秦戎在西部边陲长期进行攻伐战。

考察略阳川一带，的确有不少秦人征战和活动的遗址。在距汉街城（今名陇城城）南4公里处，有一山名“秦避难山”，就是说秦人因战事退避在此山一带防守。

（四）李广祖移居成纪与略阳川

《史记·李将军传》说，李广祖李信从槐里移居成纪。乍看起来这与略阳川没有什么联系。但成纪这个特定的地名将二者联系起来，李信的特定身份又将二者有了实质性的连接。李信是秦时大将，曾与王翦共灭燕。是个有战功的将军，这个身份与秦戎攻战联系起来，“移居”的原因就会清晰起来。就是说李信从槐里移居成纪与此地战事有关之外，略阳川还是秦人先祖发迹和重要的活动地，李信移居此地，可以说是为秦人守卫福地。略阳川经常出土一些镞、矛、带钩、车马器残片等战国青铜武器和战国铜布币等遗物。1967年在这里的上袁村的窑沟坪上发掘秦墓2处，出土的陶器、铜器、铁器共39件，其中有珍贵文物秦权 and 秦铜灯已上交北京博物馆。秦权即后世民间俗称的“秤砣”。在秦代载有诏铭的计量器物存世颇多，一般只刻始皇六年诏，多为“单诏权”，有的或称“铜诏铁权”，“两诏铜权”就比较著名，上袁村秦墓出土的是一件“两诏铜权”，高7厘米，底径5.2厘米，重250克，权体为钟形，中空。诏文篆刻在觚棱间的平台上，始皇廿六年诏7行40字：“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二世元年诏9行60字：“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矣，如后世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右，使毋疑。”诏文用阴文小篆，字体

工整秀丽,笔画遒劲流畅,为存世秦篆中的佳作。祝中熹先生说:“秦安上袁家村所出这件两诏铜权保存完好,无锈蚀残损,能较准确地反映当时秦斤的标准重量,故很受学界重视,把它看做确定秦斤标准的重要依据。它不仅是秦王朝统一伟业的历史见证,也是研究古代衡制的珍贵实物。”秦墓还出土有铜车马、三足铜鼎、月牙斧等遗物,有犬、羊、牛头等殉葬品。目前,此地已有好几处古墓被盗,秦砖、汉瓦随处可见。并在略阳川及其周边的龙山、连柯、松树、白驼等地区出土了战国及秦国时期的瓦当和盘龙形青铜带钩,两件带钩出土于战国时期的墓葬,据专家判定,墓主人应属于驻守边寨有一定官品的武将。尤其此地出土“三足鼎”,乃国之重器,说明此地的重要性,李信移居此地,很可能是封赏之举。

(五)伏羲出生于“娲羲”集团的根据地

文献称华胥氏“履大人迹”生伏羲,这显然是神话的表述手法。那么华胥氏怎么又与伏羲联系起来呢?大地湾的遗存告诉我们,“华胥”即“娲羲”,是女娲氏和伏羲氏部落联盟的简约称谓。

1.“华胥”即“娲羲”

大地湾遗址地处略阳川北偏西部,从它已面世的遗存来看,就是伏羲氏的文化特征,这方面已有许多学者予以论述,本文亦将进一步探讨。距大地湾遗址南去15公里,便是女娲氏出生地——风沟,这里有著名的女娲洞,有以“风”姓命名的“风台”、“风茔”等历史遗址和有关女娲“抟土造人”的“龙泉”遗址以及丰富的女娲传说。大地湾遗址中同样发现了女娲文化因素(下面还要论及),这从客观上为“华胥”出自“娲羲”提供了线索。

在远古,人们交流主要是靠语言进行的。由于地域关系,人们的发音是有差异的(秦安一带方言至今十里不同音),“华胥”与“娲羲”的发音略有不同,这是有了文字之后文人们对民间语言的标音式记录。这种记录也是因地方而异、因人而异(这种同字不同音的现象至今大量存在)。其他不说,仅象人们对伏羲的写法就有“伏羲”、“伏牺”、“赫胥”、“包羲”、“庖羲”、“虑栖”等等,都是在标音记录时的差异。这些写法在普通话中有不同读音,

但在一些方言中的读音应是差不多的。因此,“华胥”、“娲羲”只是在读音方面的差别。有些文献不也将“华胥”写作“赫胥”吗?在上述“伏羲”的写法中也有“赫胥”的写法。这个称谓告诉我们两个问题,一是告诉我们伏羲的籍贯是“娲羲”;二是告诉我们也有可能这个联盟的代表人物以联盟之名而名,称作伏羲。如果是这样,又开了中国传统中以地名、官名为人名的先河。

2.伏羲女娲联盟的见证——“龙虎兽”

大地湾遗存中有一件陶壶,上面绘有四只动物,现时人称其为“四犬争鱼图”或“斗犬图”。这是一幅原始的“龙虎兽”图(图1)。这四个动物分为两类,一类鳞身、鸟嘴、双足、虎尾,姑且不去究其何物;另一类从形态看应是兽类,其特征是蛇头、双角(也有人认为是双耳)、环眼、鳞身、虎尾、四足。这一类给我们传递的信息是一个多种动物肢体组成的类似龙的动物。这种动物应该是多种文化融合的象征物。从其文化特征看,应是女娲氏和伏羲氏文化的结合。蛇是女娲氏和伏羲氏共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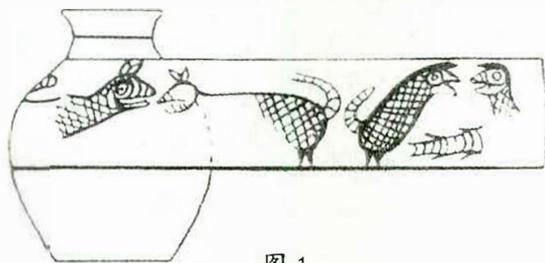


图1

文化物象,也是男根的象征,也可以认为是女娲、伏羲结合性质的表现;“双角”是一种示意,说明其凶猛的特征;其身躯是一条头尾倒置的鱼,胫瘦而臀肥,鱼是女阴的象征,鱼身就是女娲氏的象征,身上有鳞,可以视为多子,是对女性的期盼;“虎尾”是伏羲的独有特征。近年来,有些学者继闻一多先生的思路,对一些少数民族历史遗存文化的研究中发现伏羲氏早期是以虎为图腾的,有些学者就直接认为伏羲本人就生就虎像(虎鼻山淮),太皞之“皞”也是虎的意思。从大地湾“龙虎兽”的特征看,也为此观点提供了支持。大地湾“龙虎兽”的发现,有力的证明了女娲、伏羲融合事实。

3.女娲文化在大地湾遗存中的独特表现



学界共识,女媧的基本品格是“抔土造人”,对于“媧”训作“蛙”、“蜗”,也没有异议。这个女媧的基本品格在大地湾遗址中留有突出的表现。众所周知的大地湾“人头彩陶瓶”(图2),有人认为是女媧的象征,人们没有将其供奉起来焚香礼拜,而是造成英雄形象的器物,实用于生活之中,让人们永

图2 远不要忘记英雄的功德,

祐佐人们丰衣足食。这种独特的崇敬方式还反映在建筑物中。大地湾早期房屋遗址已发掘四座,均为“圆形半地穴窝棚”建筑,面积6—7平方米。意义在于其圆形状的不一。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圆边线开口(门口)的一端内收,另一端外伸,是一个很形象的蜗牛的平面图形(图3)。使人很自然地就会与女媧联系起来。这也是大地湾先民对“抔土造人”圣人的纪念方式,也是对英雄的一种期望,希望继续生活在母亲的怀抱中,得到庇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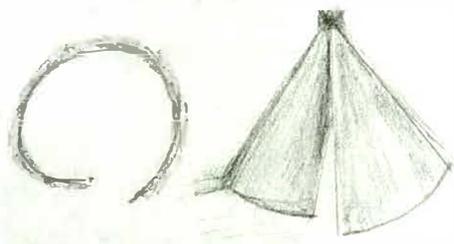


图3 蜗形半地穴窝棚示意图

这种朴素的习俗至今在天水秦安一带民间存在着。农民在庄稼、瓜果成熟季节,就会在田头地边搭建临时工棚,酷似大地湾窝棚,人们仍称其为“窝棚”、“窝铺儿”。民间将空间窄小的房子喻为“窝铺儿”,有些地方将“家”俗称为“窝”。这些都是大地湾遗风。这种遗风在一些地方还以另种方式表现着。天水卦台山上的卦台堡俗称“蜗牛堡”。有专家认为“蜗牛堡”就是“媧女堡”的转音,这说明通过地名、建筑物纪念女媧的习俗比较普遍,也说明了女媧与伏羲之间不可否认的重要关系,还说

明了大地湾遗风的深远影响。“窝”字系何人所造,不得而知,但它是大地湾“半地穴蜗牛形窝棚”的形象符号,上“穴”下“宀”,则一看就明。

综合上述几方面的史实和考古发现,无疑将古成纪与略阳川有机地联系起来,古成纪即略阳川。

三、略阳川与大地湾——伏羲文化的发源地

略阳川与大地湾我们在前面的讨论已多次涉及到,它是我们研究伏羲文化的金钥匙。

(一)略阳川的文化遗迹

略阳川位于秦安县城东北45公里处,有源自陇山的略阳川水(今名清水河)从东向西流归葫芦河后入渭河。川域面积约80平方公里。远古时代,略阳川土质肥沃,资源丰富,气候湿润,植被茂密,生态环境要比现在好的多,很适合人类生息繁衍。略阳川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成纪文化和三国文化等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这里有有史记载的九座古城和大量的文化遗址。涉及本研究课题的就有:

1. 陇城故城,位于秦安陇城镇,占地200余亩。根据历史史料记载和实地遗物的考证,这座古城最迟也是始建于战国时期的,也是一座名称较多和功能多用的古城。这座古城既是军事要塞,又是丝路商城,也是汉唐以来州、郡、县、寨的治地用城。它的古名曰“龙城”,西汉时期叫“街泉城”,东汉更名“略阳城”,俗称“汉街城”,也就是街亭故城,北魏时期更名“陇城”直到现在。陇城城古名龙城,造形为“八卦城”。在城东有龙山、兴龙山、八卦山;城南有盘龙山、龙头山;城西有九龙山、青龙山、长虫梁;城北有龙泉山、八卦顶。

2. 略阳道故城,位于秦安五营乡,东距陇城古城4公里,西距大地湾遗址2公里,是西汉略阳道治地。建武八年(公元32年)光武帝刘秀为了夺取略阳道故城,控制陇右,派中郎将来歙率精兵袭得略阳道故城后,隗嚣率兵数万,积水灌城,围攻略阳道故城。刘秀亲征隗嚣,发兵“数道上陇”,对隗嚣实行战略包围。略阳围解,隗嚣败奔西城。刘秀得其要城,陇右地尽归东汉。

3. 莲花故城,位于秦安莲花镇。这里是东经略阳川跨越陇山进入长安,西经仁大川跨越雷达湾

进入陕西的咽喉要道,是略阳川西端的重要门户,历代统治者都派重兵把守。

4.文化遗址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女娲洞、风沟、风茔、女娲祠、风台梁、“抔土造人”的龙泉、八卦城、八卦山、八卦顶、伏羲寺等,以大地湾最负盛名。

通过对文献记载的研究和赴秦安略阳川实地考察,以及大地湾遗址的证明,完全有理由可以确定:古成纪在秦安略阳川。

(二)大地湾文化与大地湾遗址

大地湾遗址位于略阳川长虫梁。大地湾文化是我国黄河流域最古老的原始文化,内涵丰富,特征鲜明。大地湾文化主要包括新石器早期文化、仰韶文化、早期齐家文化三个阶段的遗存,是一处延续时间长达 3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文化底蕴堆积深厚,内涵十分丰富。大地湾遗址遗存大致包含五个文化期。

大地湾一期文化是新石器早期文化期,距今约 7300 年—7800 年。在遗存所在地层的灰坑、房址、墓葬中发现的谷物、植物以及犀牛骨、猪、狗、鹿、羊骨和其他兽骨等表明,大地湾遗址所在地略阳川是我国的粮食作物和油料作物的种植地,是中国早期的农业发源地。

大地湾二期文化是仰韶文化早期型文化,距今 6000 年—6500 年。在二期遗址发掘出一座完整的村落,是一座典型的向心式格局环壕式聚落。从发掘的房址、灶坑、墓葬、窑址、灰坑和窖穴、壕沟和出土的陶、石、骨器等各类文物中,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史前先民和谐的生活场景。

大地湾三期文化是仰韶文化的中期型文化,距今 5500 年—5900 年。发掘的房址、灶坑、墓葬、窑址、灰坑和窖穴、壕沟和出土的陶、石、骨器等遗迹遗物表明,中华民族文化开始进入繁荣阶段。

大地湾四期文化是仰韶文化的晚期文化,距今 4900 年—5500 年。发掘的房址、灶坑、墓葬、窑址、灰坑和窖穴、壕沟和出土的陶、石、骨器等遗迹遗物表明,人们密集的氏族居住区,形成了众星拱月的格局,作物品种以粟为主,农业得到了空前发展。

大地湾五期文化是仰韶文化之后兴起的史前

文化,相当于早期的龙山文化和晚期的齐家文化,距今 4800 年—4900 年前后。在大地湾所在的略阳川分布比仰韶文化更为密集,每隔三五公里就有一个文化遗址。从出土的遗迹遗物中说明在这一时期的略阳川生产力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大地湾发现和挖掘出的文化遗存和出土文物,证明了中国农业的起源、中国彩陶的起源、中国传统建筑和宫殿建筑的起源、中国绘画的起源、中国文字的起源、中国古城的起源,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农业、彩陶和文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七八千年前,把农耕文化、建筑文化、陶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研究我国泾渭流域和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和可靠的标尺,也有力地批驳了中华文化外来说的论调。

(三)伏羲文化及大地湾文化的共同特征

现代人文地理学认为,人文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是和谐发展的。从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角度看,各种文化要素在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地域特征。伏羲文化与大地湾文化的契合,使其更加伟大,更加充实,特征更加鲜明。

1.创造性特征

从伏羲始作八卦、教渔猎、造书契、制嫁娶、作历法、兴瑟乐,到伏羲龙图腾、阴阳运动太极图的形成和发展;从《易经》到《周易》的形成,都体现出了伏羲文化的创造性特征。

2.以崇拜太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特征

太阳崇拜是远古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据专家考证,中国远古依然存在过太阳崇拜,在大地湾遗址中也有明显的发现。大地湾出土的早期陶器、陶片上有“+”符号,据考证这正是太阳的符号。这种符号,凡是在出现过太阳崇拜的地方均频繁出现。已故丁山先生认为这个“+”符号是太阳神的象征,这个结论已得到学界的认同。这就说明了在大地湾的远古存在过太阳崇拜的事实。有些专家还对此作了更深入的论证,认为古籍称伏羲为太昊的“昊”,就是太阳。付小凡、杜明富先生在《神话溯源》中更明确地论证了伏羲就是中国远古的太阳神。因此,在伏羲出生地大地湾先民们不仅崇拜太

阳,而且对太阳有着更加深邃的认识。太阳符号“+”出现在大地湾早期遗存陶器口的宽带上(图4),就意味着天空有了太阳,不正是“一画天开”吗?不正是后世人伏羲功德的概括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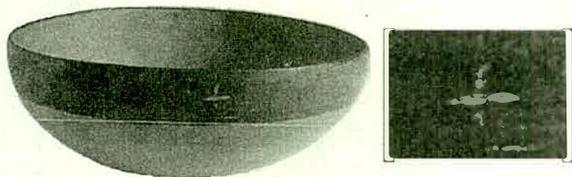


图4

(1)太阳光使先民们形成了阴阳“意识”

“阴阳”是伏羲八卦的本质要素。远古人对阴阳的认识过程并不复杂,也不神秘。农业的发展,一方面使人们逐渐对自然有了认识,另一方面在不断地提高认识自然界的自觉性。人们整天生活在太阳下面,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也是太阳。有了太阳,就有了阴阳。太阳照到的地方的就光明,照不到的地方就阴暗,有太阳的天就亮,没太阳的天就暗。《说文》中有“阳,高明也”。高的地方太阳光易照得到,就明。《汉语大字典》说:“阳,山之南,水之北也。”也就是太阳照得到的地方;《说文》中有“阴,闇(an)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闇,暗也。就是“阳”的背面。

太阳照在大地上的基本特征就是阴阳。人们又经过了多少年的观察,太阳光照到不同的地形上就会出现不同的形态;太阳光照时间长短与光照的方向对农作物会有不同的作用;太阳的强弱与天气的冷暖又产生联系……而这些现象都可以用阴阳的道理来说明。人们对阴阳的认识逐渐从直观的感性向理性发展,终于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命题。

(2)太阳启发先民萌发了运动意识

大地湾先民们对运动的认识也是来自对太阳的观察。远古时期,在自然界可以动的,除飞禽走兽等动物外,天空中会动的就是太阳了(月亮动的太慢)。先民们对太阳运动的认识也是表象的、直观的,甚至认为是一只大鸟驮着太阳走,因而就有了将太阳比作鸟的说法。古籍中也有太阳和鸟结合起来表示太阳运动的形态(图5)。大地湾遗存



图5 河南出土汉·负阳鸟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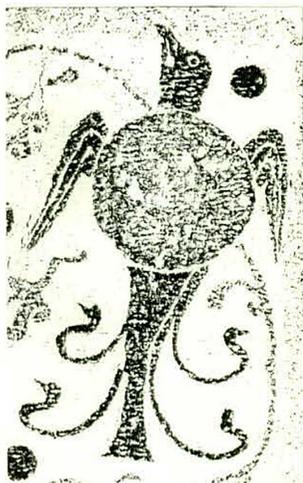


图6

中也发现了太阳和鸟结合的图案(图6),与古字“日”(日)字的形态很是形似。

这可能就是太阳的原始物象。太阳是怎么运动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民们了解了太阳会运动,并从中悟出了他们想知道的东西,进而把圆和运动联系起来,有了旋转运动的概念。大地湾早期遗存中就有圆形的“石纺轮”,仰韶文化期的彩陶器上有了表现旋转的图饰(图7)。这种运动意识不仅为伏羲文化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也为理解伏羲文化提供了“金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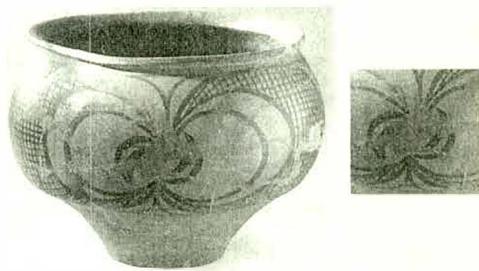


图7

3. 农业文明特征

《补三皇本纪》说伏羲“结网罟以教佃渔”。《周易》说伏羲“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辞源》援引马融的话说,“以佃以渔”,则是“取兽曰佃,取鱼曰渔”,这个意思是十分明确的。但这里的几个关键词需要澄清。《说文》说“罟”,“网也”;又说“网”,“庖牺氏结绳以渔”。以网捕鱼是伏羲的专利无疑。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惜墨如金”的古文里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同意义的“网”、“罟”呢?“网”是伏羲氏捕鱼之“网”;那么“罟”又是何用之“网”呢?如果按照马融所说“佃”为“取兽”之意,“兽”应为陆地行走的动物,这个“罟”也就应是设置在接近地面的“套子”、“绊子”之类。如果按照《说文》对“佃”的解释,这个说法又不通了。《说文》说“佃,中也”。似乎与“取兽”不太吻合,“罟”与“佃”相匹配也失去了意义。然而《汉书·韩安国传》又说“方佃作时,具请罢屯”。颜师古注曰,“佃,治田也,音与田同”。由此可以看出,“治田”、“取兽”均为“佃”的引伸之义。如果将“罟”与“治田”之“佃”匹配起来,实际上就是一种“耕作”形式。“罟”作为“网”有许多“口”,“佃”作为“田”,也有四个口。《说文》说“田,陈也”。就是把四个“口”布在一起为“田”。这就是说,伏羲教人们按照“网”的方孔一样摆布田地。这无疑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

原始农业的本质在于“耕”。就是人类将对自然界现成果实的攫取转变为培育、种植、饲养——即通过“耕作”(生产)而获得。伏羲文化就是为了伏羲氏族部落农耕等方面的需要而形成的文化,他所包含的内容都具有发展农业、畜牧业、渔猎业等方面的文明特征。如伏羲继承了燧人氏以“火”为代表的一切成果,而且得到极大的发展;伏羲氏“养牺牲以充庖厨”,就是农业家庭的特征;伏羲八卦,就是伏羲时代农业文明的产物。

4. 地域特征

文化作为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离不开形成这种文化的历史地理条件。伏羲创造物质财富方面的生产性贡献,主要是“结网罟、以教佃渔”,包括的内容有农、有牧、有畜、有渔。按现在的说法,是个大农业的概

念。这给我们的信息是,发生这个大农业的地理条件,必须是一个有山、有林、有水、有原(塬)的地理环境。有山有林,利于行猎;有水便于渔业;有原(塬)有林(草木)便于原始农耕(火种)。

黑格尔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创造不同的人类文化。他说,世界上有三种显然不同的地理环境,也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历史文化。中国最古老的地理著作《禹贡》将中国划分为“九州”。长江下游广大平原地区为“扬州”,到处长满杂草与乔木,遍地沮洳湿地(“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是最坏的土地(“厥田惟下下”),不可能有农耕活动。上古人类一般是依山傍水而居,既便于建造穴居,又利于农耕活动。黄河上游的天水属于“九州”中的“雍州”,土地是第一等的(“厥田惟上上”),最适于农耕活动。伏羲文化产生和形成于这里,因此具有地域性特征。

5. 和谐文化特征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厚,作《易》、《八卦》”。又在《赵世家》中说,“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怨”。《礼含文嘉》说,“伏羲德治天下”。在有关伏羲的记载和传说中,均不见其有杀伐之举,而反映的是文治教化。这无疑是对伏羲品质的肯定和赞誉。

伏羲“以德治天下”,德是手段,治是目的。之所以要“治”,就是存在“不治”或“未治”的现象,存在社会矛盾。用“和合”的办法解决社会矛盾是不可取的;用镇压的办法,更不是伏羲的品德。伏羲是“教而不诛”。“教”就是“文治教化”。就是用“协调”、“疏导”的办法化解各种矛盾,达到“治”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伏羲文化中蕴含的这种精神,实际上是原始的“和谐”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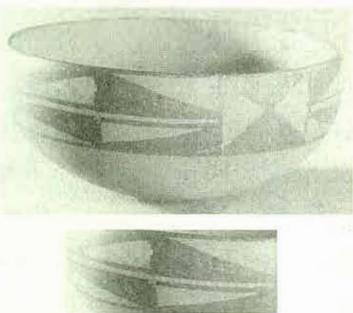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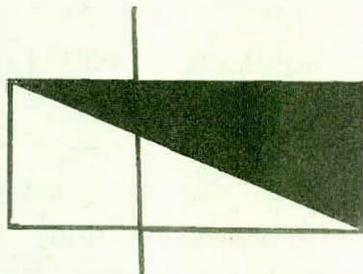
《辞源》解释“和谐”为“协调”(《左传》襄十一年:“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晋书·挚虞传》:“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可见“和谐”既讲“协调”的过程,也有“和谐”的结果,更具有社会意义。当然,伏羲时代的“和谐”与现代的“和谐”的内涵不完全一致,但其精神是相通的。这里,我们也应注意到,无论什么时代,追求“和谐”,实现“和谐”都是有条件的。一是要有物质基础,二



丰富多彩的龙图纹造型(刘雁翔著,伏羲杂志,2003)



丰富多彩的龙图纹造型(刘雁翔著,伏羲杂志,2003)



是精神文化方面的支持。伏羲时代是具备了实现原始“和谐”的条件。一是先进的农业文明为其提供了物质条件；二是以伏羲八卦为代表的精神贡献，不仅为实现“和谐”提供思想的支持，更是充满“和谐”的思想宝库。

伏羲“八卦”思想充分表现出了“和谐”文化的精神。“八卦”源于对自然界的认识，是一部先进的认知方法论。上古人类对自然界追求的最高目标是“和谐”。因此，可以说“八卦”是一部讲“和谐”的学问。伏羲时代的农业生产与社会形态既为“八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同时也提出了要求。农业生产是自然经济，是与大自然打交道，并受大自然所左右的生产（这一点大家都非常清楚），要想获得好收成，就得学会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八卦”就是在这个客观要求下，经过了认识、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而形成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从大的方面讲，“八卦”所表现的八种自然物质（现象），同处于一个宇宙之中，形成了自然界这个共同体的“和谐”。当然，也有不“和谐”的时候。如果一旦出现不

“和谐”，就会发生灾难。“八卦”从认识论的角度帮助人们认识各种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目的是规避这种灾难的发生。

“八卦”演绎“和谐”思想是一个完整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论。每个卦保持自身的“和谐”，并且有着自己“和谐”的规律。这些规律一旦遭到破坏，就同样会出现“灾难”。“八卦”的“象”形象地揭示每个卦的运动规律，就是帮助人们按规律去做，达到规避灾难的目的，其实八卦的规律（法则）蕴含在过程之中，而不是结果（断词）。“卦”的变化、演绎过程充满着辩证思维。如果对演绎过程中的规律和提示，把握准确，就会获得好的结果，就会“否极泰来”。

此外，在伏羲文化里体现“和谐”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物象——“龙”。龙文化是伏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龙”融“九象”为一体，正是对“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的注脚。（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甘肃联合大学）

对编辑《中国方志百科全书》的几点认识

车安宁

近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共同主持编辑《中国方志百科全书》,作为撰稿人之一,参与其中,亲自动手,便有了自己的几点认识和思考,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首先,读者对象是谁?这也是一本书出版的关键。我们不能奢望全社会都喜爱这部书,这是不现实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类书籍的读者群在逐渐分化。因此,每一部书都只能定位在社会的部分群体。我个人的见解是,有五个方面的群体可以纳入我们的主要读者范围:

1. 全国各级政府修志机构人员和企事业单位修志写史的人员,他们希望通过该书了解中国方志的经典著作、知名人物、方志发展脉络及相关知识,以及方志编纂的特点、规律、要求等。他们应是我们的基本读者群,他们出于工作职业的需要,不得不看这部书。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类专职修志人员已达两万余人,加上各类兼职人员,总计在10万人以上。这的确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在世界其他国家是没有的。

2. 从事相关教学和科研的人员,以及部分编辑人员,便于他们查阅有关的问题和作参考资料。这部分人也不在少数,他们有些是社会科学专业,也有些是自然科学专业的,特别是从事自然、地理、动植物学等方面的教学科研人员。

3. 希望了解一省一地国情的人,如政府官员、投资兴业的商人等。这部分人由于其时间和兴趣

所限,他们只能是概览。

4. 爱好历史学、方志学、写作学的各业人员。

5. 从事和爱好中国文化研究的外国人。我注意到,在全书编辑中,特别加了条目的英文翻译,这应当是为我们的国际读者服务的。

其次,编辑这部书应循的规则是什么?以百科全书的形式介绍中国的方志,这在中国的编辑出版史上是首次,大概在全世界也属首创。因此,我们需要在指导思想明确:它是怎样的一部书?给谁看?《全书》应循的规则是什么?当然,我们首先把它定位为一部大型的工具书,但工具书也有多种类型,就百科全书而言,因其编辑的时代不同,内容不同,也是各具特色。

我以为应当遵循三个层次的规则作为我们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原则。一是遵循工具书的编辑规则。即一般工具书所要求的编辑体例、编辑规范和写作风格,我们都要做到;二是遵循百科全书的编辑规则。百科全书的编辑目前在上世界都已成熟,自有一套行内的规则和要求,国内近些年也有成熟的编辑成果和经验,自不待说;三是要遵循方志百科全书的编辑规则。唯独这一点,没有成熟经验和成果可以借鉴,需要我们直面困难,解决问题,敢于创新。

第三,我以为要做到上述的第三点,就首先要对中国方志的起源、发展和概况有一个大致的、

总体的认识,才能把握好入编内容,解决好怎样入编的问题,从而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创新规则。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历代方志至少有四种现象需要关注和研究。

1.中国方志从雏形到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其时间跨度大和各类志书浩如烟海是两个突出的特点。可以说,至今没有一个人说得清它的全貌。由于方志在早期并没有统一的规范,因此有些早期的书算不算“方志类”都还存有疑问。也有些古书是其间夹杂了方志的内容,或方志书中夹杂了其他的内容,两者兼而有之。更有相当一部分历代旧志是在历史的变迁中焚毁或散失了,我们只能在其他书籍的存目或引文中知道它们的存在。而我们又发现,在不同的历史书籍存目或引文中,往往对同一志书又都是说法不一。这就为我们的编辑工作增加了许多困难。我在此强调的不是我们在具体的编辑过程中,如何做出辨别判断,而是我们更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编辑标准和尺度。

2.空间分布广和层次多而杂,是中国方志的又一个特点。中国方志的分布极广,在历史上,一些极为边远的地区,都可能有多种版本的志书存在。并且由于历史版图的变化,在今天一些已经不属于中国管辖的地区,也都曾有历史志书存在。这些书的书名、编纂方法、体例、使用文字等等,都与中国传统方志无二,对此怎么定性?再有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朝代,各个州、府、省、道、路、县、乡等的行政辖区都有不同的变化,特别是在西部和边疆地区,在一些历史朝代,不同区域还分属不同的地方王国政权管辖,不仅与中央政权朝代交错,地域上也是相互变化交错,伴随着这一现象的就是地名也复杂多变,对此如何在《全书》中统一界定?还是各述各的情况?同时存在的就是志书的层次较多而杂,这与不同时期行政建置的繁杂多变有关,如有州、府、省、道、路、县、乡等等,也是交错多变。例如,在一些朝代,州的建置比府大,而在另一些历史时期,府的建置则比州大。还有一部分是属于特殊的军事或其他编制,如:司、关、卫、镇、厅、所、驿以及一些属于少数民族的特殊建置(如土司衙

门)等,也都有过相应的志书。对此,有些我们今天可能说得清楚,而有些我们则可能一时说不大清楚,因为他们往往相互交错,同时并存。由于中国地大,历史悠久,朝代繁多,各地情况都不一样,而编辑《方志百科全书》,则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界定规则才好。

3.相对于中国方志的浩繁,中国方志的理论性就相对薄弱得多。可以说,实践性强,理论性不足,也是中国方志的一大特点。编辑《全书》,我们不能光是纳入志书和人物介绍,还应当有方志理论方面的内容介绍。否则不是“百科”。可是这些所谓理论性内容有多少,成熟不成熟?怎样纳入?是随着相关的人物介绍而介绍,还是有些理论可以单独列条?都值得探讨。需要指出的是,近现代虽有一些方志理论研究大家,但是他们与同期史学界的理论大家不能堪比,一是人数稀少,二是知名度不够,三是他们的论述还缺乏系统性、深入性、时代性和权威性,有些理论还存在争议,还不能被业内所普遍认可。这就为我们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全书》可以纳入的理论性内容并不多,二是编辑《全书》的理论指导显得不足。我个人以为,有些理论存在争议,也可以纳入,只是需要说明即可。

4.《全书》要体现“全”。这就要求在选材上有所扩大,把眼界放宽。我们不能把眼光总盯在过去的研究编辑成果上。比如遴选人物和作品,就只把前人书中的成果选进去,不敢扩大;有些理论存有争议,也不敢纳入。其实,没有扩大就没有创新。再有,对于什么是方志,我认为,我们也不宜生搬硬套。因为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国际规则,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有些与方志内容相关的书籍,过去有人叫古今杂志或杂书,我以为也可以叫做类方志。有些地方野史、笔记、碑记、校史、村史等情况也是如此,它们虽然没有冠以“志”的名字,但实际上写了“志”的内容。还有些家乘族谱,我认为今后也可以将其归类到方志中去。因为这些内容,都与一方地情有关。如果对方志的界定太窄,不利于方志学的建立和发展。

5.纵观中国方志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越是朝代久远的志书就越是存留少,稀少见到介绍,而

朝代靠近的志书较多见,以清代和民国存留最多。这固然与后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编纂量越来越大有关,但也与时间久远难存和历史的自然淘汰有关。而到了当代,志书的编纂几乎成爆炸式增长。这就为我们编辑《全书》带来一个具体问题,就读者而言,大多都是专业的或兼职的修志人员,或研究和爱好这方面专业的文化界人士,他们应当是主流读者群,但是这些人往往对常见的志书或人物不感兴趣,因为他们较为熟知,而对那些稀少见到的内容有所偏爱。我们在编辑中如何把握好这个度,需要研究。

第四,在编辑中,有些技术性的细节问题应当重视。有句名言叫做“细节决定成败”,我们编辑《全书》更应注重于此。我能想到的细节问题有以下几点:

1.《全书》应当涵盖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及台湾和香港、澳门特区,这是一条基本原则。除此,在有些条目的文字中还应当提到民国之前属于中国辖区,但是以后因为不平等条约而划割出让给某些国家的地区,这些相关介绍,可以不单独列条目,但是在一些志书或人物的介绍中,应很自然地带出。

2.《全书》应涵盖全国56个民族,以体现“全”。有些民族可以为他们单独列志书条目介绍,如《某某自治州志》《某某自治县志》等。有些则是可以贯穿在其他相关的志书条目中,顺便带出。如,志文介绍:“该县有汉族、回族、藏族、土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人口等。”总之,在《全书》的电脑检索中,可以找到所有的中国民族为好。以体现政治性、包容性。

3.在《全书》的所有条目布局上,要做到统筹

安排,适当均衡。这个均衡是指:①全国各个省、市、区在空间上的适当均衡。不宜有些省区条目和文字过重,而有些省区则极为稀少;②在历史跨度上要适当均衡。不宜有些时代条目和文字过重,有些时代则过轻,甚至有些时代是空白;③在省志条目的选取上,各个行业应适当均衡。不宜都集中在同一、两个行业中,如各省都选工业志或农业志等的志书作为列条;④同类的每个条目的文字也应适当均衡,即不宜有些条目文字过多,有些则过少。

4.对人物介绍条目应适当增大。这一点,可以采取每一人物介绍适当压缩文字,以多列人物。这样不仅可以体现“全”,还可以增加趣味性,提升《全书》的资料性,有利于全书的发行。特别是要注意发掘那些在其他一般书籍中漏掉的修志人物。使《全书》高于一般的方志书籍。同时,在介绍志书内容时,我也主张应尽量把人物牵扯进去,附带介绍,因为有些同名的志书,书名相同而作者不同,也有利于读者区别。

最后,我还认为,以上问题和现象的存在,不仅使得编辑《全书》的工作复杂化,带有创新性,也使得编辑工作实际上掺杂了许多研究内容。这就决定了编辑《方志百科全书》的工作,不仅是对中国方志的一次大检阅、大整理的过程,也实际上使之成为一项带有科学研究性质的工作,是对我们方志队伍的一次实战检验。

谨列上述肤浅认识,供大家参考指正。

注:(这是作者于2012年6月在北京参加《方志百科全书》编辑工作会议时的发言,略有修改)

(作者系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二轮省志 编纂记述问题

3议



李拾良

修志是一项系统工程，影响志书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第二轮省志编修一定要牢固树立全面的质量观，把质量意识贯穿到志书编纂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真研究解决好编纂工作中遇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从第二轮出版的省级志书和部分志稿来看，可以说总体质量不高。在记述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特色不鲜明，缺乏对重点、热点和亮点问题的充分记述；资料不齐全，有的资料明显短缺，没有达到全面系统的要求；记述性不强，直接抄录的法规、文件太多；行文上不简洁，没有做到文约事丰；记述上不得法，有的采用总结报告的写法，高度概括，浮光掠影，缺乏深度记述。而有的采用编年体的写法，为了纵不断线，年年都记，“看起来什么都有，用起来什么都没有”。因此，如何规范内容的记述，提高志书质量，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而且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

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2010年4月8日《在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有的地方在修志中仍然没有把质量放在第一位，不是精益求精，而是急于出书。”在当前的第二轮省志编修工作中，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朱佳木的讲话精神，始终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协调好进度与质量的关系，努力提高志书的质量，增强志书的学术性，保证志书的科学性，积极探索创新，编修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佳志。

志书编纂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也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其中有经验，也有遗憾，还有教训。这些经验、遗憾和教训，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需要认真总结、汲取和借鉴。下面我就二轮省志编纂中普遍存在的严重影响志书质量的几个记述方面的问题加以分析，以引起大家的关注，启发大家的思考。

一、年鉴倾向

从编纂和记述的角度来看，志书和年鉴的相同点：一是功用的资料性，二是资料的权威性，三

是结构的科学性,四是特定的地域性,五是语体的记述性。同时,志书与年鉴的不同之处也十分明显:一是在内容的层面上,志书重点记述的是事物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是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概念;年鉴则是主要记述事件的结果和数据,是相对微观的、片面的、零碎的。二是在时间跨度上,志书记述的是一个历史时期,少则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并且志书的记述可以适当上溯,以保持事物的完整性。年鉴受年度所限,一般不需要过多的上溯。年鉴直接记述有关数据、资料,不太注重过程,而侧重于事件的结果。三是在篇目(栏目)设置上,志书的篇目、内容有较强的稳定性,篇目设定要考虑到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及事物之间的关联性。而年鉴的栏目设定及内容撷取则更具灵活性,可以根据当时(年)、当地的实际情况,对某些内容进行升格或降格处理,增加或减少栏目。四是在功能价值上,志书和年鉴的存史、资政和教化功能的层面是不同的。志书通过翔实的数据性的记述,使人们了解一地的历史渊源,发展历程,社会变迁,以弘扬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而年鉴只是年度的数据和基本情况的汇集,基本条目具有篇幅小、信息集中的特点,服务现实的功能更强一些。

了解志书和年鉴的主要异同,就可以在编修二轮《甘肃省志》的时候,根据它们各自的特点,选取年鉴中有用的资料,运用到志书的编纂中。采取综合分析的办法,将年鉴中零散的内容、有价值的数据进行充分的整合,加以应用。并在这个过程中,尽量避免和克服志书和年鉴的同质化及志书的年鉴化倾向,从高度、深度和广度三个方面,突出志书的性质特点,强化志书的社会功能。

克服志书年鉴化的倾向,就必须解决好志书的高度、广度和深度的问题。1.所谓高度,就是要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去研究地情、搜集资料、记述事物,而不是站在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部门、行业的角度,孤立地去看某一项事物的发展。特别是对部门年鉴和单位的文档资料,要进行科学合理的归纳、整合、取舍、利用,严格按照省级志书的规范加以记述,防止《甘肃省志》各分卷,带有明显

的部门志、部门年鉴或总结报告的痕迹。2.广度包括全书的结构是否全面系统、编排是否科学合理、横排的门类是否缺项,内容要素是否齐全。不能以偏概全,不能以局部代替全局。应该做到“该有的都得有”。3.深度主要解决内容记述的简单化、平面化问题。要求在竖写方面,围绕每个单元的主题,集中反映一类或一个事物的全貌和它发生、发展、演变的全过程,通过全面系统、翔实可靠的记述,来揭示事物的本质。志书记述深度不够,一方面是编著者的认识和水平问题,但最主要的还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资料缺乏和对资料的深度加工不到位所致。

二轮修志复杂,省级志书编纂更为复杂。二轮志书的编纂目前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这与二轮志书编纂之初的乐观情绪形成强烈的反差。单就收集资料来说,虽然时限不长,但期间的起伏变化很大,而收集到的有限的资料,难以真实地反映发展变化的来龙去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更趋多元化。收集资料的范围更加宽泛,收集资料的难度加大。可以说第一轮志书编修更具有历史学的意义,第二轮志书编修则更具有社会学的意义。

搜集资料有多种渠道。我们一直说档案资料很重要,得查档案,还有年鉴、报刊、各类书籍等。现在借助于现代化手段,从网络查找资料非常方便快捷,但内容真真假假,首先要解决的是能不能用、敢不敢用的问题。另外个人回忆录也很多,当事人写当时事的回忆录,资料的可信度问题也是入志的一大障碍。另外,对于什么资料能入志,什么资料不能入志,也可能受到人为的干扰,影响志书的客观公正。另一方面,编纂人员面对大量的、零散的、甚至是无用的资料,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甄别筛选、分类考证,在完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之后,又发现许多有用的资料缺乏,不少项目只有高度概括的只言片语和简单零碎的片段,无法做到“六要素”齐全,即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完整无缺。要找还不知从哪着手,知道从哪着手又限于条件很难做到。

面对资料短缺的补救方法,一是尽量拓展收集资料的渠道,千方百计地通过档案馆、图书馆、资料室、网络和采访当事人、发布征集资料通告等多种渠道,挖掘各种形式的资料,以弥补资料短缺或佐证资料。二是对那些没有承编单位的部分内容,可以运用社会学和统计学的社会调查方法获得资料。进行社会调查需要化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了有效推进这项工作的开展,可以委托或选聘有关的社会组织和个人来完成。这是二轮修志需要认真对待并切实解决好的一个课题。三是对于确实无法获得更多的资料,而又不能舍弃的部分宏观资料的内容,可以采用“点面结合”的方法予以记述。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作法,有负面作用。过多使用,会给人留下大而化之和空洞无物的印象。

增强志书的深度记述是克服志书年鉴化的有效途径。具体来讲:一是把握好质和量的关系。不但要反映事物量的变化,更要注重反映事物质的变化。志书里反映事物发展变化一定要通过具体资料的记述来实现,绝不能用空洞的议论来代替。记述需要用一些综合性的比较性的数据来反映变化的程度及水平,但数据的选择一定要精,不能过多、过滥,大量的具体数据可以用表来反映。二是要把握好点与面的关系。既要反映所记事物的全面情况,又要注意突出重点,挖掘补充典型资料,深化记述的内容。全面系统、典型新颖是对志书入志资料的基本要求。由于典型事例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信息,所以能否抓住并写好典型事例,就是能否突出亮点体现特色的关键所在,是衡量一部志书优劣的重要标志。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各行各业均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新特点,这些新生事物在年鉴和公文中都会有所体现,但又都是相对片面的和孤立的。如何在志书的记载中全面地、深入地反映这些新生事物的具体变化、发展过程,是每一个编修人员需要面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要把片面的、孤立的资料转化为全面系统、有机统一的志书内容,就必须透过

现象看本质,对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加工提炼,找出有关内容纵横联系的最佳结合点,对相同的或类似的内容加以归纳,才能展示出某一事物的发生、发展、结果或消亡的全过程,体现事物的宏观性和整体性。就是说,年鉴的材料可以利用,但不能单纯依赖年鉴,不能将年鉴的材料作为唯一的资料来源,更不能简单的采用拿来主义,照抄照搬。在志书编纂的过程中,一定要跳出年鉴资料的固有模式,采用科学的、辨证的方法,正确地使用年鉴所提供的资料及其他的文档资料,精心组织,细心研究,从合适的角度、用贴切的语言记述,从而体现出志书厚重的历史沉淀。

二、公文特点

二轮志书的撰稿人,经常起草机关公文,经常接触总结、报告、讲话之类的官样文章。他们编写志稿依据的资料也大多来自文档,加之作为非专业人员,对志书的性质、特点不甚了解,或对资料的深入研究、深度加工不够,缺乏宏观把握的能力。因此,他们提供的文稿,在记述方面往往存在严重缺陷,不符合志书的撰写要求。主要表现:一是采用编年体记述;二是套用总结报告的手法。由于编年体的记述方法平均使用笔墨,导致重点不突出、篇幅冗长的不良后果。总结报告体虽然突出了重点,但由于高度概括,过于简略,缺乏事实依据,反映不出事业的兴衰起伏和发展变化。

志书编纂,编著者是主体,地情是客体,只有当编著者对地情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才能准确、客观地记述,反映出时代特征、地方特色和行业特点。在对事物正确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选取一些历史的节点,包括起始点、转折点和关键点,把一定时期划分为几个阶段来记述,就会避免逐年记述带来的弊端,使志书内容重点突出,脉络清晰,给读者以鲜明清新的印象。同时,还有利于在记述中反映工作的变化,可以凸显事业的兴衰起伏。

编年体的记事手法,主要是以年系事,按时间顺序记述事件和事业发展。从某些志稿的一些篇章中,可以发现类似大事记的记述方式。这种记述方式,表面上看起来资料很丰富,也达到了“横排

门类,纵述史实”的要求。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存在的问题,平铺直叙,记流水账,不分主次轻重,材料零散孤立,事物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而且这种写法还容易造成稿件的“水分”过多,烦琐冗长,这也是二轮志书或志稿中比较常见的现象。志书横排竖写,要求纵不断线,其实只要做到纵不断主线就可以了。做到重要的历史时期、主要的发展阶段、重大的转折点都有所记述,而不是事无巨细、逐年罗列资料。

总结报告是应用文的一种,在各行各业中广泛应用。有些总结报告中的能够反映客观实际的具体内容,是可以成为志书资料的。但很多编纂人员为了方便,往往依据历年的总结报告来撰写初稿,不符合志书述而不作的表达方式和全面系统、具体翔实的内容要求。总结报告一般是就某一具体事件和某一阶段的工作,在特定的时间和环境内所作的记述、分析和评价。往往会在记述了一些事实之后,总结出几条经验、做法和体会。这些经验、做法和体会在志书中是绝对不能用的,有用的只是记事的部分。一般来说,总结报告中的记事比较概括、笼统,也还有一个角度和感情的因素,所以,只能提供线索和参考,仅仅依靠这些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对资料进行深入的挖掘。志书记述具体的事件要有血有肉,有来龙去脉,有发展变化,有兴衰起伏。要把握好三大环节,即事物的发端、转折和现状(结果),要将事物的主要特征和因果关系交待清楚,体现出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和各个阶段的统一性。并要保持记述的完整性,有头无尾,有尾无头,或有两头无中间,都是不可取的。除了编年体式和总结报告式的记述外,还有教科书式的记述。大量的解释性和说明性文字,都不能作为志书的内容。

志书以提供有价值的资料和有用的信息为目的。要提高内容的信息含量,就要对材料作综合分析,把握材料的实质性内容,在充分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归纳提炼,概括出重点、要点和特点。选材应注重社会性、资料性和可读性,充分考虑读者的需求,不以行业、部门的标准代替社会标准,不能只

谈成绩,回避问题,力求客观真实地反映事业发展的起伏变化,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表现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只有如实记述历史的真实面貌,为读者提供可资利用和借鉴的资料,才能体现志书的功能和价值。

与首轮志书的时限相比,二轮志书的时限一般在20年左右,但二轮志书或志稿有的比上轮志书的篇幅还大,有的甚至以倍数递增。究其原因,一是对资料取舍不够,“捡到篮里都是菜”。二是文字不够精炼,句子附加成分多,没有做到惜墨如金。三是没有开门见山,空虚议论多,背景资料多,套话、大话、空话、废话或解释性、说明性文字多。

有代表性的词语,如:根据,按照,遵循;为了,树立了,创造了,起到了;坚持……理念,以……为龙头,以……为重点,以……为载体,以……为依托,以……为手段,以……为基础;突破……观念,确立……理念;贯彻……方针;形成……格局等。还有“总而言之”、“实践证明”、“充分说明”所引发的总结性论述,有对未来展望预测的“将”字句式,有关这些文病的实例很多。为了保证志书的质量,应完全杜绝这些现象的发生。也就是说,凡是带有这些文字的相关语句,都应坚决、彻底、干净地予以删除。

有的志稿大量抄录法规、文件、机构职能、工作报告、会议总结,用大量形而上的东西,代替志书应该记述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还有的志稿花费大量笔墨记述开了什么会、发了什么文、讲了什么话、会见了什么人、参加了什么活动、到了什么地方视察,用表象的东西代替实质性的东西。如果说不能做到重要会议有主旨、重大活动有亮点,不能用实质性的内容说明所记载的会议、活动的重要性,那么也就没有必要记载这一类的会议、活动。志书中如果充斥大量的没有什么价值或者无用的信息,志书也就成了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

从某报附刊《文摘》中,看到刀尔登的一篇名为《方志》的文章(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12月26日),开篇:“我要到某县住一个月,去之前,想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等等,我该找

什么书看一看呢?一般性的史地著作,可以参考,而县志无异是最合用的。这是个旧县,我找到三种地方志,一部是明代嘉靖年间编的,一部成书于清末,另一部是近年新编的。前两部,用今天的眼光,读起来不是很方便,但耐心看去,眉目宛然,资料也很丰富。后面这部新志,门类清楚,最是易读,但读后,却觉空洞无物。”这一段话表明一个观点,新志不如旧志。我认为,新志中的县志强于省志。这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如果这两个观点成立,那么,省志的编纂人员有必要学习旧志和县志。而志书编纂贵在“资料丰富”,最忌“空洞无物”。

志书是面向社会的读物,是资料性著述,以记事为第一要务。与机关公文不同,志书力求做到“四要”——要简、要严、要核、要雅。即文字要简,选材要严,事实要核,风格要雅。在记述方面,要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更多的内容,惜墨如金,文约事丰。因此,在编纂和审稿的每个环节,都要把精简内容、精炼文字作为重要任务,能用一句话说清楚的,绝不用一段话来说;能用几个字表述清楚的,绝不用几句话来说。这样就能达到压缩篇幅,有效提高记述水平,提高信息含量,从而达到提高志书质量的目的。

三、宣传色彩

1986年12月,在首轮志书启动之初,经国务院同意,召开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在闭幕会讲话中,胡乔木语重心长地呼吁,志书编辑要避免政治化。他指出:“作为地方志编辑工作的同志,要力求在编辑工作中避免一种所谓‘政治化’,就是不适当地表现某种政治的色彩,这样就减弱了著作的严谨性、科学性,使地方志染上了一种宣传色彩。从我所看到的新编地方志中,我感到存在着这个问题。客观的历史就是客观的历史,不需要在地方志里画蛇添足。多余的评议不但不为地方志增光,反而为地方志减色。希望我们所有的地方志的编辑同志一定在自己所编辑的地方志中,杜绝任何空话,摆脱任何宣传色彩,使我们编出来的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让它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时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

组长的梁寒冰强调,“新方志是科学的资料书,不是政治宣传品;要避免所谓‘政治化’的倾向,不要使地方志染上政治宣传的色彩。宣传鼓动性的言词,标语口号式的文字,不是地方志的体例和用语。”这些讲话,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二轮志书编修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二轮修志仍然需要坚持“杜绝任何空话,摆脱任何宣传色彩”。

志书中的宣传色彩主要表现在:一是记述政府及各部门工作多,记述社会状况很少或没有,仅从官方的视角而没有从社会的视角去记述,不能全面系统地展示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二是记述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多,而对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出现的失误和存在的问题,缺乏应有的记载。这样就脱离了实际,违背了志书“实录”和“信史”的基本原则。三是过分突出官员的形象和事迹,存在官本位主义。有学者把这种现象形象地比喻为,把“官书”变成了“书官”;因过分强调志书的资政功能,而使“官修”变成了“为官而修”。

所谓的“官本位”,是一种封建的文化意识,其核心内容就是以官为本,以官为上,以长官的意志为转移。这种官本位意识,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地方志也具有浓厚的官本位色彩。所以,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特别强调方志工作者要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的原则,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忠于客观事实,确保材料准确无误。同时,还要求编纂人员做到不因外在的压力而歪曲事实真相,不因个人的好恶、得失而有失公允。这就是所谓的“秉笔直书”。修志历来讲究德才学识,秉笔直书既包含了对修志人员职业道德方面的要求,也包含了对入志资料的选材和写作方面的要求。官本位思想在二轮志书中的表现,主要是指以过多、过重的笔墨记述、渲染官府和政要的现象,其中记述“官人、官事、官话、官文”的现象尤为突出。这种现象是方志界的一种不正之风,也是事关党风、政风、文风的一个大问题。它不仅直接影响二轮志书的编纂质

量,而且有损于党和政府以及有关领导的形象。因此,要坚决杜绝此风的滋长。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修志工作者应该成为先进文化的倡导者。志书的编纂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大众的需求,使之成为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

明代贺国定把志定义为,“夫志,记也,所以记事实,备观览,昭劝惩也。”(嘉靖《赵城县志·序》)说明志书通过记事实,达到备观览、昭劝惩的目的。2011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地方志工作作了重要论述。他说:“地方志工作者是当代史官。……封建官僚很害怕史官,担心史书会记下他们不光彩的一笔。地方志工作者要敢于秉笔直书,做谏官。领导干部做得好的要记下来,做得不好的也要记下来。使大家知道,干好了地方志会让你名垂千古。不好好干,地方志也会如实记你一笔。这对领导干部也是一个约束。如果能做到这样,地方志工作就有地位了。”(在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时的讲话)汪洋的讲话,一方面是对地方志工作者的鼓励和支持,要求做好史官、谏官。另一方面也代表了一大批共产党人对地方志书的性质、特点和社会功能的正确判断和清醒认识。

志书编纂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述而不论、寓评于述的原则。志书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但是,要避免宣传意味和色彩。这是志书的性质决定的。如果我们编出来的志书,成了宣传品,那么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志书是记述体的资料性著述,同别的文体不同,编者不能直接提出或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是通过事实材料的剪裁和铺陈,让是非功过、成败得失、褒扬贬损、经验教训,寓于事实的客观记述之中。使人们能从真实的材料中,自觉地判断是非曲直,产生共鸣,以得出必要的结论。志书寓观点于记述之中,不能呈现出主观色彩、感情色彩和宣传色彩,要避免对人、事、物直接的肯定与否定,用事实说话。尤其是当代人记当代事,更需要谨言慎行,存真求实,不夸张,不溢美,智欲圆而行欲方。语言力求朴实无华,忌刻意雕饰,更不能运用渲染和抒情的文笔进行想象和构思,防止

政治流行语和宣传性的说教。

我们经常在一些志书或志稿中看到,带有宣传色彩的语言。例如:“……亲自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领导高度重视”,“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加强领导”,“着力打造”,“全力构建”、“以……为抓手”等。大量出现“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认真贯彻执行……”、“在……精神的指引下……”、“受到高度赞扬”、“获得广泛好评”等。还有类似这样的记述,“灾后,各有关部门及时开展救济工作……灾民感动地说: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感谢人民解放军,我们要永远记住共产党的恩情。”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有人还总结出志书编写的两个常见问题:一是把一切失败和错误、困难和问题,都统统归咎于“文革”;二是把一切成就与发展、成绩与经验,都归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修志工作中形成了一种定势:即“‘文革’十年是个筐,什么问题都能装”,“三中全会是个帽,凡是成绩都能套”。这种现象反映出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就是志书编修人员的独立意识问题。志书编纂不能随波逐流,不能人云亦云,不能把志书混同于新闻报道、公文写作,要有独立思考,要适应志书的特点,要维护志书资料性文献的价值。志书编修人员的独立意识是个人的素质问题,也是影响志书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许多地方完全可以直接说事,或直接使用年号,大可不必一律戴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帽子。在志书中,一个词用多了,用滥了,读起来乏味,也显得不客观,不科学、不严谨。对修志人员而言,能否处理好这个问题以及其他的类似问题,既是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的体现,也是文字能力和把握运用资料能力的体现。

省志各分志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要突出主体事业、典型事件、重大活动、主要人物,以记事为主,以事系人,不能过分突出某一个人和某一项工作,要掌握各方面的平衡。这个问题在图片的选择和大事记的人志标准上表现也很严重,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省志由几十部分志组

成,分志一般不设人物篇和大事记。志中一般也不记述包括党、团在内的社会团体及机关事务管理的内容。

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就是由市场来配置资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已是大势所趋。过去大包大揽的政府已逐步从许多领域退出,人民群众以及民间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比过去更加迫切地需要与政府共享包括志书在内的社会资源,读志、用志的热情提高。志书编纂应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群众,真实地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实际,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同时,志书的功能也有必要从过去强调志书的“资政”作用,并把党政干部作为主要读者群体转变为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志书的编修也应朝着“保存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方向发展。只有这样,地方志工作才能与时俱进,不断开创新局面。

综上所述,年鉴倾向、公文特点和宣传色彩,是在第二轮出版志书和部分志稿中,普遍存在的严重影响志书质量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篇目结构沿袭过多,创新不够。过分强调二轮续志的继承性及在篇目结构上的对应关系,所产生的篇目大纲限制了改革开放内容的深度记述,造成时代感不突出,给人留下一般化

的印象。然而,对改革开放内容的深度记述应主要体现在各类事物的具体记述上,除具体的、有明确指向的改革以外,一般不能采用集中记述的方法,不以改革命题,而以分散记述为宜,把改革的内容有机地融入到各项事业之中。二是对地情的研究和行业特点的宏观把握不够。没有抓住重点、要点和特点,认不清划分阶段的节点所在,所以无法达到结构合理、层次清晰、和谐统一的记述要求。修志是一项政策性和学术性都很强的工作,必须要有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脚踏实地的工作精神,才能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和错综复杂的原始资料中,发现规律,提炼主题,理清思路,客观记述,做到不负众望,不辱使命。三是资料工作没有做到严、细、深、实。人志资料不是“苟简”,就是“滥收”,不是缺乏典型资料,就是对资料的加工不到位。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在《泾县志·序》中说:“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志书的繁简不在于文字数量的多少,而在于体例是否严谨科学,内容是否详略得当,事实是否真实可靠,表述是否简洁明了。四是编写方法没有完全掌握。对志书的行文规范没有了于心,或是不认真,图省事,应付差事,敷衍塞责,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拿来为我所用,抱着行也是它、不行也是它的态度,结果是浪费时间,错失时机,得不到方方面面的认可。

形成年鉴倾向、公文特点和宣传色彩的原因还有很多。从记述的角度来说,虽然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但主要的还是编纂人员的原因,是编纂人员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克服和消除的问题。所以,参与二轮省志编修的人员要牢固树立全局意识、责任意识和质量意识,把二轮修志作为一个学习和研究的平台,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努力完成好为时代、为人民立言、立德的光荣使命。

(作者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省志编纂处处长)



志书中的数学

乔孝堂

志书编纂,数字是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特别是数字化的现代社会,新的志书中数字更多,不论是财经类,还是社会事业类都有很多数字。让数字说话,用数字展示变化,通过数字真实记录历史,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所以数字在志书中的地位不容忽视。正确地记载数据,离不开数学,笔者在实践中发现,许多志书、文章在数字计算上缺乏数学知识,频频出错,甚至闹出笑话。现归纳几类:

一、年均递增率的计算

计算年均递增率,有的人将若干年的增长率用除法平分,这样得出的“增长率”比实际增长率要大出很多倍。例如,某地 1986 年财政收入 1.21 亿元,2010 年财政收入 80.65 亿元,如果用 80.65 除以 1.21 得出 66.65 倍,再除以 24 得出 2.78 倍作为年均增长率的话,那就比实际年均增长率 19.12% 大出 13.5 倍。那么怎样计算呢?高中数学教科书上只有一种方法,就是通过查对数表,运用公式 $A(1+X)^n-1=C$ 计算。其中, A 为首年数据, C 为尾年数据, n 为 A 至 C 之间的年份数, X 为年均增长率。这种方法比较繁复,还得依照一份对数表。现介绍三种简便易行的方法:

方法一:用学生多功能计算器计算

举例,某市 1986 年人口 123 万人,2010 年人口 161 万人,计算 25 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

第一步,在计算器中输入 2010 减去 1986 之差 24;

第二步,点击“SHIFT”键;

第三步,点击“XY”键;

第四步,输入 161 除以 123 之商 1.30894308943 (保留小数位越多,结果越精确);

第五步,点击“=”键,得出 1.011280652;

第六步, $1.011280652-1=0.011280652$ 。

一般保留两位小数,乘以 100%, 1.13% 即为某市 1986 年至 2010 年 25 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如果要验证的话(用 1.01128 乘以 121, 连乘 24 次 1.01128, 即出现与 161 接近的数字), 必须用多位小数验证, 否则误差会很大。

方法二:用电脑计算

同上例。点击开始→程序→附件→计算器。点出计算器后,再点击上部“查看”,然后选择“科学型”,出现科学型计算器,输入 161 除以 123 之商 1.30894308943,点击左上部 Inv, 出现“√”,再点击左中部 x^y 键,再输入 2010 减去 1986 之差 24, 点击 = 键得出 1.011280652, 最后, $1.011280652-1$ 之差乘以 100%, 得 1.13%, 即某市 1986 年至 2010 年人口年均增长率。

方法三:用 EXCEL 函数计算

同例。点击开始→程序→Microsoft Office→Microsoft Office Excel, 出现 Excel 空表, 在任一单元格中输入“=Power (161/123,1/(2010-1986))-1”, 任意点击其他单元格, 即显示结果 0.011280652, 乘以 100%, 化为 1.13%, 即某市 1986 年至 2010

年人口年均增长率。

二、四舍五入法的运用

四舍五入是平时应用比较多的计算方法,在志书中应用尤其要有原则,不能在哪位数上遇见“5”就入,否则就出现多入的现象,失去数字的精确性。如数字 2.4445,保留两位小数,用四舍五入法只能是“2.44”,不能将末尾 5 入上去,让上位 4 变成 5,再将 5 继续往上入,变成“2.45”。四舍五入法实际是一种接近法,以“5”为界线,大于、等于 5 的入上去,小于 5 的舍去。这种规定将中位数 5 划进“入”之列,本身就“入”多于“舍”,如果再将小于 5 的某些数划进“入”之列,就更加背离四舍五入法的接近性原则,所以,凡小于 5 的,哪怕是“2.44499999”也不能入成“2.45”。

三、百分比平衡问题

举例:某单位共有职工 271 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 182 人,高中及中专 75 人,初中 12 人,小学 2 人,分别占职工总数 67.158%、27.675%、4.428% 和 0.738%。保留两位小数,按四舍五入法,应为 67.16%、27.68%、4.43% 和 0.74%。四个数相加为 100.01%,显然不行。在这个题目中,维持百分比的 100% 是大原则,遵循四舍五入法是小原则。小原则必须服从大原则。以上四个进位数中应选择进位最小的一个比 5 大的数改为舍弃,变为 67.16%、27.67%、4.43% 和 0.74%,同样,如果各项多为舍去,需要入比 5 小的数,则应选最大的入,不能随便挑一个应付。

四、倍数与翻番问题

哪年到哪年,某项数值增长多少倍,必须是后者除以前者再减去 1 的数,如果说哪年是哪年的多少倍,则不必减 1。举例说明,1994 年某市地税收入 11467 万元,2010 年收入 189221 万元,比 1994 年增长 15.5 倍或者是 1994 年的 16.5 倍。

关于翻番的话语一定要慎重。翻番是成倍增长的意思。翻一番即增长 1 倍,翻两番、三番即为原数值的 4 倍和 8 倍,如果是翻五番,那就是原数值的 32 倍,可写成增长 31 倍。翻几番就是 2 的几次方,一定要计算清楚,再写翻番的话语。

五、重大数据的审核问题

某市国土总面积 20000 平方公里。《国土》章记述全市耕地面积 735.3 万亩;《林业》章记述 2010 年全市林地面积 1617 万亩;《畜牧》章记述 2010 年全市草地面积 1945.2 万亩,就这三项数据做一计算看情况如何?

首先,将 20000 平方公里乘以 1500 亩/平方公里,化为 3000 万亩,然后用以上三个数字分别除以 3000,得出这个市 2010 年耕地面积占全市总土地面积 24.51%,林地占 53.9%,草地占 64.84%,合计占国土总面积 143.25%。我们知道还有园地、公路用地、工矿用地、城乡居民用地、水域占地及难利用地。这些项目在农区一般应占国土总面积 15% 以上,加起来大概就是 160% 左右。

这样编写志书,那么“存史、资政、育人”将会变成谬误流传,贻害后人。同样的问题在历年相加的造林面积、结扎妇女人数、改厕改灶数、捐赠衣物件数等数据上都出现过惊人的失误,写稿与审稿都必须予以重视,不能让笑话出现在志书中。

志书中数字的失误是多方面的,还有一些常见和多发的问题是,各项分数据与总数对不上,表格中的数据与文字叙述对不上,更有将本系统历年实有科技人员数合计的现象,让人啼笑皆非。

总之,志书中的数据涉及多个领域,而编志或审志的同志,不可能对方方面的知识都了如指掌,因此,为确保志书中数据的准确无误,必须求助专业人士对专业数据进行审核,使志书中的每一个数据都经得起检验,成为铁的历史。

(作者系《庆阳市志》编辑)



年鉴增补三认识

——以《察布查尔年鉴》(2012年创刊号)为例

朱 玺

提 要:2012年5月,察布查尔县完成首部年鉴的编撰工作,在初稿送审后直至出版之前,全体编撰人员精益求精,对部分篇章内容进行了增补。在保持基本框架不变或略有调整的前提下,对原编内容遗阙进行了补充、添加、修订,补缺、纠误、增添了一些新资料,尤其是在突出年度特点、行业特点和地域特点上增色不少。志书有增补一说,但年鉴之增补却少有人提及。对此,我们的看法是:临摹还是观摩,直接决定了年鉴编撰质量的高低;是有心还是无心,直接决定了对年鉴事业的痴爱与否;是有法还是无法,直接决定着年鉴增补效果的好坏。

关键词:《察布查尔年鉴》增补 方法

增补是在年鉴基本框架不变或略有调整的前提下,对原编内容遗阙进行补充、添加、修订的一种编纂形式,其重点在于补缺、纠误、增添一点新资料。2011年底,察布查尔县正式启动年鉴的编撰工作,经过六个多月的艰辛努力,初稿本顺利完成。和左邻右舍一比,自己的特色很明显。但自我感觉不尽人意的地方还不少。

志书有增补一说,并且是续志四项任务之一。而年鉴之增补工作却少有人提及。对此,笔者作为一位痴爱者,在年鉴初稿完成后直至出版之前,一直“执着如怨鬼”,对年鉴增补进行了探索,并有不少收获。

一、临摹还是观摩

临摹和观摩是否有区别?回答是肯定的。临摹如同书法上的临帖,学的是别人的帖,走的是别人的路,跳不出原来的框框,再相似,毕竟不是自我。而观摩则恰恰相反,学的是优长,走的是自己的路。

从新疆地州市县年鉴编辑出版的现状来看,多是从仿效省级综合年鉴起步的,而起步较晚的县市又是从模仿地州年鉴、起步早的县市年鉴开

始的。模仿和借鉴是初办年鉴的必然过程,不足为怪,但如果是简单的照搬,而不立足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就不可取了。截至2011年,伊犁州已出版的年鉴有38本,但未形成自己的品牌。县和县之间的差别是很明显的,但反映在年鉴上为何就“千鉴一面”了呢?我总结是,临摹有加,观摩不足。

在初步编撰年鉴时,我们就将各兄弟县市的年鉴摊开来看,权衡、比较各自特点、优长,从中汲取有益经验。此中,从年鉴的组织工作到具体编纂工作,哪些方面值得发扬光大,哪些教训需要吸取,哪些问题需要纠正,我们都进行了思考和总结。并认为,如果自己编出的年鉴赶不上已经出版的兄弟县市年鉴,那么可说是失败的。更何况,自己始终认为所在的察布查尔县“少、边、穷”,不少东西“只为自己所独有”。况且,年鉴也应该一本比一本强,每一个人都应比前面的人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不能只吃前面人留下的现成饭,而是要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包括年鉴的组稿方式、创新与发展,要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这也是我们倾向于年鉴初成继而搞增补的想法之一。但是,

这样的认识并不是一起步就有的。

初时,模仿的痕迹很明显,如某县某乡下设的条目有:【概况】【工业】【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教育】【卫生】【计划生育】【文化体育】【党建工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20多个条目,翻遍了其他几乡,情况大体如此。

从这种横向比较学习中,我们汲取了营养,拓展了思路,本县15个乡镇场的材料全部编辑完成,大体就是沿袭了这样一个模式。当时正沉醉于具体编纂过程中,倒也未觉得有什么别扭。但初稿本完成后,发现乡乡竟然很相似。但将乡名隐去,实在猜不出何谓甲乡,哪是乙乡。对此,我们便不满意起来。有了问题就得解决,我们便拿出过去的劲头来,深入学习起年鉴理论。由此,知道了单一性条目是有个性的、唯一性的,也决定了条目内容的质量,进而能影响整部年鉴。那些泛泛而记、缺少具体微观信息量的常规性条目标题少有可读性,这往往是编辑人员“被动编辑”的结果。

于是,我们重返资料堆中,以丰富的资料为基础,以信息价值为取舍标准,以精益求精为原则,相继挖掘出了这样一批条目:爱新舍里镇的【兽医站通过GSP认证】,堆齐牛录乡的【手工刺绣作品展举办】【乡老龄委与68团老龄委举办联谊晚会】,孙扎齐牛录乡的【奔马合作社的挂牌成立】【听证会解决遗留30年的信访问题】,察布查尔镇的【社区“十分钟服务圈”】……

竟然每个乡都能编辑出几个富有特色的条目录来,这很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其实,一个成功条目的编辑,折射出的是年鉴人的艰辛,也反映了年鉴人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年鉴编撰者不能仅仅着眼于—隅,应当驰神全疆,乃至全国,要把“小气候”放在“大气候”中去观察,将县内大事同区内外大事联系起来写,得以看清全疆及全国形势,避免局限—隅、坐井观天之弊病。^①因此,如若自己遇有思路不通时,可翻翻上级同行年鉴,在纵向学习中寻找特点,看看有关条目的编撰而往往就会有所新得。为此,我们随手常翻阅的上级年鉴有《伊犁年鉴》《新疆年鉴》(获中国年鉴奖一等奖)。例如,受《新疆年鉴》(2011年)中

的【林业对口援疆工作座谈会】(第38页)【自治区与中国民用航空局签署会谈纪要】(第190页)【文化遗产日活动】(第326页)【自治区十佳新闻工作者评选】(第335页)等条目的影响,我们在《察布查尔年鉴》(2012卷)中增补了【感动察布查尔十大党员先锋人物评选】【纪念毛泽东诞辰118周年座谈会】【自治县与对口援疆城市签订乡镇对口援助框架协议】【内蒙古伊泰集团捐赠500万元救灾款】【第六个“文化遗产日”活动】等一些有生命力的条目。

临摹是学习编纂技法的必经阶段,更重要的是要上升到观摩阶段,以在观摩中创新,观摩后提高。只有在观摩中,见贤思齐的想法才会萌生。通过观摩,增补的思路就会越来越清晰,目标就会越来越明确。观摩是一种创新,观摩是为了提高。华山论剑,是为了提高武艺;沙场点兵,是为了增强战斗力;现场“鉴宝”,是为了提高鉴赏力。对观摩者来说,这是一种观点启发、思想碰撞,观摩的过程,是一次绝好的“头脑风暴”。

和一些大而泛的论说相比,我们更倾向于务实的年鉴技艺。而年鉴的具体编纂工作即是一个绝好的平台。我们只想将此作为“试验田”,在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和难点的基础上,下功夫培育出本地优良的“农林315”来(指新疆水稻产区培育出的优良品种,市场好)。年鉴精品在察布查尔县是什么概念?肯定和其他县市不一样,或者说有一样的地方,但更有不同的地方,他有他的特色,我有我的特点。单就从2011年5月自治县纪念锡伯族西迁247周年系列活动中,【《遥远的察布查尔》在自治县首演】【郭梅珍在“箭乡”传授射箭技艺】【阿古亚斯乐队为西迁节献礼卡伦祭拜活动】【有机水稻插秧比赛】等一组条目就是这样提炼出来的,反映了县情,体现了“我的特色”。

对于实际当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同时注意上升到理性认识。我们喜欢理性思考,而触发器就是有编撰实践。有了具体的编撰年鉴实践,才得以看清一些年鉴的不足和长处,否则,年鉴受赠,纯作一种摆设没啥意义。所以,我们时常就有了将年鉴理论文章多读的渴求,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想近距离地看清他县之不足。当然,更重要的是要防止

避免同类的问题发生在自己身上,重蹈问题的覆辙,使自己经手编撰出来的年鉴至少能成一个地区同类著作的翘楚。基于认识所得,年鉴条目标题特色化要注意从几个方面去考虑:

一是在大量占有事材料的基础上,充分浓缩、提炼和概括出年度事实(事情、事件)。二是科学界定条目标题的内涵、外延。三是条目标题要简明和醒目,文字宜简不宜繁,如爱新舍里镇【富民安居示范点、养殖小区举行开工典礼】就不如改为【江苏援建华夏锡伯第一村】好。四是条目标题要揭示条目的本质内容,体现出实在的特点,不要太抽象。

二、有心还是无心

在编撰年鉴过程中,有机会得以细细翻阅新疆伊犁州直八县两市年鉴30余部,未见有一家能坚持逐年出版的。原因在于关键还是质量有问题,而影响质量的关键是任务观点在作祟。仅视作完成任务,年鉴编辑的热情、信心度自然就被抵消去大半,反映在征稿、催稿中,反映在编稿、校稿中,反映在添补、增补中。

是自加压力还是随波逐流 2011年底,编辑《察布查尔年鉴》经县委书记“钦定”后,上了全县项目化管理平台,要求限时办结。2012年4月,县效能办又将之列入“标杆化工程”。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不过,这种压力与作为主编的我的初衷是一致的。单靠模仿,年鉴稿极易拿出手,但会导致质量不高,反映不出特色。克服之,惟有追求高目标。本来,笔者在编撰过程中将之视作干事业,不满足于一般化,就已非常用心、到位,其质量自然不会太差,而又有补增的压力,自是结果不同一般。事实证明,越想搞好,才能搞好。只要想方设法,年鉴朝精品方向是走一步近一步,而不是相反。我们时常要求自己:要像武警战士那样,将自己的营院收拾得利利索索,别具一格。

其中,也需要解决好持久的有责任感问题。所见一些县级年鉴送审初稿本后,一般再少有对遗漏资料的增补,当然或许与当地再无可补资料有关。年鉴走向平庸很容易,这恐怕就是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我们对所存有疑问的地方决不会轻易放过,用一种历史责任感贯穿于年鉴编撰始终,直至

出版为止。

是用三分还是十分心?编辑工作的弹性很大,同样的材料有人只花三分精力,而有的人却在花九分、十分的精力,所编材料中透露出的力度自是不一样:面对同样的一份材料,有的视之如敝帚,弃之而去,有的则掘出闪光点,不厌其烦,与撰稿人沟通,悉心指导、修改,补遗充实,增补后的信息量明显加大。两者相比,其编校稿质量的差异,就有天壤之别了。

编辑人员长年累月、日复一日从事着组稿、改稿、校稿、排版等一系列的工作,容易患上“疲劳症”,难得再见第一次编年鉴的喜悦与冲劲。因而,始终保持一以贯之的工作热情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尤其是数年编、数年忙碌之后,要想避免那种“越干越沮丧,也越干越平庸”的局面,就得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情况,与时代“脉搏”同步,将对年鉴的痴爱融入到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为收集、提炼出一则新条目欢呼雀跃,培养起甘心“当长工”的素质。若用十分心,一个月紧张的增补定会带来充实丰盈的收获!

是主动为之还是被动而为?坐等汇集众手编写的资料,局限性的确很大。有的条目只是语序变一变,数据换一换,甚至是上年的“克隆品”;有的条目套话多,信息含量少,缺乏新意和生动感;有的仅是年终工作总结的条目化,有特色的资料则淹没于平庸材料中或仅以大事记载。改变这种情况,年鉴编辑要思考,做个有心人,对年度情况要了然于胸,除了把报纸、电台、供稿单位作为资料来源外,还要采取种种主动姿态,广开资料收集渠道。

6月,笔者利用县政协委员的身份,用二天时间转了6个乡镇14所新建双语幼儿园,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并拍了不少照片,其中多用在了年鉴当中。当然,对于调研,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事事亲历而为。各行各业每年都会生成一些调查分析之类的材料,你只要收集上来就算成功了一半。如一份偶然看见的“2011年阔洪奇乡库木墩村贫困调查与分析”材料,就为我们增补齐了该村的基本情况资料。因此,编辑人员在翻阅常规材料时,要做一个积极的思考者,要有意识地主动“掘金”

——从每份材料中寻找闪光点，将那些隐藏在字里行间之中或其背后更有价值的内容，提取成真实、有用的信息，进而扩而充之，编辑成富有特色内容的条目，以替换【队伍建设】【精神文明】【党风廉政建设】等泛泛而谈、缺少信息和价值的条目。如不是主动而为之，《察布查尔年鉴》分目“旅游业”中就会失载【戍边屯垦神钟揭牌】【图伯特铜像移置仪式】【全疆首个弓箭主题博物馆建成】等三个富有年度特点的优秀条目。

是去总结还是不去总结？不去总结，便不会前进，更不会提高。不去总结，不会总结，永远走不出“千鉴一面”的模式。毛泽东说得好：“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对于总结，既要总结正面的成功的经验，也要总结反面的失败的教训。翻阅兄弟县市年鉴，我们就是想了解对方地方年鉴编写中都有哪些优点，都有哪些不足。好在哪里？有哪些不足？优点，我好发扬；不足，我去克服。因而，借鉴他人年鉴之长，就成为我们编撰年鉴一项必修的功课之一了。对于总结，既要善于总结自己工作中的经验，又要积极借鉴别人的成功做法。能够从自身特点出发，不断研究和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对于形成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至关重要。但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解决不了遇到的所有问题，必须积极借鉴吸收他人的成功经验，像海绵吸水一样，无时无刻不在畅胸露怀，搜集吸纳新鲜的东西，不断丰富和完善着自己。对于总结，既要立足于实际，又要注意上升到理性认识，引发自己对问题深层次的思考，最终升华为理论文章。

是偶然还是必然？朱光潜先生在“怎样学美学”的讲演中，奉劝美学研究者要“古今中外须贯通”^②，引发笔者对图书的联想，继而想到2011年县图书馆搞了古籍普查一事，自己在编大事记时用过这方面的资料，但在年鉴中却未反映。旋即从床上跃起，回查起有关资料，便增补了这样一个条目：【古籍普查工作完成】。这则所补看起来纯属偶然，其实暗含着必然。在将年鉴初稿本送上级审阅的同时，我们并没有“空闲”下来，而是同时开展了增补工作，且用心十分，着力在突出特点上“朝思暮想”，虽多在遍翻史学史、哲学等书籍，其实时时

萦绕于心的却是年鉴特色条目的编写事。所以，这一条目的所得，即是刻苦用功的回报。

当然，有的同仁可能会问，材料明明有吗，只能怪自己没能及时编写。但是，笔者要说的是，其材料不见有报，仅在县文化局所报工作总结材料中谈到“图书馆服务工作”时，有这样一句：“积极配合自治区有关单位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十作，完成对我县(的)古籍(进行)摸底排查和登记工作。”因而，好的年鉴条目的编撰同年鉴编辑借助、利用“偶然”有关，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年鉴人以一贯之的刻苦努力，所谓“长期思考，偶然得之”。忽视这后一方面，寄希望于偶然的“垂青”，是一种侥幸心理，是不会有所得的。

三、有法还是无法

毕竟和具体编撰过程有别，增补阶段，时间紧迫，须择要而编。那么，增补工作事先头脑要清，要明了工作重点在于年鉴特色条目的编撰。另外，增补不仅需要热情、勤奋、毅力和胆识，还需要正确的方法。方法对头，可以事半功倍；反之，方法不当，便很可能把本来有希望的事情搞坏，无功而返。笔者主编的《察布查尔年鉴》(创刊号)于2011年12月7日正式启动，2012年5月10日编撰出初稿本，其中穿插着进行了一些增补工作。5月10日后发文征求意见、增补条目，6月底全面完成增补工作。

笔者认为，增补的方法不外乎有两种：

一种是边编边增补。

这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具体的。好在在着手编撰年鉴时我们就已做了几项基础性的工作：整理上年度媒体资料本；整理县电视台新闻播报稿；从当地政府网站上辑录出年度大事要情本。三者最终于2012年2月汇编成《察布查尔年度大事记述本》(2011年)一书，计104万字，568张图片。另一项工作是年初以县委、政府两办名义形式下发，重点征集各单位内部简报、单位大事记、工作总结、图片资料等材料。

这样一来，我们对待增补什么资料心中有了底，做到了有的放矢，目的性强。否则，心中无数，真正着手时眼前一片茫然，是无法很好地进行增补的。同时，有上年度各种材料在手，也是进行迅

速度量资料价值、决定取舍的主要依据。如县“扶贫开发工作”中有【科学编制规划】一条目,说已制定出37个重点村整村推进规划。那么这37个村的名单、整村推进年份、所在乡镇等都是应予以记载的。因而在编辑过程中,责任编辑迅速与对方取得了联系,征得了这样一张表:“自治区核定边境(山区)贫困村整村推进村名单(察布查尔县)”。而另外两个条目:【自治县边境试点项目扶贫良种牛发放仪式】【州直扶贫开发工作现场经验交流观摩会】都是撷取于《察布查尔县大事记述本》而成,没费多大气力。

在具体编撰过程中,各专业编辑分头指导,与部门条目撰写人员一起,订正本行业的条目,有利于攻坚克难,编写出理想的条目内容。因门类过多,交稿时间不能划一,有的问题可先记在本子上,不定期地与供稿单位进行联系,以完善补充。而其中主编,在整个编辑流程当中要始终驾驭好全局,对各分目的控制心中有数:在汇稿中一旦发现条目有所变动,要立即指明或进行订正。

边编边搜边增补,能够不断加深认识,扩大线索。本着年度、地域、行业特色的要求,可以陆续进行填缺补漏。不要认为这样会耽误时间,恰恰是如此扩大了眼界,丰富了年鉴内容,突出了特点。如县委组织部下的【首期领导干部计算机技能培训班开班】【140名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赴江苏学习】、县文化局下的【县图书馆免费开放】【何耶尔·柏林故居修缮】【自治县30名学生赴沈阳刚艺校就读】【郭笑媚专辑《呜呼哩》发布会举行】等都是在编辑阶段,从旧有资料堆中挖掘、提炼或二次征补而得的特色条目。

另一种是集中时间进行增补。

有的资料在编辑过程中,未必能看出它的年度价值,只有拉开一段时间,尤其是在集中统稿中,才能看得清它的价值。就此,有必要及早动手编辑完初稿本,留下一些时间专攻增补事略。要掌握少而精的原则,那么增补结果相应地也就显得非常宝贵了,且颇能令人愉悦:或具地情特色,或富年度特色,或有特别价值。为此,我们在将年鉴初稿本送审的同时,向全体编辑人员发出征集令:凡能增补出一个条目者,奖励20元,并指明待增

补方向。

其中,主编要发挥能动性求补。在整个增补工作中,“主编是年鉴的灵魂。主编的素质、水平有多高,年鉴的质量就有多高。”^③因此,主编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新疆自治区已出版的地县综合年鉴绝大多数都是由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主任来担任主编的。主任担任主编,不能当挂名主编,一定要确实负起主编的责任来。主编一定要静一下心来,扑下身子,真正参与到年鉴编辑出版的全过程。主编要操心,会操心,最好是土生土长的土专家。用他的眼光衡量一番,有时仅仅提个醒,往往就能弥补一些缺漏的资料。如在县文化局报送的资料中,经笔者点醒,责任编辑又搜集了国家级、自治区级、自治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情况,特地设有人物简介一目。编辑下来,顿觉得这份资料太可贵了。谁想,在编辑过程中,义闻二位传承人过世。而对于编辑跑来的资料,主编在审阅中认为缺少什么资料,列明明细,再让其补。这便是更科学的做法了。

其中,编辑人员要主动上门索补。对于有疑惑的,知道却又不反映的可上门索取。

考虑到2011年是自治县换届年,政治类日中增设的:【察布查尔县第十二届委员会门记、副书记、常委简介】【察布查尔县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简介】【新当选的副县长简介】二个条目就是责任编辑主动上门求索的结果。不过,若要上门,每到一处,务要求所终;要有侧重,到访一些重点单位,把该单位所有在年度内发生的特色资料全部收集清楚,免得二次上门,浪费人力物力。另外,一些单位、部门都建有自己的网站、网页,不少专题性条目即隐于其中,只待有心人去挖掘。

其中,相关单位要进行补报。我们反馈年鉴初稿,要求各单位对事刊件、人物、时间、数字等内容作一次全面的审核和修改的同时,重点增补出有遗漏的、富有特色的条目。全县上下齐动手,若能增补上十数条就算很有成绩。县道路运输管理局下的【县道路运输管理局揭牌】、县邮政下的【“中国箭乡·锡伯家园”纪念邮票首发】、县国土资源管理下的【11个建筑川砂石矿挂牌山让】等条目皆是报补而得。

(下转第61页)

《甘肃省志·烟草志》目录

概述

第一篇 烟草种植及购销

第一章 烟草种植

- 第一节 种植环境
- 第二节 晾晒烟种植
- 第三节 烤烟种植
- 第四节 种植政策

第二章 烟叶烘烤

- 第一节 初烤
- 第二节 复烤

第三章 烟叶购销

- 第一节 晾晒烟购销
- 第二节 烤烟经营

第二篇 烟草加工

第一章 水烟加工

- 第一节 源流
- 第二节 水烟品种
- 第三节 水烟生产
- 第四节 制丝流程
- 第五节 质量标准
- 第六节 水烟销售

第二章 卷烟加工

- 第一节 卷烟生产
- 第二节 生产设备
- 第三节 卷烟产品
- 第四节 产品质量
- 第五节 卷烟工艺

第六节 计量管理

第三章 生产企业

- 第一节 兰州卷烟厂
- 第二节 天水卷烟厂
- 第三节 庆阳卷烟厂
- 第四节 合水雪茄烟厂

第三篇 卷烟流通

第一章 卷烟购进

- 第一节 地产卷烟购进
- 第二节 省外卷烟调入

第二章 卷烟销售

- 第一节 卷烟批发
- 第二节 网络建设
- 第三节 卷烟零售
- 第四节 销售数量和结构
- 第五节 进口卷烟购销

第三章 卷烟价格

- 第一节 价格管理
- 第二节 价格统计

第四章 仓储运输

- 第一节 仓储
- 第二节 运输
- 第三节 配送

第四篇 烟草专卖

第一章 管理体制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专卖体制
-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专卖体制

第二章 专卖证照

- 第一节 专卖许可证
- 第二节 专卖准运证
- 第三节 专卖检查证

第三章 市场管理

- 第一节 市场整顿
- 第二节 打假打私
- 第三节 查处无证运输
- 第四节 内部监管

第四章 专卖执法

- 第一节 队伍建设
- 第二节 宣传教育
- 第三节 案件处理
- 第四节 案例选编

第五章 烟草税制

- 第一节 清代的烟税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烟税
- 第三节 陇东革命根据地的烟税
- 第四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烟税

第五篇 企业管理

第一章 管理机构

- 第一节 历史上的烟草管理机构
- 第二节 省烟草管理机构
- 第三节 地市级烟草管理机构

第二章 计划统计

- 第一节 五年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 第二节 年度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 第三节 统计工作

第三章 财务与内部审计

- 第一节 管理体制
- 第二节 资产管理
- 第三节 会计基础工作与会计电算化

第四章 人事劳资

- 第一节 职工队伍管理
- 第二节 干部管理
- 第三节 工资管理
- 第四节 社会保障

第五章 安全管理

- 第一节 管理机构
- 第二节 管理制度
- 第三节 环境保护
- 第四节 消防

第六篇 科技文化

第一章 职工教育

- 第一节 教育机构与教育经费投入
- 第二节 学历教育
- 第三节 岗位培训
- 第四节 职业技能鉴定

第二章 科学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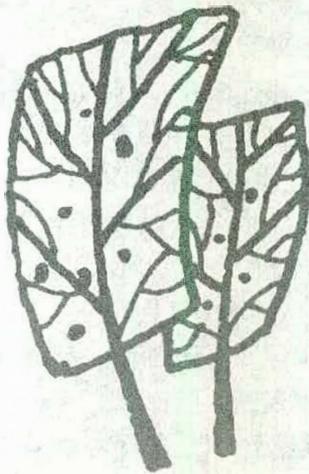
- 第一节 科技管理
- 第二节 信息化建设
- 第三节 新技术 新工艺应用

第三章 文明创建与烟草文化

- 第一节 文明行业创建
- 第二节 企业文化
- 第三节 烟事烟俗

附录

后记



民乐县婚俗研究

周 斌

如果说爱情是人类灵魂绽放的鲜花，那么婚姻就是这朵鲜花赖以生存的土壤，是真摯爱情的最终归宿。俗话说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婚作为人生中一件标志性的大事，千百年来流传下来了许多隆重的程序和仪式。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思想观念、人际关系等都经历着历史性的重大变革，婚姻习俗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发生了重大的变迁。

笔者出生与工作都在甘肃省民乐县的农村。多年来，见证了许多婚礼的举行，也深切感受到了其中的改变，一直有意就民乐县婚姻习俗的改变作以调查。2010年底到2012年9月间，笔者利用各种机会对民乐县农村婚俗进行了多次调查，请教了多位老人，并查阅了《民乐县志》《民乐史话》等资料，经过认真分析与思考，对改革开放前后民乐县农村的婚俗进行了对比整理。

民乐县地处祁连山分水岭以北、河西走廊中段，东邻山丹，西接肃南，南倚青海，北通甘州。有汉、藏、回、壮、土、蒙、白、满、裕固、维吾尔共10个民族约25万人，农业人口约占全县总人口的80%。由于汉族占绝大多数，所以县内婚俗以汉族婚俗为主，本文所述均为汉族婚俗。

由于历史原因及民乐县地理条件所限，民乐县经济发展虽然迅速，但较之发达地区仍有很大差距。故婚姻观念上仍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主，即使是青年男女两情相悦，自由恋爱，在结婚时仍然得按照传统程序进行。故在民乐县内，青年

男女要正式结为夫妻必须要举行相亲、订婚、结婚三大仪式，而每一项仪式后面更有许多小的仪式和程序，也正是这些隐藏在三大仪式后面的小仪式和程序，才真正体现了民乐县农村婚俗的特色。

一、相亲

相亲是从古至今青年男女由陌生到夫妻在爱情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本也无需赘述。但是在民乐县农村，相亲却并非如电视电影里演的那样，青年男女在酒吧、餐厅里见面认识一下，喝杯咖啡、聊聊天。而是要经过问话、小料、大料、看家、买衣服五道程序，且须在双方家长的共同见证之下完成。

(一)问话

民乐县农村一直流行一句话：“父愁儿妻，儿愁父葬”，男子年龄超过二十岁后，第一个开始着急的就是父母，除非是儿子正在上大学或者有正式工作的家庭，否则动员全体亲友寻访婚龄女子将成为父母在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而亲友们也往往会在这件事上表现出很高的热情。

当男子的父母或者男孩本人已经有看中的女孩，但是对方并不知道的时候，或者亲友寻访到的女孩各方面条件都初步得到了男方认可的时候，就需要托人问话。而担负此重任的一般是与女方关系较好且与男方有一定交情的人。问话人的主要任务是先征求姑娘的父母有无嫁女的意向，然后向女方初步讲清男方家庭情况。一般若女方对男方的家庭、住址等基本条件不认可，就会直接拒绝。如果中意，则会向问话人表达“看一下”的要求，但通常不会直接确定日期。

一般女方父母在问话人走后便会开始利用亲朋好友等各种关系开始了解男方更多的情况,如果没有人品及家庭方面特别明显或者重大问题的话,有些姑娘的父母便会提出先小料一下。

(二)小料

“料”在民乐方言里是看的意思,“小料”即“私下里看一下”的意思,小料与大料的区别在,大料时男方需准备相当份量的礼品,而小料时不需要。小料一般可看成是女方父母对男孩的初次审查。且一般会在问话人的家里进行,问话人会将男孩叫来,而姑娘的父母往往会以串门的名义“恰好”碰上。小料往往是那些之前完全不了解的家庭之间才会举行的仪式,姑娘的父母主要看男孩的外貌,并透过言谈举止了解男孩的涵养。如果满意,姑娘的父母往往会邀请男孩去自己家里或者一直陪到男孩离开;若不满意,则往往会中途借故离开。

有些时候小料也会是男方父母对女孩的考查,在男方各方面条件都比较优越的时候,男方父母也可能会向问话人提出小料,地点大多也会在问话人家里。

小料作为一个在农村传统观念里非正式的仪式,有出于金钱上的考虑,也有出于对婚姻谨慎的考虑。一方面避免了女方当面拒绝男方的尴尬,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男方为不中意的女孩花“冤枉钱”的风险。

近几年来,小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思想观念的改变,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男女青年直接参与进了小料的过程中,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

(三)大料

如果小料的结果让双方家长感到满意的话,女方会通过问话人转告男方进行“大料”。大料的日期一般由女方选定,一般倾向于选择农历的双日。大料是农村里真正意义上的相亲,男孩须准备四至八件礼品(必须为双数),一般在问话人带领下去姑娘家。女方在这天一般会邀请姑娘的姐姐、姐夫或者姨父、姨妈、姑父、姑妈等亲属前来,并清扫院落,以示重视。男孩进门后,须向姑娘的父母

及亲属行双礼——连作两次揖,并正式称呼姑娘的父母为“姨爹、姨妈”。进门落座以后,一般由姑娘的男性亲友作陪,女性亲友一般会躲进里屋、厨房准备饭菜。

通常姑娘的母亲会让女儿为客人沏茶,以借机审视;而姑娘的父亲会委婉地向问话人了解男孩家的情况,而事实上是要男孩回答的,一方面了解男方的家庭经济状况,另一方面也在观察小伙子的语言表达、行为举止。

一般情况下,女方会先炒几个菜,让男人们边聊边吃,而姑娘的母亲等女性亲友会借上菜等机会时不时和男孩聊几句。吃过饭菜以后,问话人通常会将女孩叫来,让男女双方进一步相互了解,往往大家会让出一个独立的空间,让两人交流。

聊完以后,女孩的母亲等人会把女孩叫进里间,详细了解聊天内容,并征求女孩的意见。如果女孩满意,就准备做饺子或者长面,寓意“圆满、合美”,如果不满意,就会做短面条或者面片,此时的面片还有个别名叫“篱笆插门”,相当于委婉地告诉男孩一个信息:“不欢迎你以后上我家的门”。

与此同时,问话人也会征求男孩的意见,如果男孩对女孩满意且能吃到饺子或者长面,就要准备送给女孩“见面礼”,如果不满意,则吃过饭就借机离开。

如果彼此都认可,在吃过饭后,问话人就会催促男孩离开,而男孩此时就会送给女孩一定数量的现金作见面礼,(见面礼在这几年涨势很强,已经由2005年的一百元涨至一千元甚至更高),而姑娘便会送给男孩亲手做的鞋垫作为回礼。姑娘的母亲会在男孩的礼品包里装入两包糖,并用红毛线绑几根大葱(寓意甜甜蜜蜜、长长久久)。

(四)看家

看家是正式进入婚姻阶段的第二步,女方如果对男子中意,就会提出去男方家里看一下,一般时间由女方提出,男方只需要做好准备即可。看家可以说是女方对男方家庭的直接审查,同时也是男方亲属对女孩的一次审查。如果男方家人亲属对女孩不满意的话,这桩婚姻便到此为止了。看家也有许多讲究,男方会租车去把女孩及其亲属请

来,并要准备酒宴。女方对参与看家的人数是有严格限制的,一般是四到八人,以应“好事成双”之意。

在宴席上,如果女方对男方家庭满意,女孩会和男孩一起为两方亲属敬酒,而男方亲属要在喝酒的同时给女孩一笔“见面礼”,一般在五十元至二百元之间,男孩的父母、哥嫂给的会更多一点。酒宴结束后,在女方离开前,还须吃一次饺子,所有人必须吃够两碗或者四碗,也是双数。暗寓:“成双成对”之意。

(五)买衣服

在女方看完男方家庭之后,最终决定同意出嫁后,便会由最初的问话人转告给男方准备订婚。而订婚的第一步便是买衣服,主要是为女孩自己及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有些还包括外祖父母买衣服。

这时,女方一般会根据花费多少向男方提出要衣服钱,随着市场行情上涨,衣服钱已经涨到了八千到一万元。由男孩通过问话人作证交由女方父母,现在有些女孩的父母并不会将男方给的衣服钱全部用到买衣服上,会留下一部分供自己使用。

买衣服还有许多讲究,一般由男孩女孩及男女双方各一女性亲属陪伴。且在进城后第一件要买的便是女孩的上衣。所谓“进城衣服出城鞋”,在当天最后离开前必须再为女孩买一双鞋。至于女孩的其他衣服,从内衣到外衣,全部要成双成对,必须凑成双数。另外还必须给女孩家人及陪同亲友每人买一套衣服。一般女孩也会再给男方买一套衣服。

二、订婚

订婚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习俗,在民间,订婚是男女双方在婚前约束婚约的保障仪式,也是在农村的传统观念中具有法律效力的仪式。订婚仪式的举办在女方家里,非常隆重。订婚前,须先将之前一直为双方传话的问话人正式聘为媒人,媒人在订婚仪式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与看家相反的是这次是男方去女方家里,必须同时邀请媒人参加,人数也必须是六至八人,其

中必须由男方家族有威望的人,并有一位品行俱佳的女性同行,且到女方家后男孩要给女方全部亲友行双礼问好。订婚时女方必须准备一定数量的酒菜,并邀请女方全部亲友参加见证。

订婚仪式的第一个程序便是过礼,即男方给女方一定数额的现金作为“压桌礼”。前些年一般在四千元至六千元不等,而最近两年,“压桌礼”直线上升,已经涨到一万多元。不过压桌礼的数目一般是由男方根据行情自主准备,也有些女方家庭会通过媒人委婉地告诉男方自己期望的数额。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男方给的压桌礼太多,会让女方觉得非常有面子,并给男孩女孩每人退还一部分。如果男方钱太少,女方虽有意见,但是也不会直接表达,而是会等到结婚时在彩礼上补回来。所以,对压桌礼的数目,男方一般是煞费苦心,尽量打听女孩同村行情,并通过媒人委婉地“刺探”女孩父亲心目中合适的数字。尽量既要高于女孩的同宗姐妹,以显示女孩的身价,还要不致太高,超过自己家庭的承受能力。

压桌礼一般是由男方主事人当着众人面点给媒人,并由媒人再数一次,然后交给女孩父亲。出于礼貌,女孩的父亲一般不会再数,直接收好,然后招呼妇女们摆出酒席。此时,男方同来的妇女便会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衣服伺候女孩梳洗打扮,男孩也会换上女方提前买好的订婚服,并当着众亲友举行“换手”仪式。

“换手”仪式即互相交换信物,一般前几年男孩会为女孩买一部手机,近些年以“三金”为主,即“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而女孩也会为男孩买一样礼品,如手机等,也有些女孩会送给男孩一件自己精心绣织的针织品。但在农村里一般不流行送手表,因为“送钟”与“送终”谐音,被认为不吉利。一般的,众亲友会把双方的信物传递互看,并评价一番,当然全都是吉祥话。

另一个仪式,便是敬酒,一般先给男方客人敬酒,男孩倒酒,女孩敬酒,男孩在旁边介绍随行的亲属。之后便是男孩为全部女方亲友敬酒,换由女孩倒酒并介绍。此时的敬酒有着严格的辈份次序,同辈者以年龄大者优先。

在敬酒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是给女孩父母敬酒时“改口”，即改换“称呼”，因为之前婚约尚未缔结，男孩对女孩的父母都是以“姨爹、姨妈”相称。订婚仪式一举行，即意味着婚姻已成，男孩必须改口称“爹妈”。有些地方，亲友们在喝完敬酒之后会给男孩几十元的“见面礼”。

在酒宴结束的时候还是要吃一次饺子订婚仪式才能全部结束，对吃饭的碗数也是有要求的，必须是双数。

订婚仪式结束意味着一桩婚姻已经确定，尽管还没有领到结婚证书，但是农村人的眼里，这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男女双方可以自主联系，也可以互相看望，双方家长不再介意。

一般的，按照农村的习惯，订婚后并不会马上举行结婚仪式。一方面是出于对男方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的考虑，给出一个缓冲期；另一方面，还有几个仪式得举行完，一般有送夏衣、送冬衣、拜节、下礼等几个环节。

如果订婚之后正好赶上夏天或者冬天到了，那就必须在立夏或者立冬不久去给女孩送夏衣或冬衣。关于这一习俗请教了好多老人，他们似乎也说不清楚从什么时候民乐农村就已经有了这个习惯，似是古来有之，只不过现在是越来越盛而已。

或许对农民家庭而言，辛辛苦苦把女儿养大了，现在要嫁给你家了，就应该你的人，你就应该供她的穿戴吧。在以前生活贫穷的时候，大多数家庭或许连温饱都是问题，所以女孩子的穿着打扮也就顾不了许多了，只有在嫁人的时候才能享受一点吧。或许在多年以前，送夏衣送冬衣真的是送衣服，就是让女孩子穿的。可是现在生活好了，待嫁的女孩衣服都穿不完，所以也就逐渐演变成了送钱了，一般都在一千元左右。有时候女方如果感觉男方送的钱有点多了，也会退一部分的。

拜节主要指端午、中秋节、春节，因为春节本来就有走亲访友的习惯，所以通常特别在意的拜节就是端午节和中秋节。拜节是准女婿在端午节或者中秋节那天带烟酒、肉等礼品来看望准岳父、岳母及其亲属，可能是多年来从取悦讨好女方家长演变成的一种规矩，或许最早只是某个人为赢

得岳父岳母的好感而这样做，结果许多人纷纷效仿，最终变成了一种一成不变的习俗。

中秋节这天也是男方商量结婚事宜、下礼的日子，这一天的拜节，男方的父亲必须亲自来与女孩父亲商量结婚的事宜，一是恳请女方同意出嫁，一方面商谈结婚的彩礼等大致情况。

这天一般会定下结婚的大致时间，女方的陪嫁品及女方准备要的彩礼钱，民乐的彩礼一般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一是女方嫁女待客的酒席钱，二是女方买陪嫁物品的费用，三是女方养女长大的辛苦费，近两三年已经涨到两万至三万元左右了，且涨势很足。此外女孩还要另外再要结婚衣服钱，多的也近万元。

谈话的整个过程都是在媒人的参与下完成的，一般媒人会替男方讨价还价，以消除亲戚之间的尴尬，等一切都商谈妥当。男方须先给一部分彩礼钱，好让女方提前准备，个人认为另一方面也是对男方如期举行婚礼的一种约束。

此后，许多结婚的细节还要经过双方多次商谈才能确定。直至婚礼当天，双方对结婚细节的交流才能基本结束。

三、结婚

结婚是缔结婚姻最重要的仪式，在许多地方婚礼的仪式才是最主要的，可是在民乐农村，举行婚礼只不过是当天的一个小插曲，繁琐复杂的讲究与规矩才是举行婚礼真正操心的，这些规矩一旦做不好，双方随时都有翻脸的可能性。作者多年来见过好多家庭在结婚的小节上翻脸，甚至最终退婚。

结婚日期前，男女双方除了按法律规定作婚前检查，领取结婚证外，还要再买一次结婚的衣服，依然是成双成对的买。

民乐农村在正式结婚的前一天在女方家里摆嫁女酒待客，女方的亲友在这一天要为女方送几百到一千元礼金，同族要来为姑娘“添香”，以前“添香”是送衣服、布匹等，现在也是直接送现金。所有的一切都必须由女方专门请的账房先生记入礼簿。这一天最繁忙的是新郎家，在女方待客时，男方首先除准备酒席、布置新房外，最重要的一

件事就是催妆。

(一)催妆

催妆并不是催促新娘化妆的意思，新郎在这一天须由媒人，本族有威望、能说会道的长辈或者同辈带领去新娘家，去时须带八斤左右的大肉“礼方”，带两瓶酒，且用红毛线拴在一起，还须带足欠女方的彩礼。

至女方家时，新郎要见人行双礼，挨桌敬酒。主要任务一是向女方亲友表示感谢，二是邀请女方亲友第二天去自己家里。而催妆人把剩余彩礼和礼方交给女方父亲、母亲，并商量好晚上娶亲的时间及其他细节后，便会和女方亲友一起喝酒，按规矩要和女方所有亲友都划拳。所以能催妆的人除了能说会道外，酒量也要大。

至女方待客结束，催妆也就结束了，而女方一定会将男方带来的两瓶酒喝完一瓶，临走时会把空瓶和满瓶继续用红线拴在一起带走，男方一般会要求女方在空酒瓶里装米、面或者水，谐音“米面夫妻”。也有些男方要麻子，取“娃子”谐音，即希望姑娘过门能给男方生个男孩。

(二)娶亲

娶亲怕是民乐最具特色的结婚仪式了，与民乐相邻的山丹、张掖都是在白天娶新娘，只有民乐在半夜娶，所以有好多戏称民乐人是“偷”新娘。

据调查分析，之所以在半夜娶亲，是因为民乐农村娶亲有许多讲究，忌讳怀孕或者在生理期间的女性、戴过孝但未满三个月的人、还有忌讳某个生肖的，还忌讳与棺材碰面，（民乐农村一般在四五点下葬），而半夜一两点正是人睡觉的时间，也就避免了相遇的可能。

所以娶亲一般是凌晨一二点出发，与新郎同行的人数必须是双数，一般是四人，有一男一女，分别负责发放红包和侍候新娘穿着等，外加司机和新郎，通常陪嫁品如果多的话还会有一个专门运送的“陪车”。

临走前男方会给所有参与娶亲的人每人一个红包，还会给足娶亲人到女方家里须分发的红包和花用的零钱。娶亲女性负责带好梳妆匣，带好一床被子，并在里面缝入核桃红枣等象征“百年好

合”的干果和象征财富的现金。还要带好两个蓝色包袱，以备包新娘陪嫁的被褥，另外，要给新郎系一条红被面，称为披红。

当亲车抵达新娘家门时，还会有一个叫门的过程。通常由小妹子或者小兄弟把大门从里锁住，待到娶亲人从门缝里塞入一些钱时，才会开门。

进门后女方一般会留一桌酒席招待男娶亲人。女娶亲人则忙着给新娘穿戴，而新娘的嫂子会往陪嫁的被子缝入干果和现金。男娶亲人要给女方送亲的人发红包，并给新娘的鞋子里面，腰带里面，手里放上钱，还要在新娘头上掉一串钱，女方家人也会给新郎的鞋子里，腰带里放上钱，给所有娶亲的人每人一个红包。

有个别地方还会向新娘家要两个碗，要一对面桃，还有要金木水火土的（一般用硬币、木条、水、火柴、灶台土代替）。

等一切准备好后，新娘与新郎要在祖先灵位前焚香祷告，并给新娘父母磕头告别，这时候新娘要哭，以应“哭嫁”之意（取“出嫁”之谐音）。等把新娘的所有陪嫁品装好后，一般由新娘的哥哥把新娘抱到亲车里，陪同的送亲人（一般是一男一女一个压轿的小孩）会和娶亲人一起离开，在出门时，要在门口燃起一堆火，亲车须从火堆上驶过。

而男方家里已做好迎亲准备，当亲车到门口时，要放鞭炮，新郎要抱着新娘下车，也须跨过准备好的火堆，还要在进门时让新娘吃几颗甜枣。

当新郎新娘在布置一新的新房里坐定后，就会由新郎的嫂子端来两杯用红线连着的红枣茶，开始喝交杯茶，不须全部喝完，但是要吃完了杯子里的红枣，寓“早生贵子”之意。

此后新郎新娘就要一直在婚床上坐着，据说下地早了，以后命苦。

(三)婚宴

第二天，男方同族的所有男人女人都会前来帮忙，大概在八点多，厨师便会把菜准备好，先招待同族及邻居，这时，新郎新娘要给所有前来贺喜的人敬酒，一般在喝完敬酒后都会对新郎新娘说几句祝福的话。与此同时，前一天带领催妆的人会坐雇好的客车前去姑娘家请娘家客，而男方亲友

们此时也会陆续赶来贺喜，新郎要站在院子里为所有来贺喜的人行双礼。

所有来贺喜的邻居、亲友、同族弟兄都会送一笔贺礼，从几十元至一千元不等，一般亲戚礼重。专门负责记礼的账房先生会详细记下每个人的贺礼数目，待到婚礼结束后再交由男方。婚宴上最重要的主角是娘家客，娘家客到门口时要放炮相迎，大门口有专门给男宾敬酒、敬烟的，也有专门给女宾敬喜糖、甜枣的。新郎更是挨人行礼。在招待娘家客时，除了新郎、新娘给娘家客敬酒，更有专门的陪酒队伍，一定要把娘家的男宾们都喝醉才行。

(四)婚礼

到下午两点左右，婚宴基本就结束了。这时，真正的婚礼仪式才开始，司仪开始向亲友们致辞，表示感谢。并依次举行拜天地、谢媒、谢厨、端礼三面仪式。

拜天地

拜天地是古来有之的习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岳父母不会出现在女儿的婚礼上，所以现场只有公婆。新娘要改口叫爹妈，并向公婆敬酒，并送上自己准备的礼物，一般是每人一套衣服。而公婆要给儿子、媳妇每人几百元的礼金作为回礼。

谢媒

谢媒时，新郎、新娘要给媒人行鞠躬礼，在媒人面前的方盘里摆好两瓶好酒、一条烟、礼品盒、一套衣服、男女双方的礼金（一般在四百元至一千元左右）。并向媒人敬酒，一般媒人会把礼金分发给新郎新娘，只带走其他礼物。

谢厨

谢厨仪式上要向厨师敬酒、并送上烟酒，但并不计入厨师酬金里。

端礼

端礼是婚礼仪式上最热闹的一个环节，司仪会依次邀请新郎的伯父母、舅舅舅母、姑父姑母、哥嫂等。新郎新娘要行三次鞠躬礼，并送上次已准备好的衣服，而接受礼物的亲友也会还以二百到四百元左右的礼金。

司仪会在端礼仪式上故意刁难新郎新娘，以

活跃气氛，如让二人同步鞠躬，错一丝都不行，或者让新娘为男亲友点烟等。

还有些地方会在端礼仪式上捉弄新郎的哥嫂，用黑灰涂脸、扮演角色等，可谓哄堂大笑。

(五)闹洞房

闹洞房是好多地方都有的习俗，民乐的闹洞房主要由平辈男子进行。民乐人认为，结婚是天地之合，必为魔鬼所不容，故在洞房内有煞气，而男子在闹洞房时会把煞气赶走，是大吉大利，所以新郎新娘要遵从闹洞房人的意思，不能发脾气，否则不吉利。有些人家若没有人去闹洞房，新郎的父亲还要去请人来闹。

闹洞房可以说是花样繁多，异彩纷呈，当然话题都是围绕性爱展开的，比如让新娘说一些与性有关的话题，或者两人模拟一些性爱动作等。

闹洞房应该是古时对新郎新娘进行性启蒙的一个仪式，现在随着社会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已经失去了启蒙的意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夫妻双方的尴尬，活跃了气氛。

(六)铺床

闹完洞房，新郎新娘休息时还有专门的铺床仪式。负责铺床的一般是上年纪的妇女，要在床上扫一次，但是向里扫。并念念有词：扫，扫，往里扫，东面的核桃西面的枣，两口子好，不吵口，白天打架晚上好……

然后铺床人会在床上撒下一堆核桃、红枣、桂圆等让新郎新娘去抢，抢完后，铺床人便会离开。

(七)踩门、回门

在结婚的第二天早上，公婆须指使一名小孩带一些核桃红枣喜糖去敲门，新郎新娘在听到敲门声后才可开门，小孩进屋后要把核桃喜糖等扔到床上，新郎新娘要给小孩子一个红包。

其他地方的回门都是回娘家去小住，两人须分屋睡。据说本意是怕新婚夫妻身体太过疲劳，去娘家休养。可是在民乐农村，回门是在就近的邻居或者亲戚家，吃一顿饺子即回。

四、对民乐婚俗的思考

婚俗反映了一个地方民众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观，民乐县农村繁冗复杂的婚姻习俗，是与当地经

济因素与历史因素、地理因素以及思想观念紧密相连的。它的存在有积极的一面,当然也有其鄙陋的一面,笔者就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究与思考。

(一)积极作用

民乐县在经济发展方面远落后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思想观念也相对保守,当地男女青年通过自由恋爱结合为夫妻的相对较少,即使有一些,也最终回到了传统婚姻的轨道上。所以民乐农村现行婚姻模式基本还是以父母包办为主,没有完全进入自由恋爱结婚的阶段。但就对民乐现行的婚姻模式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1.父母的全程参与保障了婚姻的稳定性

因为整个婚姻从开始选择到操办过程都由双方父母直接参与,双方父母对子女都已经有了较大的认可度。而且,在婚姻操办过程中,双方父母进行了多次沟通与交流,互相已经建立了必要的信任。所以在后期子女的婚姻问题上,一般两方父母都能够理智对待,能够尽量作为一个中间人进行调停,也对子女的婚姻生活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婚姻破裂的风险。

2.巨额花费对婚姻起到了稳定作用

从民乐婚俗不难看出,所有的程序基本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在转——钱,从开始问话到把新娘娶进门,多的可能花到十几万,少的也得八九万。对于经济并不发达的民乐农村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家庭提前四五年就开始为儿子准备彩礼钱,加之婚前一般都要重新修房子,相当多的家庭在结婚后要花四五年甚至七八年才能把结婚所欠的债全部还完。所以,好多夫妻即使关系不太好也很少提出离婚,因为再结一次婚的压力特别大,也往往超出了一个农民家庭的最大经济承受能力。所以现在农村里离婚的特别少,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即使经常吵架也很少提出离婚。

3.过多的精力与财力的投入提高了男方对女方的珍惜程度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经济现象,很多人都可能轻易地将一颗糖果扔掉,但是有谁会在一粒钻石扔掉?即使不是钻石,就这颗糖果,如果价格

提高到几万元,你还会轻易扔它吗?

人都有一种共同的心理:得到的太容易一般不珍惜。许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一个主动向你示好的女孩和一个你追求了很久的女孩,你可能对后者更看重。

娶一个妻子,在农村里花费精力、财力巨大,可以说在结婚的那天每个男子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这个妻子娶得太不容易了。所以一般男子都对妻子很珍爱,一定程度上也保障了婚姻的长久性。

4.众多的陪嫁品和经济压力给了夫妻双方生活的动力

现在农村结婚的陪嫁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时尚,从前些年的自行车、缝纫机到现在的冰箱、电脑甚至小汽车,可以说应有尽有。但是在民乐婚俗里面,这些钱其实都是男方给的彩礼里的一部分,姑娘要的越多,男方要支付的彩礼钱也就越高。然而对于新婚夫妻来讲,即使家里已经欠了好多债,可是应该有的已经全都有了,唯一的目标就是挣钱还债。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许多新婚夫妇正月结婚,二月就双双出外打工。好多小两口婚前懒懒散散,可是结婚后却勤俭朴素,就是因为他们从婚姻的甜美与物质的满足中感受到了压力,激起了生活的信心与勇气。

5.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对生女孩的态度

农村里的重男轻女是几千年的老习惯了,好多家庭以前只是看到了男孩可以养老,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到了生男孩的压力,也看到了生女孩的优势,现在已经逐渐兴起了生女孩的热潮,前些年为生男孩不择手段的人越来越少了。

(二)弊端

当然这种纯粹以钱为核心,近乎买卖的婚姻也有其严重的弊端。其鄙陋之处也让许多人痛心疾首。

1.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也违背了国家倡导的自主婚姻原则,扭曲了以爱情为前提的精神,变成了以金钱为前提。

2.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妇女的自尊,贬低了女

孩的自身价值,尤其是以彩礼作为婚姻的筹码,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关系,伤害了女孩的感情。

3.以家庭经济情况为主要择偶标准的现行婚姻模式,造成了许多无爱或者缺爱的家庭,许多夫妻尽管在一起生活,却没有真正感情,找不到婚姻生活的幸福感。

4.日渐攀升的彩礼和各种花销,为生男孩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也让许多女孩从结婚的那天起就成了还债的一方,许多女孩因此为自己昂贵的身价付出了好多年青春的代价,显得滑稽而又极富讽刺意味。

5.男女双方缔结婚约,也是在缔结一份亲缘关系,而这一份亲戚关系最初却是以钱开始的,最初的交流就是讨价还价。有些家庭因为无法满足女方的经济要求,甚至导致关系破裂。以致结婚后,两家形同陌路、貌合神离。因为金钱而牺牲感情,致使翁婿相背,实是婚姻最大的败笔。

6.此种风气导致了恶性循环,如有些家庭在儿子结婚时花了很大一笔钱,在女儿出嫁时便有过之而无不及。导致邻居、亲友、姊妹之间互攀互比,让美好的婚姻陷入了金钱的漩涡中,也让现在好多农村女孩形成了严重的拜金思想,将金钱置于自己之上,有些农村女孩甚至为钱放弃了自尊自爱。

五、结语

在整个婚姻关系的缔结过程中,村民对于婚姻习俗的遵从程度及遵从与否,是与其社会地位、文化程度、对外交往等息息相关的,是各方力量“博弈”的结果。传统力量在维系农村婚姻习俗上还存在相当程度的影响,比如民众将“婚宴”而不是单纯的结婚证书视为婚姻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但是,法治观念在农村中正在成长,领取结婚证书也逐渐被认为是取得合法婚姻的重要一环。婚姻礼节、婚姻仪式等的变化不仅是婚姻习俗的变化,更是农村社会文化、社会观念变化的一个缩影。在农村婚姻习俗变化的过程中,在人口、家庭、自然、社会等多种条件的共同影响之下,农民对婚姻习俗的遵从与否形成了不同的念度。我们只有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社会流动的大背景下,理清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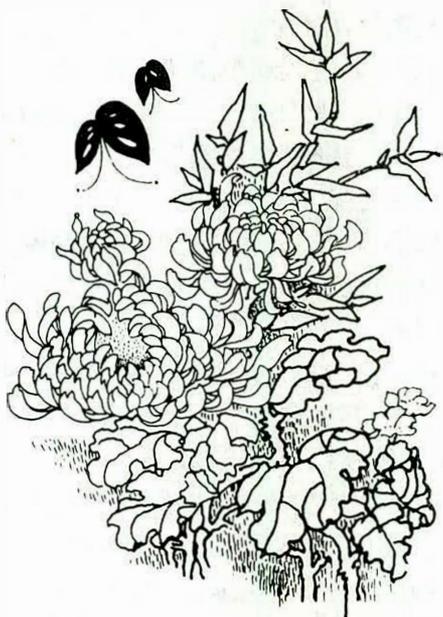
姻习俗变迁的原因、变化的方向,农民在婚姻习俗变化过程中的态度、影响等,才能克服婚姻习俗中的陋俗的影响,引导好农村中婚姻习俗的变化,制定符合实际的婚姻政策。

笔者希望也相信,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物质文明的日益满足,民乐县农村现行的婚姻模式一定会发生更大的变化,也必然会让人们开始重视精神文明,从金钱婚姻逐渐转变到爱情婚姻。有一天,男女双方的婚姻必然会只是为爱而存在,为爱而绽放奇葩!

参考文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 [2]《民乐县志》,民乐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
- [3]《民乐史话》,李中峰主编,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

(作者系民乐县民联寄宿制小学教师)



中国各民族的形成

刘志勇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在不断的变化和融合中,才形成今天的 56 个民族。

中国的民族以蒙古人种(黄种人)为主体,也有一部分民族是由欧罗巴人种(白种人)演变而成的。可按不同区域和语系分为蒙古人种西北利亚类型、蒙古人种北亚类型、蒙古人种南亚类型、蒙古人种东亚类型、蒙古人种马来类型、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等六大类。现分述如下:

一、蒙古人种西北利亚类型形成的民族

蒙古人种西北利亚类型形成的民族是由埃文克人(史称通古斯人)一支形成的满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以及由鄂伦春人形成的鄂伦春族。

满族是由住在贝加尔湖的一支通古斯人于公元前 10 世纪左右迁入我国黑龙江和松花江一带而形成的。舜时称为“息慎”、“肃慎”族。西汉时称“沃沮”,东汉至晋时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当时分为七部。隋、唐时称为“靺鞨”,唐时分为“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二部。黑水靺鞨归附于隋,遣使朝贡。五代时,“黑水靺鞨”称为“女真”,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下游一带的“女真”,在 12 世纪逐渐统一,于 1115 年建立了“金”政权。明时女真分为三部,其中建州女真崛起,统一了各部,后建立“清”,成为了我国的满族。

赫哲族是由上述“女真”中“野人女真”演变而成的。史称“黑斤”、“黑真”等。始见于清康熙初年《清圣祖实录》及《皇清职贡图》。历史上曾因穿鱼皮和使犬被称为“鱼皮部”、“使犬部”,是我国北方以捕鱼为主兼事狩猎和使用狗拉雪橇的民族。分布于黑龙江省同江、抚远和饶河等县沿江地区。

达斡尔族是由贝加尔湖迁入我国黑龙江的通古斯人演变而来的。10~13 世纪迁入西北利亚中部,部分南迁至嫩江流域,史称“索伦营”、“索伦部”,明、清时有史记载。自称“达斡尔”。

鄂温克族是上述“索伦部”的一支发展而来,仍是通古斯人的一支。明末清初游猎于黑龙江中上游以北,贝加尔湖以东地区。自称“鄂温克”。

鄂伦春族是由通古斯人一支发展而来的。公元 10~13 世纪迁到西伯利亚中部,后部分南迁入黑龙江。鄂伦春人史称“鄂尔吞”、“俄尔吞”、“俄罗斯春”,同为“索伦部”,17 世纪因沙俄入侵迁于小兴安岭一带。清分为摩凌河鄂伦春和“雅发罕鄂伦春”。

二、蒙古人种北亚类型形成的民族

蒙古人种北亚类型主要是由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两支形成的民族。

(一)蒙古语族一支形成的民族有锡伯族、蒙古族、乌孜别克族、东乡族、保安族、土族。

锡伯族的形成,是由最早的“东湖”一支发展而来。公元前 24 世纪左右,帝誉高辛氏(黄帝曾孙)“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北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因地在匈奴之东,号曰东湖”。春秋时燕国被秦所灭,南邻燕国的“东胡”,迁于辽河上游一带。秦汉时被匈奴冒顿单于所击破,余部退居乌桓山和鲜卑山,分别称为“乌桓”和“鲜卑”。一部在北魏时称为“室韦”。其“鲜卑”势力渐强后,形成部落联盟,又兼并东部鲜卑。三年后首领轲比能死,联盟瓦解。魏晋南北朝时,鲜卑各支兴起,其中“席伯”一支在西晋时称为“须卜”,在北魏时称为“室韦”,后又称“西楚”。清代时,史称“锡伯”。17 世纪编入满州八旗,分布于辽宁沈阳和吉林扶余等地。建国后

成为我国的锡伯族。

蒙古族是从上述“东胡”中被匈奴击败的余部分离出来的。这些“东胡”余部在北魏时称“室韦”。在公元六世纪时，定期派使者向中原的东魏和北齐朝见纳贡。南北朝时分为南、北钵、深末恒五部“室韦”。唐时又分为二十余部“室韦”。其中“蒙兀室韦”发展成许多部落，于公元1206年建立蒙古国。并封建了钦察、察合台、窝阔台、伊儿四个汗国。于公元1271年至1368年，元世祖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元朝。明代，又分为“鞑靼”、“瓦剌”两大部，“鞑靼”分布于大漠南北，清属外蒙古，“瓦剌”属于内蒙古，成为我国的蒙古族。

乌孜别克族，是从蒙古国下的钦察汗国分支的。又称为金帐汗国。其一支称为乌孜别克汗，《元史》中称“月即别”、“月祖别”。一部分南下至中亚地区，由于与中国商业往来，以后有些人又从中亚陆续迁入新疆。清统一新疆后，便散居在新疆伊犁一带。

东乡族，是在13世纪的元朝初，居住在甘肃临夏一带及东乡县的蒙古人与散居在兰州、定西，以及宁夏、新疆等地的蒙古人，与当地的汉族、藏族、回族等长期相处，发展形成的。旧称“东乡回”、“东乡土人”、“东乡蒙古人”。元初并入“探马赤军”，从事屯田戍。后由军户变为农户。明初推行保甲制度，划东乡为十里。



保安族，是元朝时，由一支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在长期发展中，与部分汉、回、藏等族融合形成的。明初定居在今青海同仁县境内隆务河一带。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70年)在当地设立“保安站”，

修筑保安城，应招戍边，便以此地名为族名。

土族是由蒙古的一支发展而来。元朝一支蒙古军与土谷浑人长期相处，逐渐融合而成。明初归受封的16家土司管辖，清代沿袭。旧称“青海土人”、藏族称为“霍尔”，自称为“蒙古勒”、“蒙古孔尔”。

(二)突厥语支形成的民族

突厥语支包括“丁零”、“坚昆”、“匈奴”三支。丁零支形成的民族有维吾尔族、裕固族、塔塔尔族、撒拉族。“坚昆人”形成的民族有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

维吾尔族是由“丁零人”一支发展而来的。春秋战国时分布在贝加尔湖北。汉时迁入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东汉时西迁，南北朝时迁到了河北今北京一带，以及山西的代县、河南一带。留在北漠的大部分丁零人在魏晋南北朝时称为“铁勒”。其“铁勒”部落中的袁纥部落，在隋、唐时又称“回纥”，并建立了回纥地方政权。后回纥可汗征得唐朝的允许，改为“回鹘”，取义为“回旋轻捷如鹘”。唐代文宗时，为“黠戛斯”攻灭。于是大部分“回鹘”人分三支西迁，一支迁吐鲁番盆地，称“高昌回鹘”。元明时又称畏兀儿。解放后成为我国的维吾尔族。

裕固族，是上述回鹘人的分支形成的。即河西回鹘一支，曾受五代的唐、晋两王的册封，元代称为“撒里畏



儿”，明代称为“黄头回鹘”。西夏时与蒙古族相融合，一部分成为我国的裕固族。

塔塔尔族是汉代时从上述铁勒一支分流出来的。6世纪初南北朝时，兴起于金山(今阿尔泰山)西南麓。初起时，先属于柔然。西魏时，首领土门收其众五万余人，东灭漠北柔然，自称伊利可汗，建立突厥汗国。隋代分裂成东突厥与西突厥。其东突厥又分为后突厥和撒马罕两支。其后突厥在唐代称为“达怛”、“鞑靼”。蒙古兴起后，鞑靼部为其所并。15世纪中叶，鞑靼人建立起钦察汗国，自建喀

山汗国。位于伏尔加河中游,后被俄罗斯征服。19世纪,该部分人从伏尔加河中游陆续迁入我国新疆,与当地民族融合,形成了我国的塔塔尔族。

撒拉族是从上述东突厥分出的一支,自称“撒尔”、“撒拉”、“撒拉回”。于13世纪元代时,迁入循化地区,称为“撒尔罕人”。在与周围的汉、回、蒙古等族长期的融合中形成。

突厥语族的坚昆人一支,在公元前2、3世纪以前游牧于叶尼塞河上游一带,称为“坚昆”、“结骨”、“居勿”等,受匈奴的统治。三国时,匈奴西迁,“坚昆”逐渐强大。在魏晋,被称为“纥骨”、“契骨”(坚昆的转音),为突厥的部落之一。后归属唐朝,称为“黠戛斯”,在其地设坚昆督府。9世纪40年代,建立了柯尔克孜汗国。唐封其首领为“英武成明可汗”。10世纪中叶,叶尼塞诸部向南迁移,融入了蒙古和哈萨克部落,促进了本民族的发展。宋代称“黠戛斯”,元代称为“乞儿吉思”、“吉利吉斯”,清称为“布鲁特”。后成为我国的柯尔克孜族。

哈萨克族是由突厥语族“坚昆”人从叶尼塞河南下的一支形成的。这支民族混有印欧语系大月氏和塞种人的血统。居于我国敦煌、祁连之间。西汉时称为“乌孙”。公元前161~前160年,据月氏人地为国。汉时公主曾与乌孙通婚。12世纪,乌孙人与蒙古人若干部落与乌孜别克汗国东迁的部落长期融合,而形成联盟。15世纪中叶,这部操突厥语的游牧部落从蒙古金帐汗国中分裂出来,称为“昌萨”、“阿萨”、“可萨”等,意为“脱离者”。

三、蒙古人种南亚类型形成的民族

蒙古人种南亚类型是蒙古人种的主要类型。其支系包括汉藏语系中的汉族语族、藏缅语族和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越芒语族、孟高棉语族、印尼语族等。其具体可分为华夏、夷、濮人三支。

(一)华夏支形成的民族

华夏支形成的民族有汉族、苗族、瑶族、土家族、基诺族、门巴族、藏族、珞巴族、羌族、普米族。

汉族的形成是从7000多年前的燧人氏发展而来的。历经了伏羲氏、神农氏和轩辕氏。黄帝轩辕氏在阪泉打败了炎帝神农氏后,统一了各部,形成了大部落联盟。经历夏商周三代。各民族不断融合,散布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各民族,融合到了以

商、周为核心的华夏族中。秦汉时,形成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统一民族。在汉武帝刘彻至汉宣帝刘询之际,“汉”遂成为中华民族的嘉号。“汉族”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体。如周代时,陕北一带的“鬼方”融合到了汉族中,周还灭了“蒲姑”、“奄”、“莱”许多部落;春秋时,“九夷”、“蜀”也被融合入汉族中;秦汉时的“戎”、“东夷”、“楼烦”、“匈奴”、“巴人”、“闽越”、“小月氏”等大部或全部融合于汉族中。还有一些民族被另外的民族融合后,再融合在汉族中。

苗族是从伏羲之后分离出来的。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姓巴氏。巴氏之子名相务,战国末年秦并巴后,巴郡南蛮的相务奉以为君,称为廩君,即成为廩君蛮。东汉前“三苗”一支融合于南蛮中。东汉时强徙廩君蛮部于江夏郡(今湖南云梦县一带),逐渐向东和北部发展。五世纪时扩到今河南东部及湖北北部,被称为“豫州蛮”、“五水蛮”等称谓,隋唐以后,又融合于“南蛮”中。

瑶族是上述“五溪蛮”的一支。隋、唐时称为“苗众”,唐代称为“莫徭”,宋代称“徭”。以后逐渐向西迁,清代称“勉”、“金门”、“甘迪门”。

土家族是从“五溪蛮”中的“沅溪部”分离出来的。自称为“毕兹卡”,意即“本地人”。宋至清称为“土人”、“土丁”、“土民”。

畲族是“五溪蛮”中,祖籍居于广东潮州、凤山的一支发展而来。自称“山哈”、“山达”、“山客”。史称“畬民”。曾接受宋王朝的招抚。元代称“奢民”。明代时,陆续迁于闽东、浙南等地。

基诺族是从“南蛮”一部分的“三苗”迁入三危(今甘肃岷山及云南边境一带)后,于秦、汉时称“西羌”。西羌一部分又南迁云南西双版纳定居,自称“基诺”,史称“攸乐”。元代属“彻里军民总管府”,明隶属于“车里宣慰司”,清初设“攸乐同知”。清中叶后,属傣族的攸乐土司管理。

门巴族,是“西羌”一支发展而来。汉代后,西羌分为10余支,其中烧当羌最强盛。后烧当羌又分为10余部,其中“发羌”、“烧当羌”的“迷唐部”、“雅隆部”、“苏毗部”、“羊同部”于东晋时曾建立“后秦”政权。后来又分为三支,其中分布在西藏东

南部门隅地区的多数部族自称“门巴”。

藏族是从烧当羌中一支分离出来的。由秦代时称“博”的六牦牛部中一部分组成,西汉时称“发羌”,少数称“堆巴”、“安多哇”、“嘉戎哇”。6世纪山南“雅隆部落”首领,成为当时诸部落的首领,号称“赞普”(王),建成自称“博”的奴隶制王朝。7世纪初,赞普松赞干布统一整个西藏地区,在史籍中称“吐蕃”,与唐朝交往频繁。并与唐文成公主联姻。元在西藏地区除设置朵甘行都指挥使司外,还承袭元朝土司制度管理。清朝在中央设置理藩院管理西藏。

珞巴族是从藏族中分出的一支而形成的。分出这一支叫“博嘎尔”或称为“巴达姆”、“民荣”、“崩加”和“德根”。分布于西藏工布地区。后越过喜马拉雅山南迁,居于西藏东南的珞瑜地区和隆子、米林、墨脱、察隅县边沿山区。

羌族是从“烧当羌”中“青羌”一支发展而来。秦汉时,分布在四川西北部的阿坝一带。主要有“冉拢”部落。汉武帝时,在其地设置汶山郡。魏晋时称为“青羌”,其中宕昌、邓至羌部尚属父子氏族阶段。唐代称发羌。明代推行土司制度。

普米族是南迁的一支羌人发展而来。自称“普米英”、“普咪”、“培米”。居于四川、甘肃、青海的边境地区。13世纪中叶,随元朝忽必烈征云南,到了云南丽江一带定居下来。明代称为“西番”。元、明时处于纳西族土司的统治下。清代称为“巴苴”。

(二)夷人支民族的形成

夷人支形成了彝族、独龙族、傈僳族、纳西族、拉祜族、哈尼族、怒族、白族。

彝族的形成,可以上溯到帝尧时,它是当时就已出现的古民族,又称“东夷”。分布在今山东及河南东部和淮河中下游一带。有“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之说。是当时一个强盛的部落联盟。传说制造八卦的太昊氏、发明历法的少昊氏、创造刑法的皋陶、名射手后羿等,都是“夷”族中的名人。春秋时有九夷,后来分别被齐、鲁吞灭。大部分被融合于华夏族中。汉时,一部分居于甘肃南部、四川西南和云贵的诸民族称为“西南夷”,它与羌、濮融合而成。有“滇夷”、“邛夷”“离夷”、“昆明夷”等。其中“夷”,在蜀汉、魏、晋时称“叟”,有“蜀叟”、“青

叟”、“苏析叟”、“越离叟”等,统称为“小种夷”。其中“爨”分为“东爨”和“西爨”。其中“东爨”分布云南昭通、贵州西部及滇越等地,称为“昆明人”,有14姓,又称“乌蛮”。“乌蛮”在唐代有37部蛮。在元、明、清时,统称为“罗罗蛮”。解放后定名为彝族。

独龙族是“东爨”中的“乌蛮”发展而来。“乌蛮”中有“六诏蛮”,六诏后为南诏统一。六诏中的“浪穹诏”,分布于云南独龙河谷及怒江两岸。元代称为“撬”,或称“俅”。后成为独龙族。

傈僳族是“六诏”中的“施浪诏”发展而成。唐时称“施浪蛮”,分布在云南怒江州及丽江、保山、德宏等地。南诏统一后又称“卢蛮”。明、清时称为“栗粟”。

纳西族是由“六诏”中的“越析诏”的“越析蛮”发展而成。唐史中称“么些”、“摩沙”。自称“纳西”、“吕西”、“苏西”等。后成为纳西族。

拉祜族是由“乌蛮”发展而来。“乌蛮”中的“锉锅蛮”支系,居于云南西双版纳一带,唐时,在南诏统一后,居于今沧源、西盟等地。元、明、清时,史称为“傈黑”,后为拉祜族。

怒族是元代史籍所称的“路蛮”发展而来。清史称为“怒人”,居于云南碧江、福贡、兰坪、贡山等地,成为怒族。

哈尼族是由“乌蛮”的一支发展而来。史称“刺蛮”、“朴落蛮”、“鹿蛮”。元代居于云南楚雄的景乐、镇源、景谷等地。清代称为“和尼”。

白族是由“西爨”一支发展而来。自晋至隋,居于今云南东部,曾达洱海。唐时在滇池周围一带,称为“白蛮”。其中包括“松外蛮”、“白水蛮”,以及“邛部州蛮”。其首领段氏曾建“大理国”。元、明、清时,称为“白人”、“僰人”。清代以来,汉族称为“民家”,纳西族称为“勒布”,傈僳族称为“勒墨”。1956年正式定名为白族。

(三)濮人支民族的形成

濮人支民族形成了壮族、侗族、仡佬族、水族、毛难族、黎族、布依族、京族、佤佬族、傣族、德昂族、布朗族、景颇族、阿昌族。

壮族是商周时“濮人”的一支发展而来。分布于江汉之南或楚国西南。周时曾参加周武王伐纣

会盟。周匡王时与麋人伐楚。战国时演变为“百濮”与“北越”。“百濮”成为孟高棉语族。百越在史料中有“于越”、“南越”、“骆越”等。百越中的“骆越”在周代就有记载,亦称“雒越”、“路人”等。汉时分布于广东、广西、贵州,以及越南北部。东汉以后逐渐演变为“僚人”,分布于广西、广东、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隋代有“乌浒人”、“飞头僚”、“俚僚”等众多支系。其中“乌浒人”又称“乌浒蛮”,汉时分布在广西等地。魏晋南北朝时称为“俚人”或“俚僚”。唐代称“黄峒蛮”或“乌武僚”。宋代称“撞”。解放初称僮族,1965年改称壮族。

侗族是由僚人中的“蛮僚”发展而来。又称“峒僚”。隋、唐时居住在我国南方。明清时称“侗僚”和“侗家苗”,分布在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处。

仡佬族是从僚人中“鸠僚”一支发展而来。亦称“鸠民”。汉、晋时分布在云南滇西及益州(今文山、红河)一带。后称为“仡佬苗”。明、清时称“木伦佬”、“水仡佬”、“披花仡佬”等。分布在贵州遵义、安顺等地,广西、云南也有散居。史称有“葛僚”、“仡佬”等。

水族是僚人中的“南僚”发展而来。隋、唐称为“溪峒蛮”,宋代称为“抚水州蛮”,分布在今广西环江北部,其它散居于贵州的荔枝、都匀、独山等地。

毛难族是从僚人中的“南僚”一支发展而来。唐代称为“茅滩”、“冒南”、“毛难”等。分布在我国广西环江县下南乡一带。

黎族是从僚人的“俚僚”中一支发展而来。隋唐时分布在广东海南岛中部。唐宋以来称为“黎”。

布依族是“蛮僚”一支发展而来。晋魏晋南北朝时统称“蛮僚”,唐代称“南谢蛮”,唐末称“都云蛮”,又称“俚僚”、“八番”。元、明、清时又称“仲家”。1953年定名为布依族。

京族是从上述“骆越”中“越人”支系发展而来。亦称“京人”。曾建立“大越”、“安南”等古国。一部分于16世纪从越南涂山等地陆续迁入我国广西防城各县沿海地区,后成为我国的京族。

佤族是从前述骆越的一支发展而来,分布于广西罗城、宜山、柳城、都安等地。明、清时称为“伶人”。清代称为“木老”、“木佬苗”。后成为佤族。

傣族是从“百越”中的“滇越”一支发展而来。居于云南德宏、西双版纳、耿马、孟连一带。元明时称为“白衣”、“百夷”。清以后称为“摆夷”、“摆衣”,后称傣族。

德昂族是从滇越的唐代“茫蛮”一支发展而来。元代在今路西县芒市地区设“茫施路军民总府”,封头人为土官。明代隶属傣族土司统管。清代称为“崩龙”,有“达昂”、“昂”、“冷”等20余种自称。分布于云南德宏、路西、临沧等地,成为我国崩龙族,后改称德昂族。

佧族是从“滇越”中的一支发展而成。分布于云南西部一带。明代称为“古刺”、“哈刺”。清初自称“嘎喇”、“哈瓦”、“卡瓦”。他称有“拉”、“本人”,自称有“佧”、“阿瓦”等。现居于“沧源”、“西盟”两县及散居澜沧等地。

布朗族是由“滇越”一支发展而来。元、明、清时称为“蒲人”、“蒲蛮”、“朴子蛮”。自称有“布朗”、“阿瓦尔”等。他称有“蒲满”、“孟”。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及澜沧、双江、镇康等地。

景颇族是由“滇越”的一支发展而来。其中一支定居于云南西北怒江地区。16世纪移居于德宏州。自称“大山”、“小山”,统称为“山头”。他称有“景颇”等。

阿昌族是从“滇越”一支发展而来。唐代是“寻传蛮”的一支。在2世纪时居于怒江流域,10世纪后南迁,定居于保山、梁河、陵川等地。元明时袭土司制度,明在户撒设长官司,受土司统治。清代称为“俄昌”、“阿昌”,成为我国的阿昌族。

四、蒙古人种东亚类型民族的形成

蒙古人种东亚类型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北方汉族人。其中朝鲜人一支,在旧石器石代时便与中国有了友好往来。公元前5世纪进入青铜时代,出现了众多的部落联盟。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时,朝鲜设立四郡。1世纪建立了新罗国。17世纪中叶,“新罗”先后灭“百济”和“高句丽”统一朝鲜半岛大部,成为“高丽王朝”,于1392年改国号为“朝鲜”。19世纪70年代,部分朝鲜族迁入我国东北地区定居。由于爱穿素白衣服,有“白衣民族”之称。主要分布于吉林、黑龙江、辽宁三省,多聚居于延边一带,成为我国的朝鲜族。

五、蒙古人种马来类型形成的民族

蒙古人种马来类型又称海洋蒙古人,包括穆鲁特人、马达加斯加人、高山人、印尼人、菲律宾人、马来人、曼西人、北阿尔泰人、拉普人。其中我国的高山族来源于“高山人”。高山人可以追溯至3万年的旧石器时期的“佐镇人”。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的古越族与来自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居民相融合发展而成。明清时称为“番人”、“土番”。清代分为“野番”、“生番”和“熟番”。又因地区不同有多种称呼。其语言属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大体分为“泰雅”、“曹”、“排”三支,成为我国的高山族。

六、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民族的形成

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属于白种人的一种类型。属于我国的民族有阿拉伯人中的回族和波斯人中的塔吉克族,以及斯拉夫人中的俄罗斯族。

回族始于阿拉伯人和北非部分混有尼格罗人种(黑种人的一种)成份。属于“闪米特人”最大的一支。原居于阿拉伯半岛。7世纪建立了阿拉伯帝国,中国称为“大食”,横跨欧、亚、非三洲。来到我

国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长期吸收汉、蒙古、维吾尔等族成份以及葱岭东西喀什噶尔等地信伊斯兰教的部分回鹘人后裔而逐渐形成。唐时称为“蕃客”,元、明以来称“回回”。后成为我国的回族。

我国塔吉克族是由伊朗人(又称波斯人)的一支发展而来。公元前10世纪前后,来自欧亚草原操伊朗语的一支古老部落的民族与古伊朗人、粟特人的基础上,逐渐融合发展而成了塔吉克人。先后从帕米尔西部和南部迁移到我国新疆塔什库尔一带。唐代在其住地设葱岭守护。元代称“色勒库尔”。后成为我国的塔吉克族。

我国俄罗斯族的形成,源于白波罗底海人,又称斯拉夫人。斯拉夫人史见于1世纪末和2世纪初的罗马文献,称为“维涅德人”,即古斯拉夫人。4世纪形成西、东、南三支大部落集团。10世纪前后,若干东斯拉夫部落结合成了“古罗斯部族”,建立了基辅罗斯大公国。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以莫斯科为中心建立了俄罗斯中央集权制国家。18世纪时,少数俄罗斯人从俄罗斯逐渐迁入我国新疆,成为我国的俄罗斯族。

(转自《巴蜀史志》2002年第3期)

2002年第3期

(上接第45页) 当然,缺漏不可能百分之百的补齐,增补资料也必须有一个反复提高的过程,有些资料初看时价值不大,或忽略过去了,或没摘记几行。在汇编资料时,把零星的资料整理到一起,便会发现由于原来搜集得不细,摘抄得不全,有必要复查与补充。所以,在增补重要资料时,还应本着“宁失于繁,勿失于简”的原则进行。同时,对于那些背景资料也要摘抄回来。

对于增补,需要树立几种意识:

一是要有精品意识。要像志书那样,也需要反复打磨,几次往返,其间得有奉献精神,得集中精力突击,讲求时效和实效,尽量减少大的遗漏。

二是要有开放意识。年鉴编撰人员不能自囿于狭小的天地,要不断地与外界交往、交流、交融信息。

三是要有批判创新意识。对于资料不能不加选择,盲目“拿来”,也不能照搬,而要经过甄别、选择、消化、吸收。

四是要有求精意识。对于资料的缺漏要正确分析,准确把握增补标准,防止事无巨细,不分主次,补得过多过繁。

①刘伟毅等著:《中国方志史》第299页,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2010年4月版

②全国高等学校美学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合编:《美学讲演集》第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③许家康:《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第140页,线装书局2006年9月版

(作者单位:新疆察布锡伯自治县史志办)

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

榆中籍红军将士

沈明江

说起二万五千里长征，妇孺老幼皆知它是由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方人浴血奋战创造的一部人类历史上气壮山河、名垂千古的英雄史诗，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以南方人为主的红军队伍中还有许许多多的陇原儿女，其中参加了长征，并且幸存下来的榆中籍红军将士有靳虎、徐承俊、鲁瑞林、林占魁等四人。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斩关夺隘，抢险飞渡，翻越六月飞雪、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他们是榆中人民的骄傲和自豪。

苦难的少年时代

靳虎、徐承俊、鲁瑞林、林占魁他们都出生于贫穷的农民家里，在少年时代经历了困难与饥饿的考验，从小养成了他们特别能吃苦耐劳的精神。

靳虎，原姓金，祖籍金崖镇寺隆沟村，1911年出生于城关镇李家庄村刘家桥社，一家数口人借宿在地主的两间破草房里。祖父和父亲在春、夏、秋期间给有钱人打短工，冬天上山打柴谋生。尽管如此，他们一家仍然缺衣少食，生活过得非常艰难。在靳虎7岁那年，母亲忍痛将10岁的姐姐送给别人。靳虎到了10岁的时候，在夏天跟着父亲给别人打短工挣钱，在冬天与祖父、父亲一起上山砍柴，并背到十多里地的县城出售。在那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里，他们的努力不但没有赢得生活的好转，而是一天比一天艰难，生活每况日下。

徐承俊，1909年出生于和平镇柳沟店村，一家4口人（父母、姐姐和他）住在一间破草房里，靠

祖上留下的5垧旱地（每垧相当于2.5亩）、半亩水地为生。在农闲的时候，父亲打点短工，勉强度日，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生活更加艰难。面对苦难的日子，父亲厌世颓废，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为了满足他的私欲，狠心地卖掉了亲生的女儿，母亲由此精神失常。1918年，母亲离开了人世，父亲卖掉5垧旱地办了丧事。不久，小弟弟死了，大弟弟送了人，时间不长也死了，一个家庭就这样解体了。1920年，父亲把仅有的一点家产——半亩水地卖掉，吸了鸦片，生活没有了任何希望。徐承俊就去叔伯哥哥家放牲口。1923年，14岁的徐承俊给一家有钱人当了放牛娃，挣来的血汗钱，父亲也买了鸦片。第二年，徐承俊来到兰州，先后在裁缝铺里、香坊里当学徒。

鲁瑞林，1911年出生于临夏。仅仅读过一年的私塾，从八岁起就放牛、耕田、种庄稼。为了逃避民国17年（1928）发生于临夏的战乱，父母带着他们兄弟四人一路乞讨，翻过了马衔山，来到了榆中县马坡乡马坡村挖了两个窑洞安了新家。父亲和两个哥哥给有钱人种地做工，自己给地主放羊，母亲在家做简单的家务，照看小弟弟。

林占魁，1898年出生于小康营乡上彭家营村。由于家中没有土地，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从事给地主放羊、拉长工等差事，长期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难日子。

投身军队

林占魁投身军营的时间较早，大约在1918年左右，被甘肃地方军阀抓了壮丁，成了一名旧军人。靳虎、鲁瑞林、徐承俊他们三人当兵的时候正

是刘郁芬主政甘肃。刘郁芬主政甘肃以后,为了配合冯玉祥与蒋介石争夺地盘的需要,积极扩充军队,大量招兵。刘郁芬在甘肃招兵的途径有三种。其一是接受满怀救国救民理想的热血青年,榆中的窦时寻、刘仁就是他们中的代表。其二是抓壮丁,徐承俊从军就是这一类型。1928年的一天,徐承俊与几位伙伴在街上行走,突然被部队包围,几个人一同被抓进了兵营。从此,徐承俊便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其三是接受大量的灾民投军。在冯玉祥扩充军队的时候,恰逢民国18年(1929)甘肃发生了大旱灾,赤地千里,十室九空,榆中尤为严重,老百姓纷纷托儿带女到异地逃荒,沿途到处是灾民,遍地是倒地而死的饥民。一些身体较好的、还有一些气力的灾民纷纷投身军队,当兵吃粮。当兵吃粮成了当时灾民的唯一出路,榆中县一个村子当兵的就达到数十人,全县达到了数百人。靳虎、鲁瑞林就是他们中的代表。民国17年,靳虎的祖父和父亲先后被活活饿死,只剩下母亲和他们兄弟3人。为了活命,母亲给有钱人家当佣人,靳虎给地主家当上了放牛娃。第二年,灾情仍无缓解,地主家又辞去了他这个放牛娃。生活无着落,生命垂危,母亲又忍痛将他卖给一家地主作“儿子”,换得150斤秕谷子。靳虎名为“儿子”,实为长工,每天上山放牛,回来时还得背一捆柴,稍不如意便以拳打脚踢,骨瘦如柴的靳虎身上常常是青一块紫一片。有一天,他听说住在县城的孙连仲部队正在招兵,心中突然萌发了去当兵的念头。于是,他就偷偷地跑到县城给孙连仲部队当兵。鲁瑞林也在同年跑到县城给孙连仲当兵。当年参加冯玉祥部队的人员以第三种方式最多,据《甘肃省志·军事志》记载冯玉祥从甘肃征兵累计达到了10万人以上,其中像静宁、榆中一些募兵大县超过了1000人。从榆中县招募的士兵分别被编在孙连仲、宋哲元、张自忠的部队里,人员分布数孙连仲最多,占到了一半以上,宋哲元次之,张自忠最少。他们有的跟随冯玉祥参加了蒋、冯、阎的中原会战牺牲在异国他乡;有的被打散陆续返乡务农;有的参加了抗日战争,牺牲在抗日战场上;还有一些弃暗投明,加入红军。

向往光明,走向革命

1930年4月1日,孙连仲奉冯玉祥之命率部东下,在河南等地参加了讨蒋战役。孙连仲部与蒋介石在河南发生了激战,部队伤亡过半,很多的榆中籍士兵长眠在中原大地上。冯、阎联合倒蒋失败后,孙连仲迫于形势投靠了蒋介石。蒋介石把冯玉祥在河南新乡的部队整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任总指挥。1931年蒋介石派二十六路军入赣“围剿”红军。靳虎、鲁瑞林、徐承俊也随部队进驻江西宁都。由于孙连仲部队的士兵是以甘肃、青海、宁夏、陕西籍为主的北方人,调到江西后水土不服,大批士兵死亡,加上蒋介石对杂牌部队的歧视,反蒋情绪日益高涨。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厌战反蒋、要求北上抗日的情绪日益高涨。同时,二十六路军和红军交战期间,许多士兵被红军俘虏。不久又放了回来,放回的士兵给他们说:“红军真是穷人的军队,在红区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人”、“红军优待俘虏,不打不骂,回来时还发给路费”等等。俘虏兵的讲述使孙连仲的广大基层官兵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一个好的印象,萌发了他们向往光明、向望自由的愿望。

这样的时刻终于到来了。1931年12月14日,二十六路军乘孙连仲去南京之机,在参谋长赵博生、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等人的率领下,举行了起义,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靳虎、鲁瑞林、徐承俊随起义部队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靳虎在十三军二十师一团一营机枪连任排长,鲁瑞林在十三军特务团当战士,徐承俊在十三军担任军医。在宁都起义的过程中,甘肃籍将士起到了主要作用。在红五军团中,甘肃籍官兵不下5000人,占到了起义队伍17000人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榆中籍的官兵就有一二百人。

林占魁1930年随部队起义参加红军,编入红四方面军军部当战士。

保卫红色圣地,浴血奋战

宁都起义后,红五军团开赴瑞金附近集训。中

中央军委给红五军团派来肖劲光、刘伯坚、何长工、宋任穷、黄火青、左权等政工干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团以上单位配备了政治委员，每个连队配备了政治指导员。通过参加红军的政治教育活动，使靳虎、鲁瑞林、徐承俊等起义人员觉得找到了归宿，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战斗的热情和决心，他们参加了中央红军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役。

靳虎参加了广东水口、江西广昌、福建建宁等多次重要战斗，勇敢地完成了上级交给他的任务。在广东水口的战斗中，红军和广东军阀作战，上级交给靳虎所在机枪连的任务是掩护主力前进，阻击敌人逃跑。当时，一部分敌人集中在桥上，靳虎组织火力向敌人猛烈扫射，打死敌人四五百人，另外两股敌人企图逃跑，靳虎带领一个步兵排冲上去，将40多名敌人全部活捉，缴获轻机枪3挺，重机枪2挺，步枪40多支，胜利完成任务，受到师部表扬。在1933年江西广昌战斗中，靳虎所在营掩护主力转移，他们坚持了两天一夜，敌人重兵把他们里外三层的包围起来，危机四伏，在此重要时刻，靳虎带领全营战士从敌人的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包围。这次战斗中，靳虎身负重伤，左胸部一连中了敌人五颗子弹，右腿也被炸弹炸伤。

鲁瑞林经历了赣州、巫廖、新桥战斗以及保卫广昌和兴国等战役。其中“巫廖伏击战”率全连英勇作战，受到上级嘉奖，受到苏区《红星报》大篇幅报道宣传。

徐承俊实现了从一个国民党士兵到一名红军战士，从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到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的重大转变。徐承俊成了一名红军战士以后，非常兴奋和自豪。连队组织学习，他积极发言，诉说自己苦难的身世，控诉国民党军官对士兵的压榨，逐渐加深了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感情，逐渐了解了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道理。在第四次、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发挥自己所学专长，积极救助受伤红军战士。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许多人思想上开始动摇，有的想开小差，有的想投降国民党，徐承俊积极抵制这一切行为，还主动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在中央教导师，由张新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占魁参加了鄂豫皖根据地一至四次反围剿斗争和黄安、商璜、苏家埠、潢光四次进攻战役。1932年10月随部西征转战，参加了川陕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和仪南、营渠、宣达战役及反六路围攻等艰苦战斗。1934年调任四方面军总部地方工作部副队长。

生死抉择，参加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失败以后，被迫开始战略大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路上前有各地方势力的重兵防守，后有国民党中央军的强敌追击。红五军团走在中央机关的后面，负责掩护中央机关的行动，既要面对国民党地方势力的堵截，还要面对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随时有被打散、分割包围的情况出现，但是他们怀着忠诚于党和革命事业的理想信念，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恶战和苦战，做出了重大牺牲，确保了党中央和后勤机关的安全。从江西出发的时候，榆中籍的红军将士还有上百人，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甘肃会宁会师的时候已经不足数十人。在红军长征进入甘肃以后，为数不多的榆中籍红军指战员与其他甘肃籍指战员充分发挥地形熟、语言通、习惯相近的有利条件，筹粮筹款，建政扩红，为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会宁会师以后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开辟甘肃河西根据地、奠定抗日后方、打通国际路线的指示精神，红五军团挺进河西，与长期盘踞在青海、甘肃河西的国民党军阀马步芳、马步青以及地方民团英勇作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兵败河西。至此，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榆中籍红军指战员仅剩下了靳虎、鲁瑞林、徐承俊、林占魁四人，其余全部壮烈牺牲或失散了，就连姓名也没有留下。

在长征中，鲁瑞林历经突破湘江、抢渡乌江、四度赤水、巧夺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战役，其中曾为搭救伤病员而往返四次过雪山草地；在掩护中央军委和总部机关撤离类山关的阻击战中，指挥果断，身先士卒，身负三处枪伤仍坚持率部作战，英勇顽强，受到军委电令嘉奖。1936年八九月间，红二、四方面军走出草地，进

军甘肃省南部,在这里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力量。鲁瑞林被任命为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民运科长,带领民运工作人员在农村发展党员和积极分子,建立苏维埃政权,为红军筹粮筹款,仅一个村筹集到粮食2万多斤。

徐承俊任中央教导师卫生队长。1935年2月,调任中央总收容队医生。长征途中,徐承俊时时刻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有重担抢着挑,苦活累活争着干。在缺医少药的艰难条件下,努力想办法救治伤病员,并出色地完成了80多名重伤员的安置工作。与此同时,徐承俊还用自己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津贴费购买了救国公债,受到了上级领导机关的通报表扬。

林占魁1935年3月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由于张国焘反对中央红军北上,两进两出草地到达了甘肃以后,他所在的部队士兵非常的疲弱,林占魁充分发挥本地人的优势,侦查敌情和寻找粮食。为自己所在部队渡过长征中最后的困难,做出了积极地贡献。1936年10月抵达会宁,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会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在会师以后,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开始西征,实现打通新疆的战略任务。林占魁所在部队进军河西,林占魁配合地方人员进行政治宣传和筹集粮食的工作。1937年3月在肃南康隆寺战斗中与部队失散,流落到张掖小满乡拉长工11年。

在长征期间,靳虎的伤口复发了,行动十分困难,但是他仍然坚持行军和指挥战斗。到了过雪山草地的时候,他的伤口化脓实在走不动了,战士们不忍心把单独留下来,硬是用担架抬着他翻过了雪山,走出了草地,胜利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走向胜利

长征胜利后,留在革命队伍中的靳虎、鲁瑞林、徐承俊他们又投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滚滚洪流中去,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抗日时期,靳虎曾调任延安保卫团团团长。响应党中央号召,一面组织部队防御敌人进攻,保卫延安,一面带领部队积极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徐承

俊积极投入战斗行列,先后担任医务科长、兵站医院副院长、院长等职。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曾和白求恩大夫一起,克服各种困难,带领医护人员出色地完成了伤员抢救和护卫任务。鲁瑞林率部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太原,坚持太行山区持久战,深入敌占区反“扫荡”、打到敌后方进行反蚕食斗争,开辟、巩固和创建、发展抗日根据地。

在解放战争时期,靳虎带领部队多次完成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在解放林甸、富裕两县城时,靳虎带领西满军区绥化军分区全体官兵,消灭守城敌人2千多名,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在攻打齐齐哈尔时,歼灭敌人1800名,缴获汽车50多辆,坦克10多辆。鲁瑞林率部投入解放大西北战役,展开大规模运动战,诱敌围歼,为解放西北做出了重要贡献。徐承俊先后任和平医院分院院长和陕北第五后方医院院长等职。

1955年,鲁瑞林被授予少将军衔,徐承俊被授予大校军衔。1956年,靳虎被授予海军大校军衔,1962年晋升为海军少将。

解放后,靳虎先后担任海军炮兵学校副校长、海军预科学校校长、南京炮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械部副部长等职,1985年2月18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享受副兵团级待遇。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徐承俊先后担任过甘肃省军区卫生部部长,后勤部政治委员、部长以及宁夏军区后勤部政委等职务。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勋章”各一枚。鲁瑞林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一枚。

靳虎、鲁瑞林、徐承俊、林占魁等一批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榆中籍红军将士,他们的名字随着那段历史的远去被人们渐渐的忘记,但是他们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长征精神将会永放光芒。

(作者系榆中县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民国大事记(1948)

民国 37 年(公元 1948 年)

1 月

1 日 国民党甘肃省民政厅公布:全省共辖 72 县(市、局),770 乡(镇),6900 保,7.9312 万甲,121.8259 万户,689.7781 万人(内男 357.9655 万人、女 331.8216 万人)。全省耕地 381.911 万亩;牧区 3.36547 亿亩;林区 1195.37 万亩。

9 日 中共陇渭工委一游击队袭击甘谷县安远镇公所。事后,国民党天水、岷县、临洮三专员带领自卫队等共约 500 人,到安远镇及通渭榜罗、陇西县城一带“清乡”围剿,抓捕 30 多人,杀害 8 人。

15 日 国民党西北“剿总”在兰州成立。张治中任总司令,甘、宁、青、陕 4 省省主席郭寄峤、马鸿逵、马步芳、祝绍周任副司令。

27 日 国民党甘肃省“戡乱建国会”在兰州成立。

△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生致电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抗议九龙英国当局迫害华侨,强烈要求政府收复香港、九龙。

是月 中共陇东地委在华池县刘坪召开干部会议,纠正土改中“左”的倾向。会后,派出了 300 多人组成的 5 个工作团,分赴老区各地进行土改试点。

2 月

5 日 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在武威设立示范甜菜制糖厂,并购进一批英国甜菜籽种。

△ 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甘肃省选举完毕,11 人当选。

是月 为抗议国民党兰州宪兵无理殴打学生,兰州大学学生 400 余人,上街游行示威,并成立“兰大学生抗暴委员会”,迫使当局惩办了凶手。

3 月

1 日 甘肃农业改进所公布 1974 年甘肃棉花

产量为 4.5149 万市担,甜菜 1924 市担。

15 日 国民党甘肃省选举事务所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甘肃省当选代表名单,共 88 人。

17 日 国民党甘肃省府为“充实地方武装,加强反共力量”,向全省强征“自卫特捐”1200 亿元。

29 日 国民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代表大会,选举蒋介石、李宗仁为正副总统。

是月 中共甘工委决定,甘肃城市工作以兰州为中主,要为解放兰州作好准备。

4 月

10 日 兰州特种刑事法庭成立。是为国民党专门迫害进步革命人士和学生的机构。

18 日 天水保安队无端枪杀天水中学生王铭,城内各校师生罢教、罢课,要求严惩凶手。国民党天水县政府为平学潮,处死了一名死刑犯人,暗中放走凶手。

19 日 陇东分区 13 团、14 团和回民骑兵团,在曲子县合道川胶泥岷岷,与国民党政府军马继援部 82 师及省保安队激战 6 小时,分区部队失利。负责断后的 13 团 1 营 1 连,与敌殊死搏斗,全连 108 人中,仅 5 人突出重围。

22 日 西北野战军解放灵台。

△ 国民党甘肃全省保安司令部宣布第二区(平凉)、第三区(庆阳)、第四区(天水)所辖各县戒严。

30 日 中共甘工委决定在兰州建立皋榆工委。先后辖洮岷、靖远、东城区、西城区工委和兰州学委,书记罗扬实。1949 年 8 月兰州解放后,皋榆工委即行结束。

5 月

3 日 西北解放军解放崇信。

5 日 西北野战军在镇原县屯子镇附近与国民党政府军 82 师浴血奋战,歼敌 2000 余人,西北

野战军亦有较大伤亡。

9日 西北野战军警2旅路经宁县,向县城打炮数发。国民党政府军扣押在城内的数百名解放军被俘战士,闻讯越狱暴动。遭守城的国民党政府军谭腾蛟部残酷屠杀镇压。1984年在当地挖开3口井,即发现烈士遗骨320多具。

20日 英国驻中国大使施谛文等10余人,由南京来兰州,并往山丹参观培黎学校。

6月

2日 国民党陕甘川边区绥靖公署成立。川军邓锡侯任主任。甘肃文县、康县、武都、西固4县划入其管辖区。

7月

3日 兰州国立各大专院校教职员向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辕、甘肃省府请愿,要求改善生活待遇标准并配发实物。

9日 国民党甘肃省府公布:甘肃本年田赋实行“借一征一”,总额为155万石。

31日 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辖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张治中任长官。

△ 国民党政府国防部联勤部兰州被服厂工人掀起“反迫害、反饥饿”运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以“违犯国家总动员法令”为罪名进行镇压。捕工人30余人,分别判处徒刑。

8月

19日 “法币”贬值,票值不抵币纸,群众多用法币糊顶棚、墙壁。国民党政府又宣布“改革”币制,发行“金元券”。券面分1元、5元、10元、50元、100元5种;辅币分1分、5分、1角、2角、5角5种。每金元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并以金元券收兑民间金、银和外币。

24日 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后,物价暴涨。国民党兰州市政府制发《兰州市物价手册》。规定中等小麦每市石金元券11.5元,清油每公斤8角,煤砖每块(重7.5斤)4分,斜纹布每匹32元,白

布每匹30元等。但市场物价仍恶性暴涨。

28日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公布:币制“改革”后,全国文武人员薪饷分区支給标准:兰州、酒泉列为第二区,加45%;甘肃其他各地区列为第四区,按基本薪饷发给。

△ 兰州市中小学校师生罢教、罢课,抗议欠发4至8月份教员薪金。

30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布告:为防止国民党政府“币改”祸及边区,严禁“法币”、“金元券”流入边区使用,严禁边区黄金、白银、银元流入国民党统治区。

是月 靖远县靖乐渠竣工。引黄河水,渠长12公里,灌溉面积2.5万余亩。

10月

10日 据普查,兰州市有工厂174家,其中机器制造5家,汽车及机器修理31家。

18日 西北地质调查所考古队在甘青交界的享堂峡,发现恐龙化石及旧石器时期遗址。

24日 卓尼禅定寺辅教普觉禅师丹珠呼图克图举行坐床大典。藏族僧俗万余人参加。

11月

1日 国民党政府兰州中央银行公布:自金元券发行以来,截至10月底,甘肃全省“收兑”民间黄金4232.27两,白银15.26万两,银币67.4155万元,五角银币55枚,银角7616枚,美钞9798元,港币336元。

13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对甘肃工作的指示》,指出:“今后工作应以陇南工作为基础,向南、向西发展,大大加强陇南工作,并向河西回民区发展。”

22日 国民党甘肃全省保安司令部令加强地方“自卫武装”,督饬所属县、局清查户口,管制交通,严密联防会哨和盘查、守望、封锁。

28日 中共甘工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精神,决定工作重点由农村逐步转向城市,加强情报搜集工作,做好统战、学生及工运工作,为解放和接管兰州做好准备。会议还决定建立

陇南工委(书记高健君),将陇渭工委改为陇右工委(书记陈致中),并明确皋榆工委就是兰州市委。

12月

10日 蒋介石命令:除新疆、青海、西康、西藏、台湾外,全国均宣布戒严。

16日 中共甘工委提出皋榆工作方针为:“思想进城、政策进城、工作进城”。是时,皋榆工委在兰州建立党支部21个,并在国民党自卫队、保安团、补训团等地方部队中派进和发展了一批党员。

17日 国民党甘肃省府宣布:平凉、庆阳、天水、武都四专区为接战区域;武威、酒泉、岷县三

专区为警备区。兰州市实行宵禁,禁止集会、结社、游行请愿。邮电书报实行检查,并严格进行户口清查。

是年

△ 西北纺织厂工人为抗议兰州警察局无理逮捕工友,包围警察局,终于使在押工人获释。

△ 罗扬实发展西北人民民主同盟(即反马大同盟)负责人康实君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使这个秘密革命团体在后来的“兵运”中,做了不少工作。

△ 陇东分区群众全力支援解放战争。是年3次组织支前担架大队,3000余人随军服务。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举办《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志》编纂人员业务培训班

为切实提高《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志》编纂人员的业务水平,确保志书质量,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于4月18—19日在兰州举办了《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志》编纂人员业务培训班,各牵头单位和参编单位的编纂业务人员共110多人参加了培训。省地方史志办公室高度重视此次培训班,李虎主任亲自主持开班式,并就办好培训班提出了具体要求。副主任钱旭通报了前一阶段各单位的工作进展情况,并就下一阶段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

灾志》总纂邱新立,《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专家组成员、河北省秦皇岛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齐家璐,《汶川特大地震四川抗震救灾志》编委会办公室编辑组组长、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省志处处长陶利辉,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志处处长王晖分别在培训班上授课。

由于参与《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志》的工作人员中许多人都是初次接触修志工作,业务生疏。为帮助志书编纂人员学习掌握地方志编纂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解决大家在业务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疑惑,本次培训班四位授课专家紧紧围绕重大事件志的编纂,就地方志基本知识、志书资料收集与资料长编编写、志书编纂方法和工作步骤,以及在灾害志编纂过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对大家进行现场答疑。通过专家的讲授,大家普遍认为此次培训针对性强,培训内容切中工作实际,事例丰富,实用价值大,对提高大家的业务水平将起到很好的作用。



今昔肃王府(上)

安文迟



兰州市中央广场1号,甘肃省人民政府所在地,乃是600多年前(1399年)明王朝的肃王府。风雨沧桑,历经清代、民国直到甘肃省人民政府的成立,一直是甘肃省最高领导机关的所在地。至今省政府大门、中山堂、办公楼依然是红门绿瓦,雕梁画栋,气势昂然,保持着古建筑的民族风格,这在全国都是极其罕见的。院内树木葱笼,亭台水榭,鸟语花香,幽静清雅。但是,自明至今,肃王府几经变迁,人文景观大都不复存在,为了使读者对昔日肃王府,延续至清的巡抚府、总督府,民国时的省政府有所了解,我们集纳了有关史料,供读者参阅。

一、明代封藩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打下天下后,为了保持朱氏王朝的永治久安,以及同蒙古贵族作斗争的需要,“控要塞,以分制海内”,乃封王加爵,二十六子一一得到妥善安置。二十六子中,除懿文太子外,皇子楠未封,洪武三年封燕王,后尊为帝。得封的有二十三子,分别为秦愍王棖、晋恭王栢、周定王橚、楚昭王桢、齐王樽、潭王梓、赵王杞、鲁荒王檀、蜀献王椿、湘献王柏、代简王桂、肃庄王模、辽简王植、庆靖王橚、宁献王权、岷庄王楸、谷王穗、韩宪王松、沈简王模、安惠王楹、唐定王桢、郢

靖王栋、伊厉王橚、靖江王以南昌嫡孙受封。

《明史》《诸王世表》载:“洪武中以子孙蕃众,命名虑有重复,及于东宫亲王世系各纵二十字为一世,子孙初生,宗人府依世次立双名,以上一字为据,则取五行偏旁者,以火、土、金、水、木为序,惟靖江王不拘”。东宫拟名曰:“允文遵祖训,钦文大军胜。顺道宜逢古,师良善用戡。”肃王府命名的二十字:“瞻禄贡真弼,缙绅识烈忠。曦晖跻当运,凯谏处恒隆。”可惜肃王府二十字只用了八个字,到“识”字辈(即朱识铉),明肃王即告完结。

明太祖封藩规定,亲王之子例封郡王,若以支属继承者,自后长子袭封亲王外,余子仍照原封世次,授以本等爵级,不得冒滥郡爵。郡王无子,兄弟及兄弟之子不得请袭,违者为冒封。

朱元璋规定,亲王不得干涉地方民政,但拥有地方军事指挥权,设有亲王护卫指挥使司,内有“中护卫指挥一员,指挥同知二员,指挥僉事四员,官军五百三十三员”,“器仗九十四件,火器一千三百九十有八,辖墩台四座”。按照《皇祖明训》规定,亲王护卫兵归亲王直接指挥调遣,遇有急事,亲王封地内的卫所守镇兵,也一并归亲王指挥。朝廷要调士兵,必须同时发出盖有皇帝御宝的文书,给守镇军官,守镇军官必须接到御宝文书,又接到亲王

指令,方可出兵。肃王府也拥有这些权力,实际上亲王是明朝皇帝在甘肃的代表。

二、明肃王传

明肃庄王榭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四子。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封汉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命朱榭偕同卫、谷、庆、宁、岷五王练兵,戍边卫疆。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将朱榭的汉王改封为肃王。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诏命就国,因陕西各卫兵未齐,朱榭驻平凉。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榭就藩(封建时代的属国、属地)甘州(今张掖),正式命为肃王。“领张掖、酒泉诸郡,西肩嘉峪关,护西域诸国”,统理陕西行都司和甘州的军务。甘州五卫指甘州左卫(今民乐县)、甘州中卫(今高台县)、甘州右卫和前卫(今张掖市)、甘州后卫(今临泽县)。

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榭受命督军屯粮,遇有征伐,以长兴侯耿炳文为随从。

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请求内徙,朱榭将肃王府移藩兰州,明成祖永乐十七年(1419年),肃庄王朱榭薨(即死去,古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音 hōng)。其子康王瞻焰继承。

宣德七年(1432年),康王瞻焰请加岁禄。敕(皇帝的诏令)曰:“洪武、永乐间,岁禄不过五百

石,庄王不言者,以朝廷念远地转输难,故也。仁孝即位加五百石矣,朕守祖制不敢违也。”

天顺八年(1464年),康王瞻焰薨,其子简王禄埤继承。肃简王朱禄埤初封洵阳王,成化四年(1468年)袭封,成化十五年(1479年)薨。肃恭王朱贡鏊初封汾州王,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袭封,嘉靖十五年(1536年),恭王贡鏊薨。世子真淤、长孙弼桓皆早卒。由次孙定王弼枕继承,追封真淤为王,谥曰靖。据《甘肃新通志》载:“肃靖王真淤,博推好文善为诗,有盛唐风格,言边塞事尤感慨有意。”留有《华林寺》诗:

“闲登杰阁倚危栏,多少轮蹄去复还。
篱落连绵秋色里,园林高下夕阳间。
雨余船系临沙柳,风顺钟闻隔岸山。
无限壮怀吟不尽,盛游到此暂开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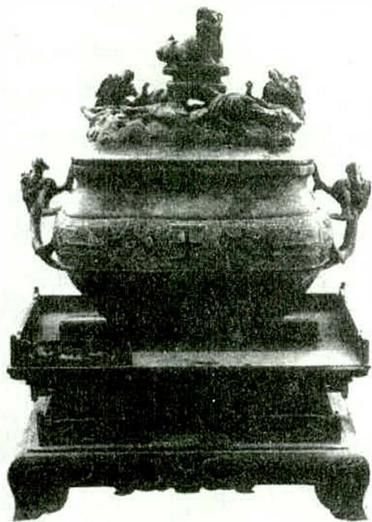
肃定王朱弼枕,嘉靖年(1539年)袭封,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定王弼枕薨。其子晋炯先卒,孙怀王绅堵继承。逾二年(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怀王绅堵薨,无子。

定王弼枕之子晋炯,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薨。其子绅堵袭封追封王,谥曰昭。肃昭王缙炯英年早逝,虽未袭王位,但才华出众,曾留有诗《侯马亭》。侯马亭在皋兰县(今兰州市)西60里。

“步履出城西,遥望孤亭下。
借问地为谁,遗名叫侯马。
承宠二师行,恣攻三军舍。
贵畜以贱人,去众而回寡。
问道紫骝今在否,徒使亭名万古有。”

肃怀王朱绅堵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袭封,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薨。无子,从权缙燝。靖王第四子弼柿,子辅国将军缙燝以属近,适宜继承。礼官言:晋燝是怀王的父辈,不宜继承王位,以本职理府事上册,宝罢诸官,属穆宗即位定。

王妃吴氏及延长王真澆等先后上言,“圣祖(指朱元璋)刈群雄定天下,报功之典有隆,无替臣祖。庄王受封,边境操练,征戍屏卫。天家不幸,大宗中绝,反拘于昭穆(古代区别辈分、亲属的宗法制度)之间,不及勋武继绝之典,非所以崇本支厚藩卫也。”下部议,议以郡王理藩,政帝不许。



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年),特命晋浣继承,肃设官属之半。万历十六年(1588年),晋浣薨。谥曰懿。其子宪王绅尧继承,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宪王绅尧薨。其子识铉继承。崇祯十六年冬(1643年),李自成破兰州,识铉被杀,宗人皆遇难。

明肃王自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封藩以来,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破兰州,历经252年,共九世,十一王。



三、富丽豪华肃王府

肃王朱模和其他诸王一样,“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西拜谒,不敢钧礼,“岁禄万石。”明建文元年(1399年)肃王府迁藩兰州,即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宫室。

肃王府府址设在今甘肃省人民政府所在地一带,墙高一丈,周垣三里。中部为府署,东、西、南三面均有府门,正门朝南,第二道南门为棂星门,后有端礼门,再后有承运殿、存心殿;再后即肃王府宫,分东、西二宫;府署东、西、北三面为王府宫苑。东苑花园称凝熙园,是肃王及妃嫔游憩之地,园内“垒石为山,因泉为池,山下洞壑幽远,逶迤数里”,亭台水榭,树木葱郁,北滨黄河,景色优美,俗称大、小山字石。假山下有洞,洞中有塑像,云洞下可通至城西雷坛,窥之黝然而深黑,莫敢入者。洞北有斗母宫,层楼高耸,可以远眺。直到清末还存有雷祖殿、玉皇阁、拂云楼、王母宫等。府署后北就城墙建拂云阁,与北山对峙。

在镇远桥(后建兰州黄河铁桥)南,明洪武年间修建望河楼。明肃藩初建望江(河)楼于九洲台,移此改名望河楼,后改“观澜阁”。明肃藩王世子康王瞻焰写有《望河楼》诗:

“寥落塞天回,人家落木间。

河流斜抱郭,驿道临险关。

田岸侵平野,深岚失远山。

津楼凭槛立,伫看远人还。”

明肃王府,南门两面道路拓宽,向东西方向延伸,且店铺林立,一时成为金城商业中心,直到清、民国时期仍为兰州的商业繁华区。

明肃王除了肃王府的建设外,还加紧对兰州园林、寺观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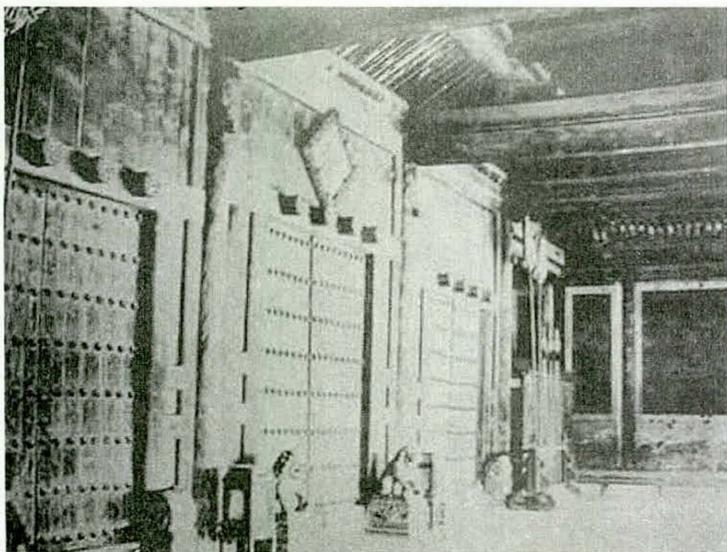
明肃庄王朱模储神泉水为之,开辟小西湖园林,“莲池夜月”成为兰州八景之一。小西湖原名荡莲池,方五里许,南倚长城,北傍黄河,河外山如列屏,遥为胜概之助。四周芦荻中,小舟泛月,光景绝清。波光潋滟,堤柳如烟,春夏之际水鸟咸集,秋后黄茅白苇,霜中红叶,亭台楼阁错落其间。

皋兰山巍峨挺拔,金城景色尽收眼底。明肃庄王于建文初年(1399年)建立三台阁(原魁星阁已毁)于山巅。史志载:“神阁一楹,崇阁三级”。飞檐凌空,回廊舒翼,明肃庄王登高赋诗,抚今追昔,抒怀古之幽思,念创业之维艰,惜羲皇故里之臣民。其词曰:

“登上皋兰山,翘首云天,白云亲舍望江南,缅怀那石头城阙,紫金冈峦,往来寄语南飞雁。且凭此羲皇故里,河岳根源,民勤俗厚,丁壮滋繁,卫护我大明江山。”

明肃王还建有白衣寺塔,塔高25.6米,下有12级,每级每面有佛龛一个,内制佛像一尊,计96尊,神态各异。再下为束腰覆钵。其南开一大龛,额题“耸瞻震旦”,内塑大佛三尊,两侧刻有“玉柱玲珑通帝座,金城保障永皇图。”12级塔身,每层角装风铃1个,共96个。白衣寺塔出土有明肃王瓷像,呈金黄色,官服玉带,手执笏板,栩栩如生,明亮剔透,极为珍贵。出土文物中还有一件有书画墨迹的香包,做工精细别致,素质而华贵,系明肃王识铉赠给王妃的信物,香包两面有明晚期书画家董其昌(1555—1636年)的亲笔题画题字。香包正反两面底纹编制有梅花瓣图案。联文为“怜君有丰节,不为岁寒推。”落款处题有“玄宰”(董其昌书画落款字号)二字,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肃王朱模在兰州建有四园,东园、西园、南园、



北园。东园在今双城门外至上、下沟一带；西园就是上、下西园。南园叫靛园，在今禄家巷、周家拐子、靛园寺一带。北园在今雷坛河以东、萃英门以西、黄河以南、临夏路以北这一地带。园中梨树最多，有“梨花万树都成雪，杨柳千丝欲化烟”的诗句。“梨园花光”是昔日“兰州八景”之一。

肃庄王笃信道教，明建文元年（1399年），由甘州移藩兰州后，见城西南“山环三面，有仙人舞袖之形，河距北流，如九曲之势，玉案之峰在前，左右交加剑水，龙翔虎伏，掩映其墟。”建文三年（1400年），动员巨大的物力、财力和人力，大力兴建金天观。“春肇其事，告成于秋”，绕桓三里，规制宏伟。观内建筑主要有元坛祠、真武祠、雷祖宝殿、神御殿、元极殿，道观宫殿嵯峨，松柏连荫，回廊交错，绘笔绝妙，是兰州规模最大的道观。

四、谁不临池仰肃王

明洪武初年朱元璋曾赐给肃庄王一部宋刻《淳化阁帖》，作为肃王府传世之宝。《淳化阁帖》是北宋淳化三年（992年）太宗赵光义诏命翰林侍书学士王著，把帝王藏图书的秘阁里所存的唐代以前的书法家的各种墨迹和南唐汇刻的《行元丛帖》进行编纂、摹刻在枣木板上，共十一卷，汇成我国历史上第二部大型书帖，是我国书法遗产的珍宝。原刻为枣木，拓用澄心堂纸，李廷圭墨，其墨如漆，其字精明而丰腴。

《淳化阁帖》卷帙浩大，内涵丰富，包括篆、隶、

草、行、楷各体。第一卷为历代帝王法帖，收选自汉至唐 19 家帝王书法，其中以唐太宗、唐高宗的草书最具有价值；第二卷至第四卷为历代名臣法帖，收入自东汉至唐代 67 家的作品，长达 700 年，其中收藏的有张芝和索靖的作品；第五卷为诸家古法帖，收有自仓颉至张旭等 17 家的书法，前五卷共收进 185 帖；第六卷至八卷为王羲之书，第九、第十卷为王献之书，共计 237 帖。

肃庄王朱模把《淳化阁帖》真本，秘藏库内，不肯给人观赏。万历年间（1573—1619年），陕西右参政分巡临巩张鹤

鸣得友人李子崇所藏枣木板阁帖一部，请准肃宪王朱绅尧和府内库藏阁帖校对，则见其（指库内藏帖）“称媯遒劲，神采洋溢，大不类世所藏本，如古法帖数段久已缺文，兹木独全，确为宋拓无疑。”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肃宪王朱绅尧请摹刻名师姑苏（今苏州市）人如玉（字伯坚）、南康人张应召（字用之）用线条勾出笔画的周边。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肃宪王朱绅尧下令温、张二人，在兰州摹刻上石，“纸凡数易，石必再见，心血几呕尽。”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朱绅尧，世子识铉接着完成。共历时七年，于天启元年（1621年）完成这一“砥行之名”的业绩。共用富平石（俗称铜磐石）145块。但据皋兰县儒学旧县志称：“明肃藩临淳化帖石一百四十一块，赵子昂千字文帖石共六块，摹刻精妙，字内存焉。”帖石刻成后藏于肃府东书院遵训阁，视为珍宝。石高 27.4—34.5 厘米，宽 36.5—40.7 厘米，厚 5—8.9 厘米，大都为两面刻字。肃本《淳化阁帖》，通称“肃府本”或“兰州本”。

《甘肃新通志》《艺文志》载：“康熙己酉（康熙八年，公元 1669 年），临巩副使孙际昌得之，宪署（指御史的职位）因出其旧藏淳化帖释文镬板，今石帖存府儒学，世传银铃铁环，形迹宛然，但破裂十八块，拓工以革束之，尚可观释文。板六十四块县礼吏科收貯，又有后跋木刻二十七块散在民间。顺治时，广陵陈曼仙、泽毛香林所补摹也。今攷此帖自三代至六朝，书非一人，字排一体，故不悉列

跋语、附录、备考”。

明肃宪王绅尧为《淳化阁帖》写《跋》。全文是：“雨粟洩机，代传厥神，镌惟宋擅，允为世珍。建国获授，永保虑烟，殫精重勒，大明万春。”

文中“雨粟”指仓颉创造文字的艰苦经历，动天地，惊鬼神。《淮南子·本经》：“昔者，仓颉作书，西天雨粟，鬼夜哭。”相传“仓颉始视鸟迹之文造书契，则诈伪萌生。诈伪萌生，则去本趋末，弃耕作之业而务锥刀之利，天知其将饿，故为雨粟。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厥神：厥，石也。《荀子·大略》“和之璧，井里之厥”。指用石头刻物。

末代肃王识铉也为《淳化阁帖》写《跋》，盛赞朱元璋赠《淳化阁帖》于肃庄王的功德，叙述勒石精刻《淳化阁帖》的目的及过程。全文曰：“我太祖高皇帝分封我庄祖于甘兰，以御戎羌，而赐之以宋人淳化阁帖，无亦以文德，足以柔远，千羽可以格苗之意，与珍藏内库。弘治间我恭王出而临之，仍留内库，至我宪王出而临之，恐我子孙与各王府不遍及，且无以公海内，乃延温、张二韵士摹勒下石，未竟而弃予，且嘱予以无替，于辛酉六月始竣。事割牲告成，泫然流注，临阅之际，至恒恒尚父一帖，

于我圣祖之意有遐思焉。夫析薪弗荷谓之不肖，予冲年无能，恢宏我宪王之盛德大业，此一役也。不肖之罪，庶几免矣。摹勒之功，先后七年，新旧不爽，毫发俱在，各跋言不具论论其始末，如此云。

即墨周如锦跋，此淳化真帖也，盖宋为完颜贮，完颜为蒙古贮，皆不能有之。高皇帝经营大漠，此物得之，上都大都遂复为中华所有，是蒙古实为我皇明贮也。元人手跋，墨迹如新，其为宋本无疑，则辩才之兰亭已。高皇帝不效唐宗挟殉昭陵，而以分赐肃藩，肃王又不以鸿宝自秘，而出千金重摹拓石，用广其传，是以与天下共贮也。

贮在天下家珍人壁，孰得而窃诸孰得而焚，诸殆与天壤可共敝，真善贮哉！至临摹劖、传神、逼真，温伯坚、张用之二子，附名不朽，功贤于萧翼，御史远矣。伯坚吴名家子，工书，其徒张用之，工镌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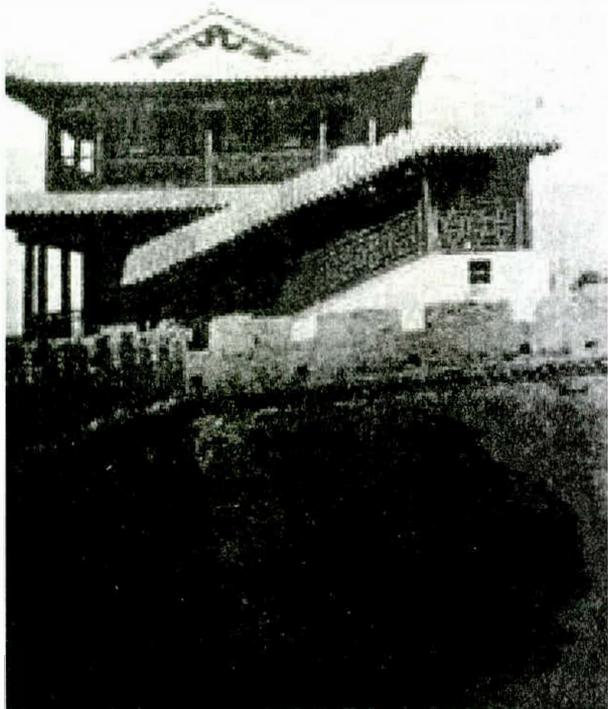
清，倪苏门在《古今法论》中指出：“淳化帖在明朝，唯陕西（当时甘肃属陕西行都使司）肃王府翻刻石最妙，谓之肃本。从宋拓原本双钩勒石，所费钜万。今市本相去天渊。”陈奕禧《皋兰载笔》称：“初拓用太史纸，程君房墨，人间难得。”郑学孚在《夤帖举要》中称：“明翻刻阁帖，以肃府本为最佳，跋语亦最多。”称赞“肃帖丰肥，浓态侧出”，“新旧不爽，毫发俱在，与宋本无异。”清马世焘赞《淳化阁帖》：“淳化原来内府藏，笔痕墨渾重琳琅。自成石刻装成帖，谁不临池仰肃王。”

《淳化阁帖》国之瑰宝，能保存至今，确属不易。李自成陷兰州，《淳化阁帖》曾沉于井，未曾损坏。光绪末年翰林刘尔忻移帖于兰州太庙尊经阁保存，1966年交甘肃省博物馆珍藏，为国家一级文物。后人赞《淳化阁帖》有诗云：“宋宫阁帖有淳化，肃府真传发夜光，千古书坛留盛举，肃王功德也无量。”

注：钁板：宋代刻板书盛行，其名甚繁，刻书板亦称钁板、钁木或钁梓。板作版。

银铃铁环：铃，盖印曰铃印。钩铃，天子御也，明洪武定制所设官吏皆用方印，未入流各官则用条记。（未完待续）

（作者系《甘肃省志·机械工业志》主编）



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和县的主要商号及其彰显的商业文化信息



魏泽民

在历史上,西和地处陇蜀要道,是茶马古道和古蜀道的重要过境路段之一,也是西北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西和县城、盐官镇、长道镇、纸坊镇、府城镇、洛峪镇、何坝镇、马家湾、石家关、大桥、陈家沟等地方,都有集市贸易,与四川、青海、汉中、西安、武汉、兰州、天水等地都有商贸往来。西和市场流通的商品,主要是通过茶马古道,用脚户的马帮和背脚子的背子运进来的,贸易的货物,主要是猪毛、猪鬃、牛黄、麝香、青盐、水盐、土盐、水烟、茶叶、卷烟、蔗糖、铁壶、铁马掌、药材、花椒、黄蜡、丝绸、锦缎、丝帕、生丝、布匹、姜黄、调料、响器(锣鼓等敲击乐器)、皮毛、香烟、搪瓷、陶瓷、颜料、染料、海味、徽、成县的烧酒等。

西和县在清末民初虽无商业行会和行帮组织,但每个行会都有自然形成的所谓“头人”。虽然他们平时各自敬其神祖,但过神会、演会戏又是一起合作的。

从1916年(民国五年)起,西和县开始筹建县商会,此后经历八次换届,直至解放才被解散。商会下辖有陆续成立的药材、皮革、木工等6个同业公会。到民国三十年前后,约有商号十余家,会员数百人^①。

一、清末西和工商业界的主要商号

从清朝同治、光绪以来,西和县最有名的商号就是“四大当铺”,即裕德当、清和当、永庆当、中和当。“四大当铺”几乎左右了当时西和的经济命脉。在过去西和县商贸经济比较繁荣的时代,“四大当铺”和一些较大的商号还兼营钱庄生意,兑换金银,从事金融业务,甚至县衙(县政府)也要通过“四大当铺”,把百姓交纳赋税交上来的麻钱,兑换成银币或者银票。西和县实力比较雄厚的几家商号甚至还在当地发行过临时代金券——“油布钱贴”^②。

清代后期,西和县较大的商号有近二十家,影响较大的有“长发茂”、“永庆恒”、“永生成”、“源兴茂”、“源裕恒”、“中盛钰”、“恒兴茂”、“新兴西”、“天义恒”、“通义成”、“重升西”、“万盛镒”、“同兴茂”、“中和铺”、“重升泰”、“长春堂”、“九思元”等,还有专营酒类的“义正隆”等。

西和“天义恒”、“恒兴茂”与陕西三元的棉布货庄订有常年供货合同,每年分批向西和发送棉花和土布,年终结账;天水的“元兴恒”、“永贞吉”、“永顺隆”、“全胜昌”等几家烧锅作坊,经营规模较大,前店是柜台和管理销售的场所,后院是酿酒的地方,这几家烧锅也与西和商号有商贸往来,向西和市场供货^③,西和商号又把这些商品贩运到其他

地方销售,从中获利。就这样,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西和大商号。

西和商号不仅贩运市场上畅销的各类商品,以获取丰厚的利润,也经销西和当地生产的部分手工业产品。西和的手工业作坊较多,能生产一些在当地适销对路的产品,比如生产的水烟,就是很有西和地方特色的商品,很受县内外消费者欢迎,著名的水烟作坊有鱼入池的“鱼家烟坊”、何自强的“何家烟坊”、王新一的“王家烟坊”、张庄的“金玉合烟坊”,以及“恒兴公”、“兴顺公”等,其中规模和效益最大的是“恒兴公”和“鱼家烟坊”,产品行销陇西、略阳、汉中、武都、岷县、文县等地。

西和当地的酒类作坊较少,其中“中胜隆”烤酒作坊算是规模较大的,专营生产和批发,但产量很小。西和市场上所需的烧酒大多数是从徽、成县的伏家镇、横川、郭家壩、侯家坝和天水购进的。

西和的铁器作坊主要集中在县城东关一带,主要产品有镰刀、锄头、铁壶、铁马掌等,特别是铁壶(pia 子壶,用冷轧工艺制成,圆锥型)和铁马掌很有名,除了满足本县市场需要之外,还销往陇南、陇西各地。

西和的丝线产品也是很有地方特色的商品,主要有花线、绸子线、丝帕和五色丝线,这些产品除供应本县市场外,还沿着茶马古道一直远销青海、内蒙、宁夏、甘南、河西走廊乃至西藏,特别受藏族同胞的青睐,但手工作坊,生产技术落后,产量也不大。

西和的鞭炮生产历史悠久,鞭炮作坊主要集中在西峪的张庄、乔堡和苏合的老庄一带,产品行销本县和礼县、岷县、宕昌等地。

制鞋业中影响较大的有“鲁家鞋店”和“仵家鞋店”,所制单鞋和棉鞋,行销全县^④。

染坊所染的青蓝布、绿红布、扎染布等,因为质量较次,只能供本县市场销售。

从清代同治、光绪到民国十七年王佑邦匪军攻破西和城之前,西和的经商环境比较好,大商号一直经营得不错,不但本地人经营商业,也吸引了陕西、四川、山西等外地客商来西和投资兴业,发展壮大。在那些商号的影响和引动下,西和又发展起了元盛通、中盛荣、双盛和、中盛堂、中和源、昌兴和、瑞生和、三合东、春生茂、景春和、致中和、兴

盛西、协通源、吉盛东、森盛茂、复兴东、重兴东、福胜昔等新兴商号。其中“复兴东”和“重兴东”专营点心糖果类,信誉很好,其产品除畅销本县外,还行销邻近各县市场^⑤。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以后,因军阀割据造成的兵燹匪患连年不绝,西和境内四路不靖,到处有土匪出没,县城也屡遭土匪攻陷、抢掠,尤其是马绍棠、王佑邦、王好善等攻陷西和县城后,挨家挨户,掳掠财物,富商大户,被抢掠一空,西和商号由此元气大伤,商贾星散,商号倒闭,行商中辍,手工业停产,市面萧条,西和城过去的繁华景象从此消剥无余,仅有零星小商号也只能惨淡经营。在战乱中被焚毁的街道店铺,为了营业,不得不维修或者重建,但是再没有人敢起高堂,建华屋,而是因陋就简,粗略经营,因为人们仍然担心土匪军阀再次攻陷城池,大肆抢掠,所以维修后恢复营业的商号店铺,已经与往日繁华景象不可同日而语。此后,西和的商家和士绅们遂视城市为畏途,以华屋为危巢,曾经被战乱损坏之房舍,有许多是任其倒塌而无人整修,还有批卖他人后退避乡野的,也有拆除木料而在农村改建小屋的。偶有从事整修的,也都草创粗就,不再有旧日的华丽装修,而重新修建的,更是凤毛麟角。乡间虽有,但数量很少^⑥。

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秋季,新编十四师第二旅旅长蒋云台率部驻防西和、礼县,动真格剿灭各路匪患,各地匪帮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县城比较安定,蒋旅长本人又重视发展工商业,专门从外地聘请技师发展西和的纺织工业,西和工商业开始恢复发展,一些“老字号”恢复营业,一些新的商号也陆续出现,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新商号就有“敬信和”、“三义兴”、“复和源”、“春发茂”、“复元珍”、“元盛通”、“刘保记”、“魁盛永”、“信义和”等^⑦。

但西和清末民初的商号并没有孕育出像山西晋商、安徽徽商一样稳定而强大的商业资本集团。这除了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视商业经营为末业的观念作祟外,也与西和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知足常乐、安土重迁的社会风气以及缺乏开创和进取精神的人生态度有关。徽商可以不辞劳苦,打破传统的安土重迁观念,经常“无远弗届”,“走死地如鹜”,出门经商往往“数年不归”;在经营策略上,徽商、晋商有一种奋发坚韧的进取和开创精神,

“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而西和商号的老板们因其文化素养较低,眼界不够开阔,很难做到晋商、徽商的水平^⑧。

在经营理念上,西和的商号也没有上升到“以儒术饰贾事”,像晋商、徽商那样“虽不服儒服,冠儒冠,翩翩有士君子之风”的高度,也不能“审积著、察低昂”,更没有把“服贾”与“业儒”有机地结合起来,“扫尽市井俗态”,用“业儒”、“重农”的精神和态度去“服贾”,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商业经营活动,所以在西和没有发展成较有影响的商业资本集团^⑨。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西礼、天水一带作为秦民族的发祥地和战略大后方,就曾经有过比较发达的商业和商业经营传统,但到汉魏以降,这一传统在重农抑商、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下逐渐式微,伦理纲常与追逐利益之间的矛盾,在传统社会中很难调适,没有营造出以血缘关系为核心、以地缘认同为外延的宗族商业网络,对利益的追求也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没有像徽商、晋商那样“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的执着,形成商业文明与儒家文化、宗族制度以及儒官商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念,在商业资本领域和宦海仕途中多元发展,致使西和商贸经济逐渐萎缩^⑩。

二、西和商号的品格及其反映的商业文化内涵

商号就是商家的招牌和门面,反映着商家的经营理念和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等丰富的商业文化信息。商号招牌起源很早,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商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殷商时代打出商号招牌的文献记录,但至少战国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卖酒的酒幌子。《韩非子·外储说上》就有一则《狗恶酒酸》的寓言,说“宋人有沽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这“悬帜甚高”指的就是高高地悬挂起酒幌子,以此表明所卖商品,招徕顾客,这可以说是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商业广告,也是商号招牌的源头。

隋唐五代时,招牌广告只出现在官府统一管理的市场内,到了宋代,招牌广告得到了普及,几乎所有店铺都有自己的招牌广告。据专家介绍,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仅汴州(开封)城东门外附近的十字街头就有各店铺的广告招牌30多块^⑪。

近代以来,由于列强的入侵和外国商品对民族工商业的挤压,民族工商业的生存状况日益艰难,竞争日趋激烈,招牌广告的内容和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儒家“以义取利”的思想渗透到商业广告中来,招牌广告文字增加了与道德修养有关的内容和表示吉祥如意的字眼,招牌上再也不只是两宋时期的那种“某家某某店”字样,而“瑞”、“发”、“福”、“庆”、“永”、“茂”、“盛”、“裕”、“昌”、“隆”等祥瑞字眼频繁出现在商号的广告招牌上,商号命名显得更加瑰丽雅致:有祝愿生意永远兴旺的“永盛泰”,有保佑吉祥如意的“天成祥”,有奉行商业道德的“忠信恒”、“丰盛德”,有表示合资经营的“元庆合”、“同兴涌”。中药铺有宣传自己医术高明、包治百病、妙手回春的“杏林堂”、“同春堂”,还有诗情画意很浓的“玉兰村”糕点铺,也有体现新时代意义的“兴礼”、“民生”、“裕国”、“建华”、“新乡”等店铺。

清代学者朱彭寿在总结了清代商号广告招牌用字的规律后,编写了几句商号招牌用字诗,其辞曰:“顺裕兴隆瑞永昌,元亨万利复丰祥。泰和茂盛同乾德,谦吉公仁协鼎光。聚益中通全信义,久恒大美庆安康。新春正和生成广,润发洪源厚福长”^⑫。而西和近代以来的大商号,命名也具有这一儒商结合、义利兼取的近代商业文化特征,西和的商人们也懂得用礼义、诚信等信条协调商业活动中的人际关系,这样看来,商号招牌被赋予了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商业文化内涵。

在西和县城乡,店铺开张时往往要大肆宣传,匾牌挂红,张灯结彩,鸣放礼花鞭炮,大摆酒席宴客,亲朋好友和同业者前来祝贺,并送上“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一本万利”、“恭喜发财”等条幅,或者“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迎进店一团和气,送出门四海春风”,“青龙奔腾入东海,白虎吐银来天河”,“旋转乾坤流琼浆,肩挑日月卖精华”等对联,文字雅而意蕴深。

店铺按行业悬挂标志,标志即广告,“望子”是常见的一种。比如卖酒者,门前挂一小酒笼或木制酒瓶形牌子,上写“中胜隆”等字样;点心店门前,糕点标笺,上写“复兴东点心”、“中秋月饼”等字样;旅店门上挂一弓形样的标志物,弦部满缀下垂一尺长麦秆。在过去,即使是一些从事各行各业的

个体小商贩和匠作之人也有标志: 阉割匠肩挑杆子, 杆端系着红布条和马尾毛; 给驴马配种的“驴客”在种畜头上挂红布、在种畜身上披红垫子; 卖油者手击木梆; 小货郎手摇拨浪鼓或铜钲子, 并且要喊出特殊的叫卖声。一见标志, 一听声响, 即知是卖什么东西的人来了。还有卖小食品的, 卖蔬菜、水果的, 磨剪子磨刀的, 钉锅补碗的, 等等, 也要高声吆喝, 其声其韵, 别有一番风味。这特殊的声音、特殊的标志、特殊的道具, 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商业广告。

商号招牌是一种广告形式和媒介, 承载着传递商业信息, 彰显着企业个性; 也是一种商业文化, 是现代商标的雏形, 甚至可以看做中国古代商业文明的一种“活化石”; 更是一种城市景观, 点缀着城镇的大街小巷, 在中国商业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尤其是“老字号”, 可以说是一种商贸之宝, 它的价值甚至超越了商业本身的价值, 上升为一种文化, 对“老字号”的痴迷代表了人们对商业文化的忠诚。“老字号”的魅力, 就是商业文化的魅力。“老字号”的招牌一经立起, 就要诚实经商, 童叟无欺, 取信于消费者, 因为招牌是店铺的精神支柱和道德追求, 要兼顾义与利, 要考虑消费者的利益。

清代徐珂所说: “商店悬牌于门以为标识广招徕者曰市招, 俗呼招牌, 大抵专用字, 有参以满、蒙、回、藏文者, 有用字兼绘形者”^③。文字内容多写经营门类、吉祥用语、店铺规模及与店主的关系等, 形式上有横写的、有竖写的、有图文兼备的、也有几种文字并用的。

商业招牌也和其他传统文化品类一样, 经历了她的噩梦时代。1953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公私合营, 大部分老字号就是在这个时期改换了名字, 改变了经营结构; 到“大跃进”时期, 开始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实行集体食堂制, 饮食业中的老字号一夜之间都消失了。在破“四旧”的时代, 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 将含有“善”、“德”、“祥”之类字眼的招牌, 被当作封建意识的残余扫地出门, 一些百年老店甚至几百年的“老字号”招牌, 已经风光不再, 被当做旧文化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还有一些老字号因跟不上时代步伐, 经营管理不善, 被时代潮流给淘汰了^④。

尤其是西和县, 百年老店荡然无存, 商号招牌和字号只能存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直到今天, 仍然能隐隐约约地听到有人念叨“复兴东”、“重兴东”、“森盛茂”、“福胜昔”等商号。商业“老字号”曾经以其独特的魅力, 将自己和作为消费者的私人生活深刻地联系在一起, 承载了一个地方、一个城市的商业历史和文化, 也遗传着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商业文化基因, 沉淀着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欢乐而甜蜜的历史记忆, 它的荣辱沉浮, 总能拨动人们的心弦。

现在, 在弘扬国学传统, 复兴传统文化, 传播商业文明的今天, 商业招牌又迎来了复兴与发展的历史机遇, 特别是百年老字号, 已经成了企业的无形资产, 得到了特别的保护。要建设陇南北部商贸强县, 重振西和商号当年的雄风, 就要恢复甚至发扬光大老字号, 因为商业招牌和商号用字不仅彰显着业主期盼祥瑞泰和, 财源永昌, 裕顺隆兴, 恒通万利的愿景, 同时也彰显着业主的做人原则和经营理念, 即义利兼顾、童叟无欺、诚信经营、长久发展。虽然当今的广告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 但经历了2000多年风雨洗礼的商号招牌, 很好地适应了当今商业发展的需要, 仍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应当倍加珍惜, 发扬光大。因为, 只要实体商铺继续存在, 那么商号招牌就不会过时。

【参考资料】

①②④⑤⑥⑦ 宁世荣、廖志立:《清末到民国西和工商业的发展概述》(《西和文史资料》第一辑, 第41—42页)

③ 赵文慧、史云龙:《魅力秦源·第六辑·传统技艺》第290—291页,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⑧⑨ 张青:《招牌的源流与变迁》(《寻根》杂志2008年第2期第93—94页)

⑩⑪ 赵琪伟:《礼县红河流域的早期秦文化遗俗》, 2010年5月10日《文化陇南·秦文化专号》

⑫ 陈培爱:《中外广告史》, 中国物价出版社, 2001年版

⑬ 朱彭寿:《旧典备征·安乐康平室随笔》, 中华书局, 1997年版

⑭ 《清稗类钞·农商类》中华书局1984年版

(作者单位: 西和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秦始皇灭了六国，但并未统一中国，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卫国。

中国历史上最牛的权臣是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护，他权倾朝野的时代历经西魏、北周两朝，这期间他一共杀了3个皇帝。

唐朝最强盛的“开元之治”时期，全国有户820万，是唐朝的最高值；而隋朝“开皇之治”时期，全国就有户890万。终唐一世，各项经济指标都没有恢复到隋朝水平。

被“主流”专家们诟病为“军事软弱”的宋朝，对外战争（交战规模万人以上，不包括统一战争和国内战争）的胜率超过了70%；而被认为是军事最强盛的唐朝却在对外战争中胜少负多。由于唐朝错误的民族政策，产马地尽在游牧民族之手，导致宋朝从始至终只能在平原以步兵的血肉之躯抵挡游牧民族铁骑的冲击，所以宋朝的胜利一般都是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倘若一段时期宋朝对外胜率低于60%，那基本就意味着亡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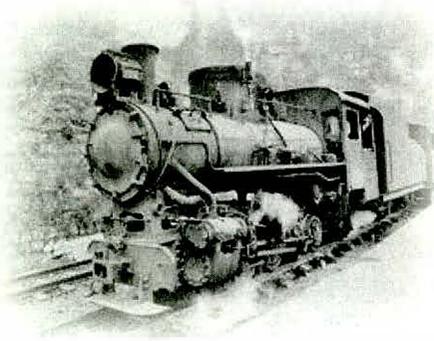
宋朝士兵的平均作战负重是32公斤，训练负重还要高于这个数值；现在美国最精锐的特种部队的训练负重不到15公斤。

中国在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城市化率达到惊人的30%以上；在所谓“康乾盛世”时代，这一比例也不过9%；新中国在21世纪初才重新达到这一数值。

同样是元丰年间，中国华北地区的钢铁年产量达到了15万吨；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在1788年钢铁产量才达到7.6万吨。

整个北宋时期，中国一直在扩张领土，直到“靖康之变”的前一年（1126）才停止。北宋前期主要是攻击契丹，到澶州之盟为止；中后期则注重对西夏和吐蕃的攻击，特别是对吐蕃河湟地区的进攻收复了唐代失地，大大扩张了领土。北宋徽宗时

历史趣闻



期联金北伐获得了北方的大片领土，随后北宋亡于金。

秦桧所创的“宋体字”是整个南宋时期的官方文书通用字体，尽管南宋大多数时间都将秦桧作为反面典型。

整个南宋时期，中国一直没有定都，临安府的级别不过是“行在”（陪都）。

南宋之所以一直偏安并非完全因为统治者不愿收复故土，而是因为民间反对的声音太大。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民间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担心收复故土后宋廷会增加江南地区的税收来扶植已被女

真人严重破坏的收复区。

南宋时期，熟练雇工的工资高于知府工资。（宋朝知府一般是从三品或正四品，年薪在400贯以上，至少相当于今天的15万元人民币）

中国南宋时期最先进的织布机有1800多个活动构件，其中有的技术是现代化织布机也无法达到的。

南宋中后期，中国（仅指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左右，经济总量却占到了全球的75%以上；今天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1%，经济总量占全球比例却仅为4%。

在1233年宋蒙联军攻打蔡州的时候，南宋名将孟珙救了蒙古将领张柔一命。4年后，张柔的儿子张弘范出生，而崖山一战灭亡南宋的就是这位张弘范。

南宋数学家秦九韶至晚在1247年就已经发现一元三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欧洲人在400多年后才发现，但在中国的课本上这个公式仍是以那个欧洲人的名字来命名的。

蒙古帝国军队在13世纪的征战在亚欧大陆屠杀了2亿人，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项吉尼斯纪录，其中，仅中国境内就有6000万人死于蒙军屠杀；与之相比，遭纳粹屠杀的600万犹

太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明朝在永乐年间与越南发生了一场战争。此战明朝军队号称 80 万,而越南军队更是号称 700 万,实际上双方军队总数加起来也不过 30 万,这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牛皮吹得最大的一场战争。注:那时越南还是中国属国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吨位最大的宝船排水量约为 7500 吨。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只娶一个老婆的皇帝出现在明朝,他就是明孝宗朱祐樘。

中国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理论的不是马寅初,而是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的内阁首辅申行时,而最早实施计划生育的时候却是在更早的宋朝。

明朝的万历皇帝曾连续 28 年不上朝,创造了中国皇帝的纪录。但是,这期间中国无论对内还是对外的战争均获得全胜。归根到底是明朝拥有强大的内阁及行政系统,皇权受到极大制约,已经无法与从前的王朝相比。满清在这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历史倒退。

自 1572 年“隆庆开关”到 1644 年明朝灭亡,这 70 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 1/3 涌入中国,共计约 3.53 亿两(保守估计,目前重新估计约为 5 亿两)。并且全球 2/3 的贸易与中国有关。

16 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掠夺的白银几乎都通过贸易的形式最终流入了中国。

南宋开禧二年(1206)中央财政收入达到 8000 万贯钱,当时全国人口约 7000 万。清廷到 1900 年代为 8000 万两,人口却有 4 亿。而南宋 1 贯钱购买力是清末一两白银的 2 倍。更重要的是,宋朝税率低于清廷。

公元 763 年,刚刚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唐朝中央政府兵力不足,被叛将仆固怀恩引来 30 万蛮族军队,将长安、洛阳占领。唐肃宗最后用东都洛阳的全部青年男女和财物作为贿赂,引来回纥军队收复两京,才使汉族免于亡国灭种。

1644 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一次大型鼠疫,造成驻守北京的 20 万明军全军覆没,这直接导致了明

朝亡于李自成。随后北方游牧民族乘机进入中原,建立了延续 200 多年的少数民族政权。与唐朝的游牧民族趁中原王朝内乱入侵相比,明末的这次中原内乱使游牧民族成功灭亡了华夏政权,建立了少数民族政权。

被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不是康熙,而是明朝最后一个年号——崇祯,一共被朝鲜使用了 265 年。

清廷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总计存书 3457 部,79070 卷,禁毁 6766 部,93556 卷。

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议会通过投票产生的结果,支持战争的一方仅获得 9 票的优势。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有人在京城某仓库意外发现一批封存了 200 多年的火器。这批火器是明朝末年制造的,其中有的竟然比英军的装备还要先进。

清廷的道光皇帝为人十分节俭,喜欢穿有补丁的衣服,但打个补丁却要花四两银子。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曾以 12 万对阵 2 万英法联军,结果阵亡 3 万余,而对方仅阵亡 4 人,但病死的却有几十人。

辽道宗耶律洪基曾写诗表达了后悔自己生在蛮夷之国和“来世做中国(宋)人”的愿望。与之类似的是,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朝鲜国王王颙也写诗表达了类似的愿望。

南宋灭亡的时候,日本“举国茹素”来哀悼大宋的灭亡。元世祖忽必烈因日本此举,且倭主不来朝贡,造大船 7000 艘往攻,结果船队被暴风雨所摧毁,日本人从此将此风称为“神风”。二战中“神风敢死队”即出自这个典故。明亡后,朝鲜和日本认为中国已亡,日本从此蔑称中国为“支那”。明治维新后,自认为华夏正统的日本曾打着“攘夷主义”的旗号发动甲午战争等对清战争。唐、宋、明时作为对中国文明衷心倾倒的两个附属夷国,日本和朝鲜至今因还因宗主国文化沦丧而对中国存有偏见。由于满清毁书,今天中国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的教授经常前往日本、韩国查阅中国古籍,如此才能写出有见地的古代文学、历史论文。

一篇值得细读并实践的好文章

编者按:《甘肃史志》在两年的成长过程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其中有读者来信和我们共同探讨修志话题,在此选登一篇与大家共勉。

《甘肃史志》编辑部:

《甘肃史志》2012年第4期上刊登的桂发荣著的《志书总纂完稿需要把握的几个环节》是一篇值得细读并付诸实践的好文章。文章写得很有深度,所提的问题确实是在当前编志工作中值得注意并认真研究的。

文章所提“删繁就简”的八个方面的问题,在很多志书中或多或少的都存在。志书如果大量的引用文件资料,几乎把志书变成文件汇编,使人看了倍感乏味,毫无新意。有的篇章“穿靴戴帽”、“画蛇添足”,看起来像“画龙点睛”,其实是多此一举。像写报告一样,空空洞洞,言之无物。有的前后重复交叉,一个数据多处引用。政治化的语言很多,空话套话,影响志书的科学严谨。志书所反映的事实应该是一个事物的结局(成果),至于事物发展的过程(做法)可以从简。目前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最近,中央提出改进文风的问题,要求“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要言不烦,意尽言止”。编志工作应该首当其冲,付诸实践。同时应该发扬志书“文约事丰”、“述而不论”、“言简意赅”的一些传统的好的做法。对于前辈编写的一些志书应该认真阅读,吸取其精华;对于第一轮好的经验也应该认真总结,发扬光大。

安文迟

深入“双联”点开展送温暖活动



2月1日，省史志办在“双联”扶贫点——甘谷县大庄乡杨家坡村进行了一系列慰问活动。为全体村民、困难群众送去了春节礼物，三岁以下儿童收到了“爱心营养包”。

